

目 录

MAY 2024

contents

新闻资讯

XINWEN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李敬泽、王蒙考察调研浙江文学馆.....4
省作协召开全面从严治党暨机关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会议.....5
省作协党组召开理论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7
文学名家汇聚浙里，2024春风文学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7

浙江文学馆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机关党委

浙江文学馆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瞭望 LIAOWANG

2023年报告文学：
传递时代强音 彰显向善向真向美力量.....10

李朝全

评论 PINGLUN

如在梦中的镜像空间.....14
新时代宏大叙事中的网络文学表现.....16
余华《活着》的读者接受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21
别样的内心房间.....29
中年晚期的写作经验.....31
黄咏梅的叙事之变：写作者的“自我革命”.....33
瘦诗里的闪电和雷鸣.....35

李松睿

朱 钢

项 静

范咏戈

丛治辰

曹 霞

卢 山

序跋 XUBA

回归之诗	38
向内寻找一条深江	41
因为萨福，因为爱	43

作家生活

ZUOJIA SHENG HUO

闲读 YUEDU

在飞扬的歌声中照亮梦想	45
《三十三岁的决心》： 当“中国的金智英们”开始反抗 ..	47
AI时代的乡村新抒写	50
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赫德	53
生命过程与科技求索的活动形态 ..	56
形式特别、科幻人文与诗意超越 ..	59
寻找《金蔷薇》	63

谈话 TANHUA

那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	66	郑润良 陈 河
------------------	----	---------

感悟 GANWU

短篇小说重塑固有世界	74
来自太平洋深处的迷人气息	76
长夜将至	78

李郁葱
但 及
郑亚洪

肖 雯

陈曼冬
赵 俊
风 荷
王学海
谢修金
麦 田

艾 伟
雷 默
章雨恬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记忆 JIYI

陈祖芬和《现代童话：杭州》	80	杨新元
---------------------	----	-----

原创作品

YUANCHUANGZUOPIN

虚构 XUGOU

在美发厅	83	李志铭
------------	----	-----

散笔 SANBI

故乡在左，异乡在右	85	麦 秸
海里有灵	87	赵悠燕
黄昏下的村庄	90	郭小祥

汉诗 HANSHI

蘸运河之水墨书写宁波的片段	92	马倩倩
离开春天的日子（组诗）	95	叶巨龙

浙江作家 ■ <http://www.zjj.org>

省作协召开全面从严治党暨机关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会议

4月3日上午，省作协召开2024年全面从严治党暨机关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十五届三次全会精神以及省直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省级宣传文化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3年主要工作，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出席会议并讲话，驻部纪检监察组派员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2023年，省作协在省委、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和驻部纪检监察组的悉心指导下，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紧抓“理论武装、党建引领、双建争先、除险保安、责任落实”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机关党建、意识形态主体责任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2024年是省作协的“重点突破”之年，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全会以及省委宣传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实施“五大行动”，加快打造勤廉并重的新时代机关党建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一是实施思想政治引领行动，提升管党治党向心力。加强对党忠诚教育、政治机关意识教育。认真履行党组、各党支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党组、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循迹溯源学思想促践行”。

二是实施组织建设提升行动，增强管党治党战斗力。严格落实党内政治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制定省作协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抓实党组班子成员、机关党委（纪委）委员联系基层支部制度。打造省作协“勤廉小单元”党建品牌，设计有效工作载体，深挖作协勤廉文化建设。

三是实施干部能力提升行动，提升管党治党执行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落实发展党员质量管控体系，加大高知识群体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力度，注重发展培育年轻党员。打造高素养党务干部队伍，组织开展专兼职党务干部党纪学习教育。加强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自身建设。

四是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提升行动，提升管党治党保障力。常态化开

展党员干部谈心谈话。开展“四风”专项治理。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县处级干部和新进干部职工的纪法培训、廉政提醒、警示教育，健全各级党员干部廉政档案。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全面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机制。

五是实施巡视问题整改落实行动，提升管党治党净化力。注重靶向发力，着力回答好省作协“新春第一会”上提出了六个问题。注重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工作与打造新时代浙江文学高地，与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历次全会精神，与贯彻落实省作协十代会精神结合起来。注重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开展制度“查改建”，推动巡视整改落地见效。

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分别与党组分管领导，机关各部门及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全面从严治党、机关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

省作协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及主管社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作协机关党委）

省作协党组召开理论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按照省委关于党纪学习教育总体部署,4月24日上午,省作协党组召开理论中心组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结合本职工作学,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主旨要义和要求,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以严明的纪律为浙江“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贡献文学力量。

叶彤指出,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学好用好《条例》是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条例》是党的纪律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主干性地位的党内法规,规定了党的各项纪律底线和执纪依据,是党员干部知纪明纪的必修教材和守纪执纪的行为准则。要认真学习《条例》,始终做到学纪、知

纪、守纪,始终做到在党、爱党、为党,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叶彤强调,党纪学习教育是2024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重要任务,对于提升党的纪律性,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我省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叶彤要求,要结合推动作协工作用心用力学,按照省委、中国作协对我省文学工作的要求,在聚集“出精品、出人才”的同时,扎实推进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建设等重点项目在我省的落地落实;要结合巡视整改用

心用力学,把巡视整改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做到整改事项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结合省委中心工作用心用力学,注重与三个“一号工程”、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精准融合,突出问题导向,抓具体抓深入,以良好作风保证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学习会上,党组成员晋杜娟、朱丽军联系实际作重点发言,与会中层党员领导干部围绕学习《条例》作交流发言。

会前,省作协党组领导班子、中层党员领导干部集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逐章逐条自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编 总则)等。

(省作协机关党委)



文学名家汇聚浙里，2024 春风文学周 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春风有信”

——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
颁奖典礼举办

繁花似锦，春风有信，最美人间四月天。

4月19日下午，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潮新闻、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办，浙江图书馆协办的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文澜剧场举行。

今年春风悦读榜的主题是“春风有信”。

王蒙、莫言、李敬泽、陈晓明、毕飞宇、艾伟、乔叶、欧阳江河等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出席颁奖礼。本届春风悦读榜中，王蒙、莫言等作家学者分获各项年度图书大奖。



90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王蒙至今仍笔耕不辍，推出新作《霞满天》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转型之作《鳄鱼》，是一部具有魔幻色彩的话剧作品，摘得春风悦读榜的最高奖项——春风白金图书奖

90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王蒙至今仍笔耕不辍，推出新作《霞满天》，用阳光般明亮的句子，点燃生命的激情，吟咏人生中避无可避的挫折与磨难。今年春风年度致敬：王蒙《霞满天》。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转型之作《鳄鱼》，是一部具有魔幻色彩的话剧作品，摘得春风悦读榜的最高奖项——春风白金图书奖。

作家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学者林小英的《县中的孩子》分获白银图书奖（虚构类、非虚构类）；陈晓明的《陈晓明文集》和沈宏的《繁花：批注本》荣获春风评论奖；诗人西川凭《巨兽》荣获春风诗歌奖；俞冰夏以《无尽的玩笑》获春风金翻译家奖；黄传会以《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获浙版好书奖；法医秦明以《法医秦明》系列获春风IP奖；青年作家薛超伟和吕晓宇分别以《隐语》《水下之人》获春风新人奖。

颁奖典礼期间，李敬泽受邀担任“浙江文学馆顾问”。

“看见·未见”系列文学沙龙在浙江文学馆举办

4月20日，由潮新闻·钱江晚报、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和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办的“看见·未见”第12届春风悦读榜文学沙龙在浙江文学馆举办。

现场文学大咖云集，汇聚了艾伟、毕飞宇、陈晓明、罗伟章、欧阳江河、乔叶、西川、薛超伟、萧耳、徐兆正、俞冰夏、易小荷、周华诚等知名作家，他们围绕“诗意与抒情”“浙江新



“诗意与抒情”文学沙龙。从左至右（嘉宾）：毕飞宇、罗伟章、陈晓明、西川、欧阳江河



“浙江新锐力量”文学沙龙。从左至右（嘉宾）：薛超伟、艾伟、周华诚、徐兆正



“女性在当下”文学沙龙。从左至右（嘉宾）：易小荷、乔叶、俞冰夏、萧耳

锐力量”和“女性在当下”三个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和对话。

青年作家，是文坛的后备军。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为文坛注入了新鲜气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青年作家被看见，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新锐之气。作为青年作家，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学视野？对自身创作有着怎样的反思和观察？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共性？

在“浙江新锐力量”的文学对话里，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会同浙江青年作家周华诚、薛超伟、徐兆正展开对话。

三位浙江青年作家中，周华诚是浙江当下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青年散文家，薛超伟凭借小说集《隐语》获得了第12届春风悦读榜春风新人奖，青年作家徐兆正则在近年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



省作协艾伟为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春季榜上榜作家颁奖



颁奖典礼海报

2024 浙江青年文学之星· 春季榜单正式发布

4月19日，2024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春季榜单正式发布，丁小宁、周华诚、徐兆正三位青年作家获此殊荣，省作协主席艾伟为他们颁发证书。这份荣誉，不仅彰显了浙江青年作家的努力与成就，也是对浙江文学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体现。

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季度榜和年度人物的发布，聚焦当下的文学创作现场，聚焦文学创作、评论、翻译等各个领域各类文学体裁，聚焦作品，聚焦45周岁以下、户籍或工作关系在浙江的青年作家。

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季度榜根据上个季度浙江青年作家作品发表、出版、影视转化等情况，每季度发布1-3人。每年年底，从“每季之星”中产生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年度人物1名，在第二年的春风悦读颁奖典礼上发布。

本次上榜2024浙江青年文学之星·春季榜的作家中，丁小宁是浙江颇具潜力的青年小说家。她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感，关注个体精神层面的焦虑和困惑，从中可以看出某些先锋小说的内里。2023年其小说作品《我以为我是佛》发表于《收获》，引发关注。该篇小说试图表达生命的无常和普通人试图超越自我的艰难，暗含一种反讽的味道。

周华诚是浙江当下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青年散文家，其作品风格闲适，对乡村、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等有着持续的关注，题材广泛，既有泥土气，又不乏知性和文化高度；语言质朴自然，又不乏优雅气质。著有散文集《德寿宫八百年》《流水辞》《春山慢》等作品。

徐兆正是近年来浙江文学评论界异军突起的一名骁将，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兼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文学评论集《总体性的碎影》是其发表在国内各大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的合集，视野开阔，功底扎实。■

（浙江文学馆）

2023 年报告文学： 传递时代强音 彰显向善向真向美力量

Article—李朝全 Li Chaoquan



回望刚刚逝去的 2023 年，经济社会、衣食住行，一切都在“恢复重建”中向好发展。与此相应地，报告文学继续充当着记录历史先行者的角色，对世界变局和时代巨变及时做出回应，秉笔直书记录鲜活的历史进程，反思前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困惑、经验及教训，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自觉担当社会责任，践行历史使命。

主题创作引领主流

主题创作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报告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文体。注重对现实及时地反映、报告和表现，传递时代强音，表现时代主旋律，彰显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力量，这当然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上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对于主题创作的倡导引领，特别是通过启动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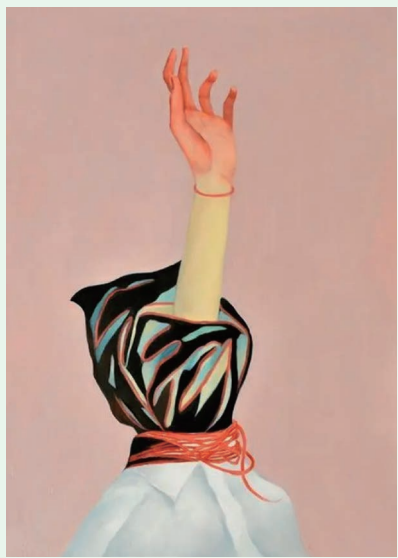
个一工程”奖、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中国好书”、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题创作在当下已然蔚为大观，形成主潮。当然，对于主题创作决不能做狭隘的片面的理解。凡是聚焦革命历史和新时代社会生活，讲述精彩中国故事，塑造出彩中国人，传递和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和讴歌真善美主题，能够引起读者共情共鸣、具有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作品，都可以归入主题创作。主题创作包括新时代叙事、新红色叙事，特别是对新时代历史性成就、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做出反映与表现；也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红色叙事，以及其他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历程中艰苦卓绝的抗争、奋斗、进取与成就，塑造代表性人物，描写历史性事件，表达中国精神，弘扬爱国报国、改革创新精神的文学创作。

何建明在主题创作和国家叙事方面持续发力，成果最突出。2023 年度他推出的《复兴宣言》描绘新时代上海的发展历程，《大飞

机从上海起飞》讲述中国制造自己的商用大飞机的故事。《石榴花开》以新疆塔城市为样本,反映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聚焦新疆多民族团结协作、携手发展。《我心飞扬》关注中国芯片研制前沿,张扬华虹520精神。《炼狱》揭示贵阳息烽集中营的真相,生动刻画了当年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革命者群像。这些作品无疑都是红色主题叙事,撷取的都是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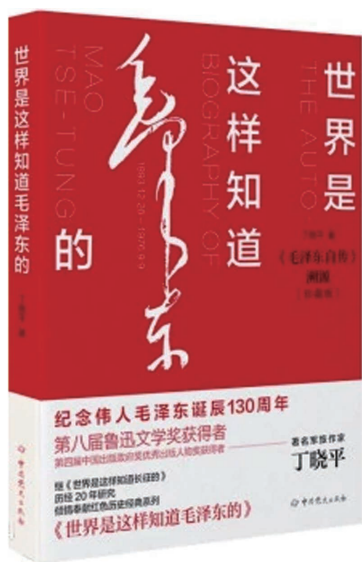
不独有偶,多位作家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了西部。徐剑的《西藏妈妈》和周桐淦的《和你在一起》分别聚焦西藏多民族大家庭对于孤儿的救助事业和江苏南通对口支援新疆伊宁的故事。《西藏妈妈》描写一群富于大爱情怀的孤儿的“代理妈妈”,表现人间深情和国家温度,体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作家们纷纷将视线转向边疆和多民族共同体,反映民族团结融合、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可能是当下及今后报告文学创作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对新时代新成就新征程新气象的描写,无疑受到了创作组织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特别的重视。叶梅、赵晏彪、贺颖的《雄安记》瞄准已经创立5年的国家“千年大计”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历程,展现雄安的创新与突破。杨黎光的《奔腾的深圳河》应和改革开放45周年,描述深圳河两岸香港和深圳两座城市的歷史发展脉络,堪称近现代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缩影。李春雷的《江山如画:水北镇的新生活》选取江西新余市的一座小镇,烛照党建引领商会给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风貌。张国云的《浙里风》则着力反映浙江省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进程。徐刚的《守望山川》用散文笔触,讲述福建建设绿水青山生态文明的故事。陈启文的《可可西里》以时间为轴,描绘西部广袤戈壁草原的保护与变迁。李青松的《大金山之本》和郭保林的《大江北纪》一短一长,分别聚焦北京的山和长江之水,具有抒情诗意之美。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王剑冰的《中国绿》反映的都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分别刻画“时代楷模”、退役将军张连印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情感饱满。钟兆云的《奔跑的中国草》反映中国菌草技术对外输出推广,特别是走进亚非造福当地百姓,这实际上讲述的是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故事。



纪红建的《大国制造》,选取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几家制造业的典型企业,将企业家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历程勾连起来,表现中国的“世界工厂”传奇以及“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艰辛历程。尹红芳的《杜鹃红》讲述江西瑞金革命老区100名红军后代脱贫致富走向乡村振兴的故事。李朝全的《天平如磐》及时反映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区深圳前海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生态文明、法治中国建设的进展,都是新时代的显著成就与发展标志,作家在这些方面捕捉题材、发掘主题,回应时代召唤,应和时代脉搏,这是报告文学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科技强国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科技自信自立自强是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2023年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如既往地笔触聚焦科技发展前沿成就,塑造科学家形象,弘扬科学精神,助推科技强国。杨黎光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以“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作为主角,展现其非凡一生。黄传会的《仰望星空》和《中国北斗传》以孙家栋作为主角,兼及诸多的航天科技专家的故事,表现中国航天事业不无悲壮的发展历程。李春雷的《中国之影》追述中国录影录像设备发展往事。火箭发射专家崔吉俊的《天路飞舟: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亲历记》以亲历者的记



《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书影

怀。丁晓平出版了《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追溯《毛泽东自传》出版传播经过。纪红建推出《游学·1917》，追忆青年毛泽东和同学萧子昇当年自费旅学在湖南境内开展社会调查的故事。王雄出版了《毛泽东号，永远的火车头》，生动揭示领袖号列车命名的来龙去脉等诸多历史内幕。何建明再版他的《红墙警卫》，从卫士长的视角讲述历史往事，还原一代伟人的形象，对于人们了解完整真实的毛泽东很有帮助。

革命往事和燃情岁月无疑都值得文学铭记。丰收《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消失的可可托海》回望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建设者在西部开发开采矿石的故事。青年作家康岩发表了《播火者郭大力》和《“辟路者”瞿秋白》，深情缅怀《资本论》的译者和一代革命先驱。王龙的《军人的荣耀》反映军队的仪仗文化，表现荣誉表彰对于军人的激励作用。这些作品都可归入红色题材，旨在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向社会传达正能量。

社会问题报告引人关注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事件、重大课题特别引人关注。三年疫情令人印象深刻，公共卫生事件事关每一个人，事关全人类。李朝全的《2020 武汉保卫战》，用详尽的资料和数字记录了三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新冠的人民战争。同样令人关注的是国人的精神卫生健康，李燕燕的《疾病之耻》聚焦令人讳莫如深的疾病以及疾病对于人精神和心理的矮化、耻化，她的《穿越焦虑》关注的则是精神病患社会问题；长江的《我用生命作证》聚焦肥胖问题和糖尿病对于国人的困扰，都引人警醒。

李燕燕的《“赢了官司”以后》描写欠债不还的“老赖”们的生存处境，揭示“法治中国”建设任重而道远。她和张洪波合著的《创作之伞》反映著作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是具有普遍性社会意义的法制课题。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医疗保险、社会就业、教育、环保生态等问题，都各具价值。陈启文的《谁在月夜哭泣》讲述“长江女神”白鳍豚的灭绝悲剧，带给人以深刻警示。马克燕的《向阳而居》反映高房价之下在大城市如何安居的课题。张

忆，真实还原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唐明华的《情到深处》倾情讲述郭永怀以身报国的动人一生。高鸿《大地英雄》和钟法权的《三测珠峰未了情》聚焦国测一大队，反映地理测绘事业的艰辛与成就。许晨的《生命至上》关注肿瘤治疗，刻画治癌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的生动形象。周建新的《中国“稻路”：超级稻诞生记》既是关于超级稻研发推广的史记，也是关于两位研究超级稻的科学家杨守仁、陈温福的传记，表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爱国为民精神的高度统一。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时代楷模”、“功勋人物”、英雄模范，都写出了弘扬爱国、敬业、奋斗、牺牲精神的有感染力的作品。

对革命者、红色历史、战争往事的描写也是主题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2023 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出现了一些描写和反映“抗美援朝”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譬如，李舫的《回家》讲述志愿军烈士魂归、遗骸还乡的故事，颇具价值。丁晓平的《胜战》深挖史料塑造五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形象。

2023 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关涉一代伟人的纪实形成一个小高潮，很好地抒发了人们的追念与缅

仲全的《现金哪儿去了?》回望人民币支付往事,关注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厉彦林的《“淄博烧烤”传奇》对2023年度的一大热门话题——淄博烧烤热及其兴衰历程进行深入的剖析,给人以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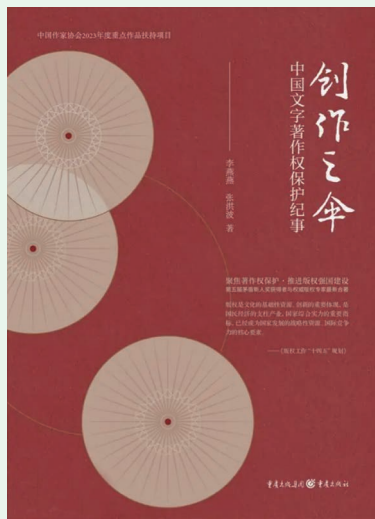
社会问题与人人相关,关于社会问题的反映表现特别是深刻的揭示与反思,必定是能够引起广大公众共鸣的,因此,报告文学作家理应在现实焦点热点问题方面多下功夫、深入开掘,写出真正能够呼应人民心声的佳作。

传记创作生机勃勃

传记作品的出版数量历来可观。传记创作包括人物传记和城市地域、山川湖海等方面的传记。人物传记中有不少是描写英雄楷模先进榜样的,其中既有历史人物,如杨义堂《河道总督》讲述明朝治河功臣潘季驯充满曲折的人生传奇;也有现实人物,包括以英雄为主角的,如钟法权的《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张雅文的《无悔的冰雪人生——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世界》;以普通人为主角的,如聂雄前的《鹅公坪》是关于家乡亲友老师等一众人物的素描和速写,特别是关于其大哥聂建前的故事尤为感人。

城市传记,尤其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传记业已形成一個创作和出版的热点。一些出版社策划组织推出了一批城市传记,包括《北京传》《南京传》《广州传》《深圳传》《成都传》等,有的城市传记还出现了多个版本,如《杭州传》,2023年就有王旭烽所作的,也有张国云写的,可见作家们对这一题材的热衷。城市传记如何写出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博物志般的知识性、趣味性、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艺术性,是作家们还需深入思考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梅洁的《大房山:千古一地》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探索。她用深情叙述和生动故事描述房山的千年历史,从周口店北京猿人到西周琉璃河遗址,直至隋唐开凿石经山佛经洞窟等。房山的悠久历史映射出了首都北京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底蕴。

山川湖海等的传记一直是传记创作的一个主要的增长点。赵德发的《黄海传》从历史到现实,反映黄海与中



《创作之伞》书影

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休戚相关。郭保林的《大江本纪》可谓是一部长江新传,以夹叙夹议、富于抒情韵味的文字,围绕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生态地理、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展开,具有百科全书、博物志式的价值。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阿来、徐剑、赵瑜、徐则臣等一批名家创作系列山川江河传“新山海经丛书”,无疑值得期待。

此外,报告文学青年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引人瞩目。重庆女作家李燕燕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王龙等几位优秀年轻作家获得首届“秋白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入选2023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等,彰显了报告文学生机勃勃、后继有人。

纵观2023年报告文学创作,主题创作一枝独大,传记创作兴盛依旧,而社会报告和个人自主选择的创作则较为薄弱。与此同时,借助“文字+”、音视频等方式制作的非虚构短片、纪录片等备受社会关注。报告文学如何从多媒体融合及“互联网+”、“移动+”中获取红利或获得双赢,是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和报告文学界应当认真思考并拿出切实举措的问题。如何大力增强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何有效提升报告文学的传播力与社会影响力、真正推动报告文学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文学界每位有识之士面前的迫切课题。■

如在梦中的镜像空间

——评章雨恬《最后的夜晚》

Article- 李松睿 Li Songrui



如何让狭小逼仄的房间显得更加宽阔？家居设计师会告诉你，让我们在墙上添加一面镜子吧，那么至少在视觉上，空间似乎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倍。但如果在镜子对面的墙上再加装一面镜子，那么镜像与镜像之间的无数次反射，会让现实空间的物体无限增殖并延伸到远方，使原本显得敞亮的房间瞬间增加了几分神秘幽邃。章雨恬的中篇小说《最后的夜晚》之所以会带给读者某种神秘、恍惚、如在梦中的阅读感受，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小说《最后的夜晚》的主体情节并不复杂，它以女主人公于颖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她与男友胡嘉阳参加的一连串以“狼人杀”游戏为主题的聚会。由于聚会的场所总是选在黄雁南的家里——一座远离都市喧嚣的豪华别墅，带有幽闭空间的性质，又是在里面玩以“杀人”为乐的桌面游戏，使得这个场所非常适合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最近十余年来，“杀人游戏”“三国杀”“狼人杀”等桌面聚会游戏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极为流行，很多年轻人乐此不疲，甚至专门在线上苦练技艺，并总结出适合各个角色的指南或攻略，使得这类游戏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之一。

实际上，这种流行的游戏体验也深度影响了当下的文艺创作，诸如麦家的《风声》、小白的《封锁》等小说，都将主要人物禁锢在某个古堡或旅店等封闭空间内，通过寻找人物对话中的蛛丝马迹来发现真相，这些作品几乎可以算作“狼人杀”之类游戏的文学翻版。这样的小说由于让所有矛盾集中爆发于某个具体的环境中，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舞台感，更适于表达情绪，能够展现的生活世界相对有限。只不过在中长篇小说里，由于作家可以有足够的篇幅从容叙述人物的背景、经历，完整呈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解释其行为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缓解“狼人杀”结构所带来的那种逼仄感。不过在篇幅更短一些的小说创作中，以“狼人杀”来串联整篇作品则会给叙述带来比较大的麻烦。在“狼人杀”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要根据抽取的纸牌确定预言师、狼人、女巫以及村民等角色，并据此选择自己推理、辩白过程中的言辞和策略。因此，游戏中的人物只是固定的角色，其行为由身份所规定，并不具备个性化特征。以这种方式塑造人物，很容易使人物变得呆板、单薄。

好在，章雨恬就像文章开头处那位家居设计师那样，

找到了一种设置镜像、拓展空间的应对方式。在《最后的夜晚》中，作家将主人公于颖参加“狼人杀”聚会的故事切分为五个部分（以数字排序），在各部分之间插入四段关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情感与生平经历的文字（以字母排序），并将伯格曼《犹在镜中》里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放在小说开头。关于伯格曼的部分看似与于颖的故事毫无联系，唯一将它们关联在一起的线索，或许是于颖在读电影学硕士时研究过新浪潮“圣三位一体”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的空间叙事。因此，有关瑞典导演的文字有可能是于颖阅读伯格曼自传的学习心得。在这些叙述伯格曼的段落最后，小说专门指出：“听到这番话有何感想，英格玛·伯格曼没有在自传中提及。他终其一生兢兢业业扮演的假面游戏，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判断上。”也就是说，虽然《最后的夜晚》花了很多篇幅叙述伯格曼一生与父母之间颇为复杂的内心纠葛，以及他将电影作为毕生事业的心理根源，但小说真正试图呈现的，是伯格曼错认生活并逐渐认识真相的过程。

考虑到伯格曼的一段文字是小说《最后的夜晚》的题记，那么有关瑞典电影大师的段落显然构成了对作品主体部分的解释。在于颖的故事里，女主人公硕士毕业后来到杭州，考取了当地与电影毫无关系的公务员，从事枯燥乏味的公文写作，如果不出意外，她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愉快、舒适却有些普通、乏味。然而，正如伯格曼通过电影这种造梦的艺术形式逐渐认识了自己一样，于颖也在一次又一次参加“狼人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小说写道：“我（于颖）并不是表面上那副样子，体内具有某种‘亟待唤醒的野性’。但有谁是表面上那副样子呢？我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扮演角色，试图将自己伪装成与真实身份毫不相干的人，我们审判别人，也被别人审判。总有一个夜晚，我们都会抽到狼人卡牌，化身为那个看不见的凶手。”显然，作家通过在正文中穿插四段有关伯格曼的文字，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于颖参加一系列“狼人杀”聚会的线索。在小说的结尾，于颖的生活溢出了那条一眼望到头的轨道，她那长期压抑的激情突然爆发，与聚会中一位长相帅气的男青年发生了一夜情。这让她重新认识了自我，并选择与此前的

生活决裂，既离开“狼人杀”聚会的小团体，也与男友胡嘉阳分手。

可以说，正是穿插四段有关伯格曼的文字，使得“狼人杀”聚会那种散漫、逼仄的格局，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整饬感和更加开阔的气象。不过，如果止步于此，一方面，小说的意义会变得十分确凿，缺乏玩味和揣摩的空间；另一方面，作品结构也会因为于颖与伯格曼之间的对位而显得过于工整。毕竟，生活永远是阔大、浩瀚、横无际涯的，清晰的结构固然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对生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其实是以剔除生活的复杂性为代价的。小说《最后的夜晚》的有趣之处，是作家设置了一些意外、偶然和巧合，用来源于生活自身的枝蔓来中和形式所带来的整饬感。一个例子是，于颖第一次在“狼人杀”聚会上遇到文野时，两个人的生活仿佛仅仅因为桌面纸牌游戏才产生了交集；直到小说结尾两人发生关系前，作家才指出他们其实早在大学校园里就认识，当时文野在戏剧社曾力主将于颖创作的剧本作为毕业大戏的脚本。另一个例子是，玩“狼人杀”技术最好的卡朋曾在游戏中宣称“我杀过人”，这当然会被大家视为一句戏言。但很快，电视上就传出卡朋杀死父亲后分尸的新闻。这些偶然与巧合，仿佛是在小说空间中竖起了第二面镜子。如果说伯格曼那面镜子的出现，让小说有了形式感和确凿的意义，那么第二面镜子的出现，则干扰了读者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使生活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意味。因为偶然与巧合在不停地向我们暗示，生活的表象之下，有可能存在着数不清的暗线，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简单。这种不确定性，既为小说《最后的夜晚》增加了神秘的气氛，也向读者暗示，小说所描写的其实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加幽邃的领域等待着人们的探索。

从小说《最后的夜晚》来看，章雨恬虽然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但已经展现出非常出众的写作才能。年轻从某个角度上看，意味着生活经历有限，使作品可能无法去表现生活的广阔。但章雨恬并没有被这一点束缚，而是出色地运用多种形式技巧，成功地绕开了生活表象的藩篱，开掘生活的幽暗面向，并向着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进军。相信伴随着写作经验的增长，接受生活的历练，章雨恬能够写出更加精彩的作品。■

新时代宏大叙事中的网络文学表现

Article- 朱 钢 Zhu Gang



在新时代文学中，网络文学具有独特的青春活力和亲和的表达方式。随着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的持续深化，关注新时代生活、书写现实题材已成为网络文学新的发展面向。广大网络文学作家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新时代生活现场，将个人的创作与新时代的广阔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网络文学的方式为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海量的作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自2023年起开启在场性的评论，举办了12部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共同探讨网络文学的新时代发展路径。

厚重与轻盈相结合，书写新时代伟大实践

反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事要事彰显恢宏的时代，是网络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网

络文学作家胸怀“国之大者”，在深度体察生活的同时，发挥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大众性优势，用好故事展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关键行业的突围和重大的发展战略。许多优秀作品抓取网络文学创作的优质经验，多方借鉴传统文学的优势，显现了网络文学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新的叙事路径。

匪迦的《关键路径》关注大飞机制造，以点带面书写强国之路，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并主动践行网络文学作家的新时代使命和责任。将专业感、职业感和生活感融为叙述整体，是这部小说的引人注目之处。小说以科技为内核，突出行业的独特性，并将此作为叙述的硬支撑。专业、密实的科技知识，既呈现了大飞机制造乃至航空业的内在与背景，又从侧面展现了我国科技界的自我奋斗与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充分尊重科研生产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以写实性的手法呈现该领域的魅力，真实地书写遭遇的困难和受到的掣肘，给人强烈的阅读代入感，并形

成真实可感的叙述张力。把专业性写得有滋有味,无疑是这部小说令人欣喜的成功之处。书中的主角杜浦和叶梓闻等都是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他们在重大使命、规则程序和个人生活等之间艰难抉择与前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步入社会的心路历程。对外交往的文化差异、同事之间的性情之别以及生活中的相异追求,相对独立又纠缠交互,构建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全空间。新时代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富矿,将网络文学所积累的经验释放到现实题材创作中,是网络文学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网络文学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路径。

何常在的《三万里河东入海》将目光聚集上海,注重整体性和本质化观照世界和人生,强烈的时代感、社会感和生活感成为叙述的坚实质地。“气场”是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和审美品质,与现实保持了通达的呼应。厚实则是其之于时代的切身体会和浓郁情思,小说体现出了何常在对现实生活的持久关注,并具有一定的思想力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这部小说最为得力的叙述形态。在主题与话语层面,尽显时代之于人的生活表层以及内心的浸润,艺术性地将大与小统一于叙述中。小人物的奋斗足迹是大时代的音符,这意味着大时代的弦动,都会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产生强烈震动。小说以讲小人物故事的方法,观摩和体现时代之于人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小人物如同一片镜子,映照出社会整体面貌。这样的映照因小而极具质感,因小而十分清晰,更因小而无比真实。写小我,但不陷入小的狭窄,不沉沦于小的自私,其实是写大的另一个向度。当我们把“大”与“小”置于同一个话语系统观察,会发现“大”与“小”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了。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更是一种审美意趣,有关文学,也指涉我们的生活与处世,与社会伦理和人生哲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三万里河东入海》在重与轻、大与小之间达到了文学性的统一,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可供参考的重要选项。

懿小茹的《我的草原星光璀璨》地域风情浓郁,乡村生活鲜活,具实的风土人情是故事坚实的背景,也具备别样的生活气息和审美特质。特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物行动贴合得很紧,既有网络小说轻盈的姿势,又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意趣。这是一部描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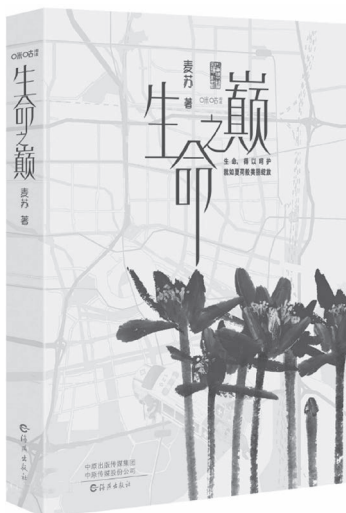


《我的草原星光璀璨》书影

说,同时又是一部比较有个性的成长小说。书中写到蓝董时下乡扶贫,与乡亲们相处,特别引人注目。城乡之别在这里依然存在,无从否认,但城乡又能和谐共存,这是文学的表达,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体察与期许。蓝董时在与乡亲们交往时,知道自己离开乡村多年,对现在的乡村不甚了解。她的诚实源于她对生活的基本认识,对不同文化和环境的理解。就是这样的真诚,让蓝董时的成长图景特别清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乡亲们在文化、情感、人情伦理上步步成长。新时代以来,乡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现代意识与现代文明已经启程。从农耕文明的家园眺望现代文明的天空,未来的乡村之路该如何走,这部小说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指向。这就是深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开双臂拥抱美好的未来。这是生活的行走,也是文化和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小说里的两条成长线,是新乡村叙事中极有意义的生活认知和创作手法,让我们对新时代乡村叙事和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实践的可能。

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不平凡

关注日常生活,描绘普通人的平凡日子和人生滋味,是网络文学的天然优势。网络作家以生活化的视角,关



《生命之巅》书影

当的抽离与沉淀，既坚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又呈现生活审美的文学距离。小说既有活泼的网感，又展现日常人生的秀丽。特殊职业带来的陌生感与心路历程的共情，让小说具有了陌生的熟悉感。这之中，对“守护”的文学之意与生活之本的书写，值得尊敬。主人公间的双向守护，传达了心意融融的爱情观。他们在工作中赤诚地奉献智慧与勇敢，真心且无畏地传递大爱，显现了年轻一代关怀社会的情怀。

麦苏的《生命之巅》带读者走入鲜为人知的医疗救援现场，以一个个救援故事缀连起整篇故事。少年溺水、马路碰瓷、车祸受伤、老人重病、孕妇早产、雪灾群众被困……这些遭遇是人们生活的意外，却是救援人员的日常。在意外与日常之间，小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与人生，捕捉人性的纹理，聚合温暖与感动。事业、成长、情感等诸多线索的交汇，呈现了人物生活的广阔领域，丰富了故事的深刻内蕴。救护车司机钟景洲、随车医生夏沫和随车护士张冬组成的医疗救援“三人组”，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他们性格各异，对工作和生活都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标准。因为救援工作，他们渐渐成长，找到了人生坐标和精神支撑。令人欣喜之处在于，这样一部情感浓郁、成长意味浓厚的作品，有关医疗救援的知识成为重要硬核，既助力塑造了人物形象，又让读者在爽感中对医疗相关知识，尤其是紧急求助有一定的了解。《生命之巅》以行业文为基本框架，鲜活的人物和好看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成长与奉献，充满温情的正能量。

从家庭到两性，再到女性的自我世界，蒋离子的《糖婚：人间慢步》呈现了女性成长和自我确认的历程。重建女性世界，寻求自我解放，体验并改变两性关系，将婚姻生活与人生行走融于一体，是《糖婚：人间慢步》的叙述个性。小说中的安灿、林一曼、何夕、陆玲玲等女性与男性有不同的对话方式，但都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男权意识的反抗，也是自我苏醒和主动性的强势发力。女性视角是这部小说不可忽视的特点。女性对男性的所有认识，均来自目光所及或言语的表达。尊重女性的感受，成为鲜明的姿态。在细腻的情感和写实的叙事中，蒋离子对两性都有极大的包容，满怀同样的尊重和理解。事实上，她把所有人物都置于可见可感的

切平常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以自我的正能量擦亮生活。人人都是平凡生活里的英雄，这是网络文学叙事的鲜明立场。这些日常性的叙述，向下深入生活，向上通达精神高度，讲身边人的故事，见证他们的奋斗与成长，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风晓樱寒的《逆行的不等式》以封静与秦峥的爱情为线索，立足现代都市言情小说的情感支点，对类型化小说进行了突围性叙述。小说聚合或穿插诸多网络文学叙述元素，以此拆分小说的固有类型，并进行融合性的重建，使作品的讲述有了新的动力和面貌，又与生活的丰富和新鲜形成互文性的同构。讲述方法应和生活的质地与表情，或者说，由生活之情形生发的叙述方法，是这部小说引人关注之处。中医封静和排爆手秦峥的职业所延展的人群和社会面其实很大，但又常常在日常生活之外。他们所接触的人和事，大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又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我们共同的生活。因此，叙述的空间和内容得以扩容，扩展了表达现实生活的视野。小说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方式作为故事的主体存在，以传统中医的当下发展和排爆这一新型职业为线索，以职业紧贴生活的逻辑展开想象与虚构，现实生活的隐喻和文学表达的具实得到较好的互动。风晓樱寒采取了适

生活中,尤其是安灿那些所谓的富人,也被放置在一个世界,她们的情感和婚姻也具有平常人的现实性。蒋离子自信地运用网络小说的大众化叙事,以此真诚地参与生活,最大限度地映射我们的日常生活。小说关注的是婚姻,而且是汹涌无比的离婚潮。然而蒋离子的叙述动机相当明确,就是带我们走进他人的婚姻生活,并非为了控诉婚姻,而是在那些裂缝中看到光亮和希望。为人点起一盏灯,传递温暖与希望,这是文学与生活的双重至善,也是《糖婚:人间慢步》极具文学审美的暖意。

以当下为坐标,铺展跨时性对话

网络文学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中,具有极强的叙事能力。以当下与历史、未来对话的方式展开叙述,让历史与未来走到读者面前,这是对民间叙事传统的现实性运用。

骁骑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讲述了旧、新上海长乐里生活的人们的爱恨情仇和家国情怀。这是一部情怀之作,集聚了个人经验和过往历史以及集体记忆,在“小人物”与“大社会”间展开精神性的书写。将几十年的时间压缩为一个瞬间,身为穿越者的赵殿元并没有超能力,只拥有过去生活的鲜活记忆,他以记忆复现满足了当代人走进历史的渴望。骁骑校保持了网络文学编织故事的优势,调用了众多网络文学成熟的叙述元素和手法,是一部网感很强的小说。灵动的语言、率性的表达、节奏感极强的叙述,应和了时代与生活的气韵。地域文化的艺术性加持、生活质感的真情书写,以及对于人性丰富层次的表达,都体现出网络文学写作少有的耐心与从容。将网络文学叙述的技法向叙事审美进化,注重故事的隐性诉求,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中张扬宏阔的时代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文学性,提升了作品的整体品质。当我们将《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视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时,其实也就是看到其中非常规、有新意、有力度的革命叙事。骁骑校在俗常生活中写出了英雄的不平凡,在人性、情感和精神之间寻找隐秘的关联,既拓展了日常叙事的深度,又回归了革命叙事的初心。

古兰月的《酒坊巷》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真实动人、情感饱满、大义高蹈,网络文学的故事性得到充分释放,纯文学的质感也很强,在将网络文学的节奏与纯文学的表达进行结合后,故事讲得有爽感,又浸润人心。小说并没有过多地直接书写战争,而是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凸显了人们因战争导致的不幸,因凶残产生的悲愤,进而以另一种方式控诉战争。小说在宏大的视野下,注重关注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和生存处境,战争摧毁了家园,撕碎了生活,但人们的赤诚和善良没有变。小说对小人物的刻画比较成功,这些人物如我们的左邻右舍真实而亲切、朴实而坚韧。在战争的挤压下,人性的明亮与灰暗得到充分的显现。在家仇国恨和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放下个人恩怨、儿女私情、日常算计,从细微处透射出厚实的家国情怀。小说的叙述因小人物的闪亮而共情,小说的感染力因小人物的大情怀而得以升华。对于故事的发生地酒坊巷,有许多日常化表达和传统文化书写,既贴合故事的发展,增进了故事的感染力,又对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度挖掘,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提升了文化形象和旅游关注度。以网络文学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求并书写地域性文化资源,进而助力文化旅游的发展,《酒坊巷》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年轻的网络作家天瑞说符伸展网络文学创生优势,借力科幻小说之能量,在人类科技和中国语境里实践“网络+科幻”的创作,既表达了科学理性维度中的想象前行,又积极引入中国哲学的底色,在科幻世界与现实生活中进行了有效对接与映射。小说将极富个性的想象力化为叙事的肌理,硬核科技与柔软的文学生命互为助力。叙述既有青春的活力,又极具文学的老成,将网络文学的灵动讲述与传统文学的叙事内蕴进行了很好的整合运用。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和情感特质在小说中得到真实书写和温情表达,“我们的情怀”成为一种叙述力量。

幻想照进现实,在另一个维度观察和指认生活

网络强幻想类小说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为精彩纷呈的神奇世界,但直击心灵的一定是对生命伦理和人文精神

的检巡和张扬。紧贴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进入年轻人的内心图景,在情绪与心念上观照年轻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以文学的方式回应年轻人的生活,在想象中赋予现实生活真诚的思考和前行的力量,网络文学大有可为,也能大有作为。

以穿越、星际和机甲等强想象的元素,多种类型重组新的叙述,建构一个人的成长史,《我要上学》轻松诙谐、网感丰沛、爽感频现,内里的精神亮色又极具生活性与现实感。从工程师穿越为失学儿童,陷入困境后重新起步,穿越在这里起到了转折命运的作用,在人的成长和生命前行中,有着可供体味和参详的象征意味。小说以多种反差的张力构建良好的叙述节奏,女性纤柔与机甲阳刚、军营的严肃与日常的活泼、成长之艰难与生活之乐趣,调和为人物活动和故事铺陈的韵律,既提升了阅读效果,又丰富了叙事内蕴。在此,我们感受到红刺北对于小说叙述的艺术性节制和个性化的寓意。卫三的大女主形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逞强与霸道,而是体现出她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勇敢和豁达,是自主掌控命运的自信表达。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我要上学》在呈现卫三这样一个辨识度极高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对她周边人物也有较好的群像书写。他们性格各异,能力有高有低,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是相同的。随性之中有纯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往,成长之路上彼此既有高下之决,更有目标一致的团队合作。这是年轻一代所向往的生活氛围和人际交往的鲜明表达,也是小说如阳光一般可贵的品质。梦想与现实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辉映,为网络文学的强幻想类小说开启了“破圈”的新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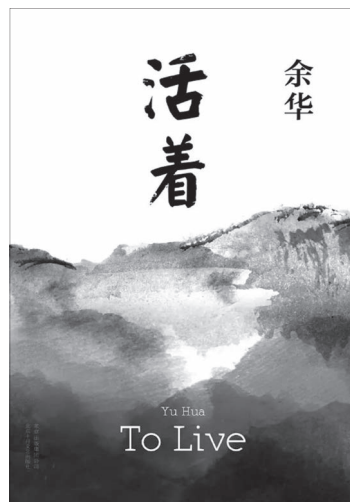
伪戒的《永生世界》以“元宇宙”为核心元素,在宏阔的视野下构建了极丰富且细腻的世界观,展示了具有很强现实感的未来可能。严谨的科学逻辑、磅礴的想象力,以及厚实的人文关怀,增强了阅读的爽感,注入了诸多令人深思的意味。在叙述上,作品遵循且娴熟运用了科幻小说的基本法则,又以多类型融合的方法进行新的探索,为网络文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悬疑的层层推进、有节奏的反转,巧妙设置的结构和对人性的多向性剖析,形成强劲的叙述张力。在萃取类型之长的过程中,小说特别注重新科技、新文化、新潮流之于生活的

影响,将类型特征与当下生活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有机互动。因科技的力量,人们借AI机器人得以永生,人将如何存在?人与AI机器人如何共存?显然是未来之事,但又饱含当下之情。《永生世界》在科幻视角上,抵近了我们的想象极地,但个中的追问与思考又聚焦人生之根本,十分具有当下性和恒久性。当抽离科技与想象,我们会发现《永生世界》中的故事都是对现实中的热点事件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延伸或演绎。关怀生命、考量人性、追问欲望,在一个虚拟世界凝视和体味具实生活,《永生世界》深入人心,共情满满。

杀虫队队员的《十日终焉》是一部智力、心理和人性博弈的作品,层层递进又常常横生枝节的推进式叙述与不断出人意外的反转,成为故事发展的核心动力。小说以极小的入口开篇,在向纵深的行进中丰富和辽阔,智性地为世界观开疆拓境,无限流成为最耀眼的品质。作为典型的游戏元,这部小说的题材、架构、叙述样式都是对游戏的模拟,底层逻辑、悬疑原理、基础规则等更是游戏的深度浸透。《十日终焉》吸收了大量游戏的叙事经验以及玩家的参与体验,阅读者成为另一种状态和情境的游戏者,颇有多重梦境之感。网络文学新一代的作家和当下主要的阅读群体,他们的生活有游戏的陪伴,生命体验与虚拟体验的边界正在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互为投射。杀虫队队员在游戏中注入了众多中国元素,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与活化,更是在指认我们的文化心理和现实生活的文化背景。小说以“说谎者”齐夏为主叙述视角,说谎者的身份暗示语言的不确定性,可在现实中语言不再仅是交流的工具,已超越行动,成为生活中的主角。内在的无声语言,即人物的心理活动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大量的心理描写,表明人物外在的喧嚣与内心的思考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观照,这是当代人生活的真切描摹和文学呈现。此外,《十日终焉》中的人物在游戏中,处处有生活滋味和经验的参与,指向现实的人生态势和精神颤动。随着人工智能对现实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游戏将不再是绝对的虚拟世界,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延伸,甚至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改变网络文学的叙事生态,这在《十日终焉》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和表达。■

余华《活着》的读者接受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

Article- 项 静 Xiang Jing



《活着》书影

1990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余华的《活着》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在官方、商业和民间的文学排行榜单和影响力图书榜单中,几乎都有其位列前茅的身影。《活着》的发行量在严肃文学领域中与《平凡的世界》并驾齐驱,近年来还有超越之势。截至 2023 年销量已超过 2000 万册,仅 2018 年一年销量即达到 200 万册,如果加上盗版和电子阅读量,其阅读量还有较大的想象空间。2009 年《活着》和余华另一部经典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一同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 10 部作品”。除此之外,《活着》还获得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泛社会影响力,1998 年《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4 年被评为《中国时报》十本好书,2005 年余华因《活着》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4

年 3 月余华凭借小说《活着》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 年《活着》获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14 年获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并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 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余华作品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活着》传播的路径传奇、丰富、全面,是纯文学传播学上的经典案例,如果作家有所谓的命运齿轮,《活着》显然是余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

《活着》发表于 1992 年第 6 期《收获》杂志,发表之初几乎无人可以预见到后续的传播盛景。王安忆在 1993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非常谨慎地谈到这部祛除了余华早期色彩的作品,她注意到余华对世界基于时间的



1992年第6期《收获》

理念化表达：“余华确实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界的图画，这图画不是表面的，但究竟是不是世界的核心，我不知道；是第几个层面，我也不知道。时间是一种容易使人悲观的东西，它总是在流逝，而且不可逆转，它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失去，它使我们作出人生一无所得的结论。”程德培在《活着》中看到余华这样的青年作家表现出来的一种新质，对于旧社会生活的书写技术和表达热情，远远超过对新时代生活的表达，“表现出一种驾驭时间的能力，这些作品把历时代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描写得栩栩如生”。陈思和认为“《活着》在写法上很机械，又重复，这还是形式的问题，形式可以给你造成一种张力，一种想象。而《活着》仅仅是一个拖沓疲惫的故事”。阿航给出了难得的高评价，“在如今这疲软、沉寂的文坛，《活着》如一颗耀眼的星星挂在天际上。余华从那条细得不能再细得小道上脱颖而出，更准确地来讲，是余华成熟了。他已经是在凭‘底蕴’来写小说，而无须过份地依赖其写作技巧了”。另外，在《活着》发表之后的两年内（1993—1995），当时的新锐评论家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汪民安等都发表了有关先锋派写作和余华作品的专论文章，文章内容大都在讨论先锋文学的话题，比如先锋性减弱、先锋文学中的绝望、死亡描写、苦难意识等话题，在论及余华时基本都到《细雨与呼喊》为止，较少提及《活着》这部新作品；作为作品例证偶尔提及，也依然在先锋

文学的语境中强调其画面感和历史表达，没有予以特别关注和单独阐释。由此可见，相对于《活着》后续在读者中的超高人气和国际影响力，虽然有个别同行给予肯定，但在当时的批评家视野和文学语境中并没有获得特别关注和认可。

余华《活着》从早期的无名状态，转而进入大众视野，与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有着重要关系，在小说发表之前，余华已经把《活着》的电影版权卖给了当时声名日盛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1992年11月，张艺谋先买下余华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的电影版权，在剧本讨论时，余华把即将发表的新作《活着》也拿给张艺谋看，张艺谋对这部作品更感兴趣，故事的张力和画面感非常适合拍电影，他决定提前拍摄《活着》。1992年《收获》第6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活着》，是《活着》的初版本，字数不到六万字，文末署明创作日期为“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初版本故事架构已经完成，参考导演、文学策划和编剧的意见，余华在写剧本过程中对小说做了一些修订和改写，“多写了大概4万字，后来我觉得这4万字写得挺好的，就把它放进了书里。出书的时候就变成不到11万字，从一个大中篇变成一个长篇，就是今天的这个版本。二十年没有修改过。”1993年11月，修改后的版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由此，后续长篇初版本（1993年）、作品集版（1995年）、“南海版”（1998年）、上海文艺版（2004年）以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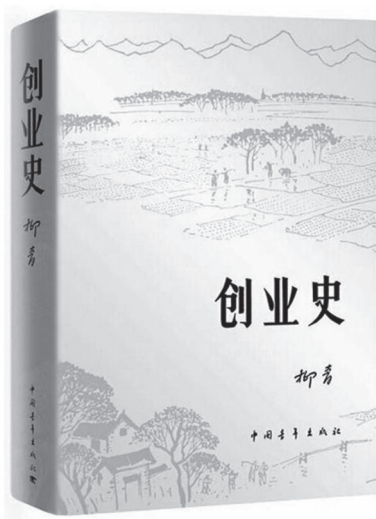
版 25 周年特别修订版的定本(2017 年) 差异不大,作品即来自于 1993 年这次从中篇到长篇的修订和改写,这一版本即大众图书市场和读者最常接触的“畅销书”和“畅销书”。本文所谈论的《活着》是以 1993 初版本为基础的长篇小说,版本是出版 25 周年特别修订版的定本(2017 年)。

作家马原看过余华《收获》版《活着》后,对小说印象不深,对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也不满意,但他高度赞赏修改后的长篇初版本:“长篇版《活着》有着中篇版、电影版所没有的节奏,充满信心,大步往前去;舒缓、平实,具有了可以让人触摸的质感。而这些都是余华先前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即便如此,《活着》出版之后,作品也并未一炮打响,而是在时间的淘洗中逐渐浮出水面,从默默无闻到为业内和读者所知,大概经过了六年时间,直到 1998 年“南海版”上市才成为畅销书,在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出版社几乎以每个月加印一万册的速度来满足此书的市场需求”。《活着》和后续受到关注的《许三观卖血记》让余华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积累了巨大的名声和口碑,并逐渐获得专业读者和专家的认可,“1996 年以后,‘系统化’‘学术化’的评论文章与日俱增,‘先锋’与‘转型’成为了文学批评的轴心词汇”。当时主要的评论家陈思和、陈晓明、吴义勤、洪治纲、郜元宝、谢有顺等人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余华的小说在叙事、思想上日臻表现出独特性,并从民间叙事、先锋转型、写作主题、文学史定位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解读和阐释。基于前期的积累和长时间的书写断档,2005 年的《兄弟》、2013 年的《第七天》、2021 年的《文城》一经出版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活着》是福贵的个人故事,贯穿其生命之初、浪荡青年到凄凉的晚年,隶属于小说写作中常见的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模型。小说一开头即强调福贵这个人的特殊性,他是叙事者“我”收集民歌时偶遇的奇怪老头,生存于迥异于都市文明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乡村民间社会,作者用一系列野趣和轶事来描述,粗野而直接,充满着荤故事与酸曲。在这个独特空间中,福贵还有其独一无二性,“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

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所以小说提供的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的故事,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福贵的一生经历,从纨绔不羁的青年时代到落魄波折的中年,再到孤独无依而又自我释怀的老年。

福贵的个人故事所依附的是中国近现代近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从民国晚期到解放战争的内战和政权更迭,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与灾难,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福贵的生活在世态变迁中浮沉起落。在个人与时代的交接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抛物线。除此,福贵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人。在具体历史时空之外,通过重复性的“死亡”和磨难书写,他的生活获得了超越现实的哲学意义,《活着》可以看作是抽象的中国人的故事,所以余华把这部作品总结为:“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从福贵亲人死亡的一次次重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具体转向抽象的痕迹,从肝肠寸断到慢慢接受苦难,“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到了小说结尾,往事人迹俱退出,呈现的是抽象的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是走过的男人和永恒的田野霞光,走向唯美的抒情和赞颂:“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余华引述法国出版商的话:“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动派吸引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是狂飙突进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作家竭力表达的集体意识,提供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故事和情感。创作《活着》时的余华告别了早期叙事中的愤怒和冷漠,整体写作风格走向写实和故事化,侧重于表达对生活和世界的深入理解。“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



柳青《创业史》书影



路遥《平凡的世界》书影

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经过对早期写作的反思与新的思考,《活着》是余华重新建立与现实、历史、文学传统对话关系的作品。

纵观福贵的一生,我们可以从中摘取出中国人的“创业史”和家族故事,从根本上讲也是在重新讲述从柳青《创业史》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业故事。《活着》里面隐含了中国人的创业史和败家史——“从前,我们

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后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变成了鸡,现在是连鸡也没啦。”徐家是乡土中国社会的代表性家庭,拥有祖上创业带来的土地和田产,福贵的父亲不铺张不骄奢,享受着乡村地主自足的生活,与周遭世界保持着有机的社会关系,家有义仆,享受佃农们的尊敬,遵循着基本的道义和原则。徐家跟城里米行老板通婚,是基于同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在没有战争、灾异和家庭变故的时候安稳度日。抛却阶级视角,福贵与梁三老汉、梁生宝和孙玉厚、孙少安等一样共享丰衣足食、家有居所、美满幸福和子孙繁衍的生活前景,这是中国文学中反复被叙述过的普通中国人的诉求和情感。《活着》是对这种类型中国故事的一个反转,拥有中国故事的基本叙事模型和结构,但又终结了这个正向的故事,走向其反面——“失去”与“败家”的故事。

《活着》延续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大历史叙事与国族叙事的基本架构,个人的故事与国族的故事交叉融合在一起,叙事上有“简易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意味。与一般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近现代历史的写法不同,《活着》的最后落脚之地是“个人”:哲学意义上的活着,中国人的智慧,个人与大历史没有实现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中的共融与合围,而是走向另一种更抽象的纵深。

另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业史”叙述中,女性很少承担主要角色,但又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支撑。福贵的太太家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读过新式学堂,穿月白色旗袍,和女伴一起读书上学,穿着做派是新女性的样子,穿高跟鞋走在石板路上,头发齐齐地挂到耳根,漂亮时尚,但她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新女性形象,比如《伤逝》中的子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们都拥有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家珍与福贵走入婚姻,小说中仅用一句话就交代了来龙去脉:“快去找个媒人,我要把城里米行陈老板的女儿娶过来。”婚后,家珍对福贵在城里青楼花花绿绿的事情心知肚明,明面上从不表达不满,只是弄些拐弯抹角的点子去敲打他,逆来顺受,福贵在外面胡闹,“从不说我什么,和我娘一样”。家珍的

形象有一种反启蒙的色彩，她经历了中国历史中女性解放的阶段，但却任劳任怨、任打任骂，她不在意福贵的穷困潦倒，跟福贵娘、凤霞一样，像女性天使一般宽慰扶持着遍历磨难的福贵。家珍顾名思义是家庭中的珍宝，也是中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地母”般的女性形象，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形象，而是苦难和悲情大地般的承载者。凤霞这种女性形象与小说中人物如春生、队长等，模糊了先进与落后、阶级和阵营的界限，走向支撑一个人更恒久稳固的东西——善良、韧性、良心、道义等，他们表现出理解、接纳和抚慰的情绪价值。小说中涉及家庭生活的细节非常之多，家珍的任劳任怨、凤霞的善良与隐忍、有庆的淳朴和天真，大历史之下陋室之内的一家人，正是靠着丝丝缕缕的爱与珍惜，让人感受到活着的价值。小说中的春生，是福贵曾经一路同行的战友，却间接害死了有庆，家珍不肯原谅春生，但在春生被打倒、失去活着意志的时刻，她选择了原谅，希望他带着歉意活下去。福贵一家与春生之间复杂的感情，有庆羞怯的难以表达的爱，凤霞对家庭默默的奉献，二喜对凤霞的珍惜，福贵抱着有庆的尸体不忍下葬，等等，是很多读者喜欢在读后感中分享的“催泪”细节，正是从这种细节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共通的情感、历史真实和生活态度。

西蒙·舒斯特总编辑迈克尔·柯达在《畅销书的故事》中说：“畅销书是有规则可循的，但并不局限于真正有天分的作者，也不适用于所有人。你唯一能确定的是，不管在文学类或非文学类，说故事的能力皆为重要的关键，对熟悉的主题，能提出崭新而有趣的想法，大概是最核心的技巧。”《活着》在内容上并没有标新立异之处，这也是早期精英和专家读者对其并不推崇的客观原因，但在熟悉的主题、故事上，余华贡献出了崭新而有趣的想法。第一，在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家族故事和民族国家的故事上做了自己的修订与改写。主角福贵成为传统意义上家族故事的终结者，他以一己之力败光了祖上家产，在时代沉浮中没有守护住自己的妻子和子女，走向个人英雄主义的岔路，与民族国家和大时代叙事的路径分道扬镳，最后孤身一人面对整个世界。第二，《活着》承担了“简易版中国近现代史”的普及作用，以聚焦一个人的简洁方式剔除了繁冗的背景描写、社会局势交代和人物心灵斗争的



[美] 迈克尔·柯达著《畅销书的故事》
卓妙容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摹写。这个故事内在于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常见的“时代与人”的故事模式，拥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接受领域，然后在各个细微的部分，做出了自己的逆反、背离和独特造型。第三，《活着》在时间河流中载浮载沉，携带了两岸的风景与沉积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故事，它是读者接受与作家不断重新生产和再造的《活着》，与时间共同“生长”，这是《活着》在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特殊性。

《活着》出版以来，余华不断去阐释这部作品。在1996年韩文版自序中，余华列举了《活着》故事的各种含义，首先是一个人与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其次，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再次，《活着》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最后，《活着》还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历史。这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自我解读，囊括了各种可能的抽象和具体的涵义，从中国历史到个人、命运、苦难、承担等。



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

而在 2002 年日文版自序中，余华明确地缩小了对这部作品的解读范围，把它归结为“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2002 年英文版自序中，余华把《活着》中的福贵与美国民歌《老黑奴》中的人物相对比，他找到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类似的人物形象，找到了福贵跨越边界的共情之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同一个人。2007 年麦田版本自序中，余华强调了自己使用两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匠心：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他拒绝把福贵放在观察对象的位置，而是将其塑造为一个有着独立认知的讲故事人。“《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余华的阐释从早期丰富具

体的内容逐渐向抽象的人转化，他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权益最大化。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唯一阐述者，其苦难不能为任何他人所完全理解，在命运、时间、人性等词语的加持之下，福贵充满地域、时代、阶级符码的故事变成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全人类的故事。

除了作家的自我阐释，随着新型媒介的产生，《活着》的读者评价和阐释成为“可见”的意见，它在读者中的超高人气和接受度也成为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景观。以豆瓣网站为例，截至 2023 年 9 月，《活着》读者打分最多的 2012 年作家出版社版本有 793244 人评价，打分高达 9.4 分，远远超过很多文学名著，读者书评有 1.1 万篇，短评 188872 篇。1998 年南海出版社版本有 196146 人评价，评分 9.2 分。在当当网自营书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版本，是最受读者喜欢的版本，高达 1173539 人评价，常年稳居畅销书榜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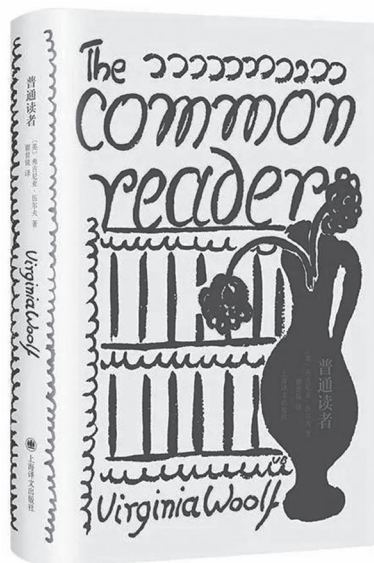
借助于新的媒介方式，读者的真实反映以及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找到展示的园地，在这个意义上，《活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粉丝批评家”群体，他们给出的意见和反映多数与作品早期出版时专业读者和精英评论家的意见大相径庭。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囿于专业知识缺乏，他们并不考虑《活着》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与创新，也不关心余华与同时代作家的差异，而是把《活着》作为一个对话和可以创造的文本。从豆瓣评论来看，读者们分享的方式与个人情感、心态和生存状况密切相关，他们使用的是近距离观察的方式。近距离是德塞杜读者接受理论中重构和重新使用文本的必要条件：“近距离与文本互动并不会令粉丝为其所驭，相反，却能让读者更好地占有它。只有将媒体内容重新代入日常生活与之相结合，只有近距离地与意义和原始材料互动，粉丝才能完全地消费虚构文本，使其转化为积极的材料。”

中国当代文学中获得广泛关注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三体》，几乎都有其超级读者和英雄读者，以其个人形象和社会身份而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特殊意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催更过《三体》，在访谈中不吝赞美：“《三体》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十分有趣。故事背景十分宏大，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平时国会和我的工作都是在斤斤计较于一些很小的事情，而不是去担心外星人入侵。”《三

体》几乎成为互联网一代企业家如百度李彦宏、联想柳传志、游族林奇、360 周鸿祎、小米雷军等人的宝书,“《三体》中的场景和当今互联网行业的情况吻合得太好了,所以在互联网创业者(包括已经创业成功的)看来,感同身受,代入感太强烈,一不小心就成了脑残粉,然后对同行和下属进行‘安利’。”马云、潘石屹等企业家对《平凡的世界》情有独钟,马云说路遥的作品改变了他的一生:“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否则我现在还在蹬三轮呢。”潘石屹读过七次《平凡的世界》,遇到困难和挫折:“每当我忍无可忍,准备放弃时,都会拿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读,以至于在深夜经常痛哭。是书中孙少安、孙少平为了改变命运,努力拼搏,不轻言放弃的精神激励了我,让我第二天有勇气继续去面对困难。”

相对于以上两部作品的世界性、英雄主义和积极社会导向,《活着》更加本土和低抑化。一方面,它提供的更多是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余华拒绝苦难展示的表达方式和后续的自我阐释,实现了小说所指从苦难到人生困境、境遇转化。小说讲述的福贵从高点曲折坠落的下行过程,其中的失败感、苍凉感和失去感,更容易引发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安慰,提供更具质感的故事、更具高级感的心灵和人生指引。发表于 1992 年的《活着》,聚集大量普通读者的关注,与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在中国兴起同时出现。而《活着》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广泛关注和集体效应,跟倦怠社会和功绩社会的兴起几乎同步,当然与余华幽默松弛的社会形象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也有一定关系。中国作家一般都是严肃雅正的个人形象,新媒体时代的余华在短视频中频频“出圈”,其幽默风趣的个人形象,严肃文学与作家诙谐形象之间的反差感,应和与缓解了高压社会中青年人的内心情绪,以半真半假的方式代言他们的不满和消极反抗。

新媒体上三言两语的短篇和长篇评语中,沉浸式解读特别多,在对作品好坏发表基本看法外,多使用文本盗猎者式的方式,混杂自己的阅读场景、工作境遇和生活回忆的阅读感受,即读者接受和粉丝文化意义上的情感现实主义。“情感现实主义并非虚构故事的属性,而是一种粉丝阐释虚构故事、赋予流行叙事以意义而建构出的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普通读者》
任一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年版

他们眼中的虚构故事。”在粉丝或者普通读者的解读中,充满了自我剖白,将个人经历、个人背景代入虚构故事的领域,强化粉丝对于人物和故事世界的认同。《活着》豆瓣排名第一的读者“子不语”的书评,全文略过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作者说自己在这部作品面前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转而描写了自己在长途火车上阅读这本书的情景——跟偶遇的一对情侣和老年人,传递着看完了这本书,年轻女孩默默流泪,男孩叹息,老人家只是微微笑说很好,年轻女子看见生命悲苦,年轻男子看见生命的无常,老年人淡然以对。这篇书评描写读者阅读时刻的特殊环境,炎热夏季的长途火车上,书成为陌生人之间建立情感关联的媒介,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条书评有 700 余条回应,很多人分享自己阅读后悲痛伤感的感受,也有很多人回忆是在什么情况下阅读这部书的,比如有人是高二打手电筒在宿舍床上看的;有人在落地窗前耗费一个下午读完;有人是在过年的时候看的,更觉得悲凉;有人在一个下着雨的深夜看完,坐在床上号啕大哭;等等。“子不语”的书评,没有泄露任何故事情节,却引起了极大的读者共鸣,让他人想起读《活着》时的自己,并表达出

来,《活着》成为陌生人之间铭记时间、经验和自我的一个公共容器和链条。读者们借助《活着》的整体故事、人物、语言片段和时代信息,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抒发怀旧、伤感、自我鼓励的情绪:“好与坏、开心与悲伤、希望与失望通通都可以照单全收,宠辱不惊,悲喜不形于色不动于心,站在与自然万物同等的位置上看自己,其实一切真的都十分简单。”(豆瓣读者陈莫尼)“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顽强。这应当便是生命的力量罢。”(豆瓣读者大头绿豆)

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一文中强调过普通读者的独特接受方式,读书基于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常识。“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除某种整体性——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正视《活着》读者的精神状态和现实处境,很多年轻的读者属于绩效社会中疲惫的主体,他们在福贵身上获得的是一种安全和沉浸。福贵的失败、失去和最后的内心平静,类似于韩炳哲所说的“根本性的倦怠”和无为状态:“这种倦怠产生了一种深层的友谊,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团体,而无须从属或亲缘关系。人类和事物相互联结,通过一种友善的并列关系。”“一个疲惫的人就是另一个俄耳浦斯,在他周围,最野性的动物都聚集起来,并最终一同享受这困倦。倦怠赋予孤立分散的个体一种共同的节奏。”《活着》在时间流逝中获得不同人群和不同方式的解读,不同时代的读者注入不同的情感联结,作品也在新的语境下繁衍出新的时代内涵。

结语

《活着》持续获得读者关注讨论是当代文学出版和接受史中值得重视的现象,尤其是跟上一部具有广泛社会

热度的《平凡的世界》并置考察,可以看到时代变迁下个人的精神转折。邵燕君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支持现实主义的价值系统遭受重创,启蒙、革命和中国民间价值观都遭到深层质疑。她把《活着》放在现实主义向“新写实”转向的脉络中,跟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和刘恒塑造的贫嘴张大民“精神胜利”一起成为平民楷模。这些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和精神气质是摒弃《平凡的世界》这类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配方(奋斗和改变命运),“活着”和自我安慰成为主导。从《平凡的世界》到《活着》是从宏大叙事到平民故事的转变,也是向寓言式写作的转变,孙少平式的精神高贵、物质贫困的人物,是特定历史结构中的产物,也是时代强音的表现。高速上升期的社会,悲剧带来的是不死的激情和理想的赞歌,而在社会结构基本稳固的时期,基本上是匀速前行,甚至可能是停滞和下降的,在这样一种社会模型中,悲剧对应的更多是承受。福贵在接受中是超越历史、阶级的人物形象,平凡的人们更容易把他当作自我的延伸,吃尽苦头,遭遇种种,完成自我说服,走向跟自己和解。正如余华的解释:“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之后的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中回避了灵巧的叙述方式,采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那种讲故事的方式,正面强攻现实。在《第七天》中以一个人死后的七日见闻书写现实的倒影,在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文城》中,展示了极致的道义和浪漫。这些长篇小说无一例外受到批评,从专家学者到豆瓣读者都表达了一些不满,比如文字臃肿、审美粗鄙,新闻串烧式的现实描写,故事缺少生活根基,人物丧失共情能力等。当然这些批评之外,活跃在新媒体上的余华继续接受粉丝的无差别膜拜和高度认可,余华的文学信誉很多都来自《活着》这部作品,即使读者在表达批评的时候,也在反复重温《活着》的高光。余华创造了灵巧简洁、克制写实、充满隐喻的中国故事《活着》,在作品的现象级畅销和读者接受中,余华也成了被《活着》和时代情绪反复塑造的作家。■

别样的内心房间

——评钟求是《地上的天空》

Article- 范咏戈 Fan Yongge

中短篇小说集《地上的天空》作者钟求是认为：“一个人的内心有很多房间，但大部分会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被忽略，探寻并打开它们，这是作家要做的事情。”这本小说集收入的九篇小说是作者创作宣言的成功实践，甚至可以说，小说通过独特的故事引导读者走进的不只是“房间”，而是九座心灵宫殿。作品以小说形式体现文学的本质：以文学语言、文学故事为外衣的哲思，以及探寻人生意义，对生活进行存在主义式的追询。其中《地上的天空》已在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宇宙里的昆城》在《收获》发表后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这本小说选集和当下一些“凑成”的中短篇小说集不同，它波澜老成，篇篇硬核，垫高了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台阶。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分别处于小说创作的两端。如果说长篇小说作为“重骑”，往往要担负书写“一个民族的秘史”的重任，挑战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时间；那么，

中短篇作为“轻骑”，更挑战着作家的写作天赋：以有限的篇幅敏锐地捕捉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的鲜活生活，以独特的视角勘察人性的不同面相，回应人们生命中的各种考验，追寻文学温润人心的恒常之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难以藏拙，更要求作家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力求以精短的文字表达充沛而复杂的情感，在精练细腻的叙述中不断抵达情感的深处，以对生活现实的深切关怀开启读者被幽闭的想象和情感，共赴一场见证人性秘密和人生理想的心灵聚会。

钟求是便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地上的天空》集中精心构筑的九个故事中的人物多是“我”的亲人、老师、同学等，故事发生地也大多围绕在浙东的一个小镇。人物多经历过生活磨难，甚至包括与生前亲友的离别和“重逢”。作者这样选材，显然是力求在生活的艰辛、爱情的曲折中体现人性的复杂，以及在困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的韧性。《地上的天空》中逝者朱一围生前与妻子之外的女性陈宛相识并产生了

暧昧之情，却并未背叛家庭。他酷爱余华的小说《第七天》，于是也如《第七天》书中那样，试图创造同时存在又相互对立的生死两界，以死观生，完成一场生命的生死倒置。他在病中和陈宛签下一份来世要娶她为妻的“协议”，成为故事的悬念。朱一围病逝后，陈宛想寻找保存在朱一围手里的另一份“协议”，花重金买下朱一围生前存书，又捐给朱一围儿子的学校。一方面，这表达了对逝者的一份挚情，另一方面也使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寻找朱一围的存书中是否夹着那份“协议”。但作家写这些其实仍是虚晃一枪，真实目的在于对朱一围做深度的心灵勘探：“对书上的文字，一双眼睛便是一次公证。”也许朱一围不怕别人见证自己收藏的情感和未来的日子，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上的天空”——书写中年人生存的疼痛感、无助感可能没有人能比钟求是走得更远。《高士图》中“我”去出席“出过书，蹲过牢”的落魄画家朋友的画展，落魄画家心中其实早已把坐牢的事放下了，“我”却想通过买画“帮助”他。终于在一番推心置腹中化开了两人心中的块垒。“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和“高士”一席谈，“我”也把自己心理打理顺了，引导读者走进一间天窗既开的别样心灵房间。《除了远方》有位在儿子“拿了公家的钱”被判刑后，决定“陪儿子坐牢”的父亲。他将自己家的一间房装上铁栅，让自己像一名正式囚犯一样待在里头。“我”去“伪监狱”看他，并陪这位父亲“蹲了一天牢”，“我”的心灵被震撼。这样的故事胜过多少惯见“反腐小说”的笔墨！《父亲的长河》是一篇受现代主义理念“艺术不应该和对现实的再现联系在一起，艺术体验必须在两端之间移动，即过去的再生记忆和未来的丰富前景”启发的小说。一名逐渐失忆的父亲回到早年居住和工作的昆城，最终选择一个人划了公园的小船汇入大河，以他的方式告别了人间。《比时间更久》中周老师晚年坚持要改名，从这件别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讲起，小说揭开了伴其一生的内心秘密。《瓦西里》写“我”在旅游中偶遇一老翁，作者本是来圣彼得堡看风景的，却看到了风景外的“剧情”。《远离天堂的日子》里写的也是一位父亲。遭到妻子背叛后他沉溺酒中，儿子无奈中将他塞进家中留存的棺材中“管制”，在一场相爱相

杀中这一对父子最终达成和解。《他人的房间》中“我”在疫情中被困在朋友的空房中，邂逅了对门的女子，甚至被女子的母亲认作相亲对象和上门女婿，以独特视角探索了禁闭状态下人的心灵律动。《宇宙里的昆城》中旅美科学家张午界，本来学业事业有成，家庭生活美满，可为了无法看到的“宇宙大爆炸”，最终选择将自己冷冻50年，期待50年解冻后将他的科学假说变为现实。从叙事学角度看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一系列由冲突驱动的动态递进的事件，在人物的生活中引发了意义重大的改变”。作者笔墨并不停留在生活里的瓜果梨枣，而是叙述那些和平常事件悖离的、新奇的、曲折的与众不同的事件，用一句话说是“出事了”。而且，钟求是的故事有一种可贵的“负能量引导”。好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多么地“正能量”，而是需要先利用负能量打开读者的心理缺口，然后步步引入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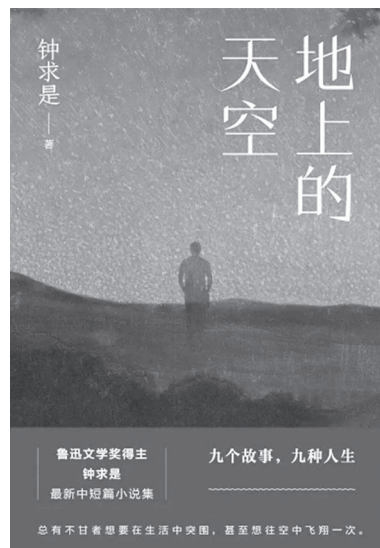
由于作者有其成熟的小说观，坚定地认为小说应当开掘并表现人性。因此他的小说并不刻意在评论话语划定的“乡村小说”“城市小说”“地域小说”等中去求得突破。钟求是的小说好看，不可否认其具有角色境遇、行为产生的自然抓力，更在于它们都有难得的深层结构，在于作家审美经验对自我和现实的再造。好的文学是解放的文学，它总能使我们看到我们以外的事物并从中获得审美快感。无论讲故事，写人物，都不是停留在生活的简单写实、停留在表层世相，或者讲缺少思想内涵、不值得“品”的故事，能够如昆德拉说的那样，“发现小说应当发现的”。

这本小说集的成就除了在题材选择、故事叙述、人物刻画上有开拓，在语言运用和叙事策略上也有所突破。尤其是《宇宙里的昆城》让科学和文学“对撞”，除了将科学因素、高深的物理科学理论融入叙事，同时，邮件、访谈、闲聊、信件、新闻报道等也成为叙述手段，这种“混搭”“杂糅”拓宽了小说的叙述路径。小说集中的多数作品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虚构和非虚构兼备，不仅使作品叙述更具张力，也成功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容易引起读者共情。由是观之，《地上的天空》这本小说集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当下小说创作中实属难得。■

中年晚期的写作经验

——评钟求是《地上的天空》

Article- 丛治辰 Cong Zhichen



《地上的天空》书影

钟求是中短篇小说集《地上的天空》的第一篇叫《地上的天空》，最后一篇叫《宇宙里的昆城》，这两个题目里都有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一高一低，一大一小。

其实还不仅这两篇，几乎每一篇小说题目，都暗含着二元对立：《高土图》的雅与俗；《父亲的长河》《除了远方》在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近与远；《比时间更久》里名字的先与后，这里面暗含的人生可能性的真与假；《瓦西里》里时代的记忆与淡忘、时代的高昂与跌落；《远离天堂的日子》的天堂与远离；《他人的房间》里的暂时替换与恒久自我……当然，也不会仅仅是小说的题目，

这些小说本身也包含着二元对立构成的张力。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这些小说的共通之处，也是这些小说的构造方式。

短篇小说有很多构造方式，最有名的是所谓“生活断截面”的写法。不写生活的全部，只写一点点，管中窥豹，从这一点折射出广阔的天地。钟求是的写法不是这样，他的着眼是大的。书里的九篇小说，多是写中年甚至老年，又多杂以回忆，甚至以回忆来推动叙事，那是因为这些小说是站在时间河流的河面之上去俯瞰。

钟求是总是在这些人生中找到一个小小的事件，像钉子一样楔入人生富丽的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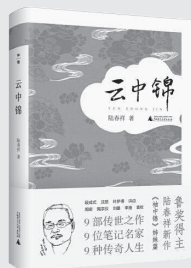
中,然后这个大厦就歪掉了,轰然倒塌了,至少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沉痛。钟求是小说里那些人物,总是会遭遇到一些意外,这些意外多年后总会发生作用,让这些人呈现出异质性的色彩,或者做出出人意表的选择。比如《地上的天空》里那段隐秘而实际上未遂的出轨,《高士图》里那灵光乍现又必然如此的偷窃,《比时间更久》《瓦西里》里的青春恋情,《除了远方》《宇宙里的昆城》中的事业挫折,都是这种足以撬动命运之重的人生细节。

但是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有些怀疑:漫长的人生真的会由这样一些特殊时刻所左右甚至决定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作家为了在短小的篇幅里制造戏剧性,而故意夸大了那些细小的时刻,用叙述的精巧,让那些时刻从一个别致的角度楔进命运或者时代。而这样的刻意,使小说得以完成,却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不真诚。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我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经常会感到有些矫情的地方,比如《地上的天空》里的“我”设计要去找一个同名者继承朱一围的书,比如《高士图》里那位雅贼极不合理的坦然——尽管我知道作者想借此写出人性之深幽复杂——再比如《比时间更久》里的父亲一定要改个名字来缅怀初恋……

直到读到最后一篇《宇宙里的昆城》,我才能理解这种矫情。所谓矫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令人感到错愕,是世俗的逻辑遭到了冒犯。矫情意味着不被理解,不被理解意味着永恒的孤独。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钟求是总是要提到昆城。这个地方在有些小说里是必须的,在有些小说里提不提无所谓,但是钟求是非要提,这就耐人寻味。昆城是什么?是故乡。

谁会对故乡那么魂牵梦萦?一定是在他乡失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年晚期的钟求是,通过这些中年晚期的人物,才能写出这样一些小说的原因,也是这些小说和我们每个普通人有关的原因。钟求是这些当代英雄的疲惫,是我们每个人的疲惫;我希望他所书写的那种中年人念念不忘的少年传奇般的梦想,也会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的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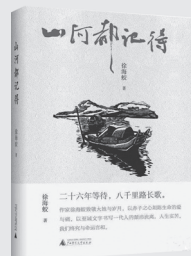


《云中锦》

作者: 陆春祥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 68.00 元



《山河都记得》

作者: 徐海蛟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 58.00 元



《天候》

作者: 周生祥 周喆鸣

出版: 江西高校出版社

定价: 88.00 元



《风吹运河岸》

作者: 金问渔

出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

定价: 59.80 元

黄咏梅的叙事之变： 写作者的“自我革命”

Article- 曹霞 Cao Xia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步入文坛以来，“70 后”作家遭遇的最大质疑便是历史书写的匮乏。这也联结着一个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论题：“70 后”一代如何讲述历史？如何书写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近年来，知命之年的他们已经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历史书写作品。李浩的《如归旅店》、徐则臣的《北上》、周瑄璞的《多湾》、李骏虎的《母系世家》、葛亮的《朱雀》《北鸢》、李凤群的《大江》《大风》等长篇小说表明，这代人正在以自己的理解“重返”历史场域，以融合着实地考察、历史典籍、新闻报道、书信、日记等元素和丰沛想象力的写作传递出了历史叙事的意愿。黄咏梅的“代际对话”或“代际对望”亦可纳入“70 后”历史叙事的话语之流，这些作品为“每代人都拥有讲述历史的方式”提供了叙事探索。

从 2013 年的《小姨》起，黄咏梅的创作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即通过不同代际之间的对望与对话去“记忆往昔”或者说“抵抗遗忘”。在这种变化中，隐含着这

样一个事实：当作家的知识、阅历、思想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还愿意继续探索，便会进行一番自我“革命”。当然，这种“变”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天翻地覆，而更接近于缓慢的“改良”。2013 年迄今，黄咏梅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篇关于“代际”与“记忆”之关系的书写，篇数不多，十年下来却足以构成一种“现象”。

熟悉黄咏梅的人都知道，她是 2002 年从“南国叙事”开启写作生涯的。随着她从“南方以南”（广州）迁往“南方”（杭州），书写地域在变化，而擅长于世俗烟火、凡人心事、微物小情等人间行状的精细打磨始终未变。《小姨》承续了她一贯的温婉细腻，但叙事方式与精神面相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小说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小姨的生活与情感。出生于 1970 年的小姨曾经是“天之骄子”，后来却成为一个颓废、不合群、不恋不婚的“中年怪阿姨”。这篇小说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资深剩女”的故事，它深潜着的时代创伤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人们纷纷谈起。当小姨



大学时曾经暗恋的师哥 20 多年后再度出现时,她重燃爱的希冀,但再见面之后就彻底死心了。对小姨来说,记忆中的他表征着一代人曾经浩荡澎湃的理想主义,可现实中的他已然被“招安”,跻身圆乎乎的“成功者”行列。在小姨看来,这种“成功”毋宁说是一种背叛。最后,小姨疯了。这个结局看上去很极端,但又具有某种必然性。那是一直坚守理想主义的人的唯一出路。当黄咏梅在《小姨》中以“隔代”凝望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她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这可以构成一种讲述历史的方法。就像海登·怀特所说,我们无法找到“历史”,能找到的只是被编织或被阐释的历史。因此,历史叙事更多地与“文学性的”或者说“诗性的”问题联结了起来,而“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可以是无限的。当“历史”“记忆”成为叙事化的对象时,文学就代替了科学,朦胧就代替了精确,诗意就代替了枯燥。通过“我”与小姨的对话和对望,黄咏梅“发明”了一种能够包孕丰沛内涵的叙事范式:或通过子一代讲述父/母一代的故事,如《父亲的后视镜》《昙花现》;或直接展现两代人的不同人生,如《给猫留门》《翻墙》;或将年长者与年轻者的生活、观念、思想等方面的差异予以对比,如《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

《蓝牙》《夜间暴走》。无论哪种情形,隐含的叙事都指向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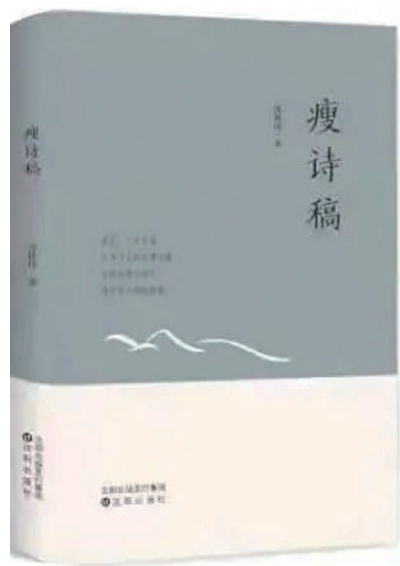
从故事来看,这些文本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叠床架屋的叙述层。它们通过“我”或叙述者的视角将亲朋好友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中间有时还夹杂着外公讲小姨的故事、母亲讲父亲的故事、母亲讲姨妈的故事、同事讲同事的故事、邻居讲邻居的故事等枝枝丫丫,由此碰撞而产生了多重声音和风格。随着不同的讲述层被打开,不同时空中的故事也一段段被络绎召唤而出:在《父亲的后视镜》中,父亲在新中国诞生成长的历程毋宁说是一部发展和巨变中的中国当代史;在《给猫留门》中,童趣盎然的“猫事”牵连起了令人叹惋的过往之“人事”;在《昙花现》中,“我”转述的母亲和姨妈们的故事则在女性的婚恋困境中激漾起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的涟漪。空间的维度挪腾辗转,时间的拓片嵌糅叠加,那些篇幅不长的文本竟然氤氲出了一抹抹凝重的历史感。

此处不妨以 2023 年的《夜间暴走》具体阐释之。黄咏梅曾谈到,当代社会中“勇敢”等美好品质正在消失,她想通过小说去反省这种社会性和公共精神的匮乏。“勇敢”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这在小说中通过“代际”的对话/对望层次丰富地传达出来。这里既有父一代和子一代的对比,也有年长者与相对年轻者的对比。老腆年轻时很勇敢,曾在大冬天跳入冰湖救起过一个“臭老九”,却在人到中年后成了小区一“霸”。应敏和秦烨年轻时也很勇敢,大学时代曾与在食堂插队的“大只佬”奋力抗争,曾经为了爱情而反抗学校的种种规定,中年后也只能在网上逞勇。到了下一代,“勇敢”愈益萎缩变异。以小说开头的那个年轻女孩为例,她目睹老腆中风摔倒但只敢打物业电话或者说最多只愿意做到这一步,至于应敏秦烨的儿子出国留学却在假期都懒得回来,可是旅游的费用又要依靠父母。《夜间暴走》是黄咏梅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不仅因为它有很深的时代思考,还在叙事技法上颇得门罗之风。门罗最大的特点就是“藏”或者说“留白”,水面上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冰峰”。在黄咏梅近年“自我革命”的作品中,“代际”与“往昔”的关系常常在冰山一角的闪烁间偶露峥嵘,而这代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也经由此折射了出来。■

瘦诗里的闪电和雷鸣

——评沈秋伟《瘦诗稿》

Article- 卢山 Lu Shan



《瘦诗稿》书影

沈秋伟的新诗集《瘦诗稿》让我耳目一新。身在警界和诗坛多年，现在他把多年来不同阶段的思想火花和生活哲思，打包压缩在这本诗集里，用一个个精彩句子击中了我们庸常琐碎的生活。

谈到沈秋伟的诗歌，不得不提及他是一名警察，一个需要极其冷静和理性的职业。但是在诗歌里，他却天马行空、恣意妄为，时而穿梭回一首宋词的时代，又躲进家乡一滴雨水的词根里……在这本诗集里，你能读到他的豪情和婉约：“你酒量太小 / 只一滴便醉了一生 / 我词汇量有限 / 用一阙小令收纳江山”（《小令》），“马不可肥 / 怕西风回来不识古道 / 鱼不可瘦 / 怕辜负一池桃花春水”（《肥瘦》）。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剑胆琴心

与诗酒人生，都在这本诗集里一一浓缩了。

“一个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占有的空间，而是取决于他作品的强度和完整性，还有它们的生动性。”（帕斯）《瘦诗稿》基本上四句成诗，数百首创作时间近十年之久，可谓“十年磨一剑”，读来或曲径通幽、引人入胜，或奇绝通灵、天马行空。这些词语和思想的吉光片羽，是需要多少个黎明黄昏和日日夜夜的耳鬓厮磨与冥想纠缠？诗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热爱与回应。显然，沈秋伟在用这一行行诗句，来记录他的风云际会和满天星光，回应那些被岁月羁押在灵魂深处的热爱和涌动。

秋伟兄少年时横刀立马，胸有丘壑，一生大开大合，“大河拐大弯”。多年前，他从



江南湖州的水乡一路出发，在金陵宝地青春缱绻，又去长春焚膏继晷七年，后毅然奔赴彩云之南，深入千山万水，用诗歌勘探万物的灵魂。从事地质工作几年，走遍森林大川，如果他一直在原野之中“挖呀挖呀挖”，寻找他的精神富矿，那时候他可能是另一个“张二棍式”的成功诗人。谁知道成家立业后他又扬鞭东归，重新回到江南故地，竟然成了一名警察，开启人生的另外一场诗歌之旅。在铁与火、善与恶、是与非之间，他用诗歌拉直了一根灵魂的标线。“我心中装着祖国的山河 / 也装着祖国的病史 / 但我医术不高 / 只能治疗其中一朵斑点”（《治疗》），“我要向天上掘一口深井 / 探一探宇宙的秘密之泉 / 以及那些云的缱情 / 和远方星星的体温”（《天上》）。在严肃枯燥的工作中，诗歌成为他休憩和滋养的一座花园和港湾。

为何恋上诗歌？他这样解释：“一个缪斯的遗孤，带着灵魂的热切梦想，在诗歌的荒原里跋涉，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出低语。”对于诗歌的爱早已贯穿他的一生。无论在大河大山的勘探之旅，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公安生涯，诗歌一直在他的案头，在他生命的现场。有一次酒后戏言，谈到写诗，他说写到底，写到死。不管是谁，只要反对他写诗，他就与之决裂。虽然是戏言，但他对诗

歌的痴情和决心让我大为敬佩。诗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如今他已大大方方地和诗歌结婚了。

济慈说过：“一首诗，如果不能像树上长出的叶子一样自然，那就不必写它。”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当下诗坛虚情假意又相互复制的赝品多如牛毛，无病呻吟和凌空虚蹈的写作让诗歌失去尊严，真诚的有生命力的写作显得难能可贵。正如评论家李犁在诗歌《诗人》里写道：“把你的马匹、速度和剑送给那些不幸的人 / 给寒冷的人布匹、粮食和勇气 / 用飓风对付作恶的人 / 用酒温热行善的心 / 必须为别人流点血和泪 / 这样的人不写诗 / 也是诗人中的 / 诗人”。沈秋伟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诗歌面前，他像个孩子投奔母亲的怀抱一样完全打开自己。警察的威严，诗人的柔情，杭州诗歌的大小活动，秋伟兄只要答应了的，总是如约而至，且彬彬有礼，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诗歌的小学生。他为人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对于年轻人多有提携之情义。

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具有写作自觉的，或者说是历史的自觉，他总会把自己放在时空和历史的维度，来考量自己的写作，努力面对和解决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沈秋伟直言写诗的困境：“今天，我觉得写不出诗了……日子总是神出鬼没 / 我的心情如此犬牙交错 / 足以咀嚼人类的全部思想”，他说自己“这辈子最见不得人的事 / 是偷偷当了回诗人 / 写下的诗虽未触犯天条 / 却总能自证其罪 / 每一句都曾向我勒索过灵魂”（《自证其罪》）。对于诗歌，他是一个虔诚的小学生，是诗歌的小学徒。他甚至是自卑的，总觉得习文写诗多年却从未触摸到缪斯的裙裾；但他对于诗歌的那种九死不悔的痴迷，却又是无比自信的，虽万千人无法阻挡的。就像诗人海子在《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里所写：“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与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写诗，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夜巡人，在今夜的黑色里，一次复一次无谓地巡更。”秋伟兄写诗是小心翼翼的，却总是不计后果的。他说：“诗人乃是纠结在语言之池里的一尾鱼 / 思想的氧气已变得非常稀薄。”（《一尾鱼》）对于命运的不确定性，他又写道：“不知道此生未完的诗稿 / 可寄付给谁家 / 下一场人生再来世间闹上一闹 / 还

能不能押住念奴娇的韵”（《深度不确定性》），“被我宠幸过的几粒文字 / 在旧体诗的吟唱里低叹 / 终于不能忝列真理的名榜而黯然神伤”（《神伤》）。写作几十余年，他总是活在诗歌的精神“压迫”中，生怕一不小心就捻灭了那盏灯，或者惊扰了奥林匹斯山上的诗歌众神。

写作的自觉，还在于一个诗人要不断地自我突破，找到心中那支笔的立足之地。我注意到沈秋伟诗歌中的古典气质。诗人的笔墨浸染着江南的古典人文，一篇篇古色古香的诗文便流淌在山河人间。“我的诗歌都是抄袭之作 / 抄袭鸟鸣与虫吟 / 抄袭秦时明月汉时关 / 抄袭你脸上微笑撩春风”（《抄袭》），“循着《诗经》的花香 / 沾着《楚辞》的华彩 / 喝过两口乐府的清风 / 在唐宋的码头已醉得不成样子”（《诗醉》），“酒后成仙 / 白云是我倒骑的麒麟 / 若是问我想去何方 / 宋宋词牌会抢着回答”（《成仙》），“清晨，三声鸟鸣 / 把我诗里的音律惊醒 / 仓促间着衣梳洗 / 镜中句子纷纷倒装”（《倒装》）。当然，今天的文学写作，光搬来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消化、吸收、创新的能力。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现代性的写作技巧，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孤独与癫狂，试图恢复和展示古典山水孕育下的伟大诗歌传统。在古典山水人文里，我们找到了诗人的光辉和尊严。

沈秋伟把这本诗集命名为《瘦诗稿》，显然是别有用心、有意为之的，可谓他诗歌写作生涯中的美学建构和精神追求。“思想总是瘦骨嶙峋 / 而肥胖善于销蚀真理”（《销蚀》），“这世界太闹 / 金银铜铁纷扰不少 / 当秋风吹凉薄梦 / 总还有人捡拾唐宋瘦稿”（《瘦稿》）。正如评论家李犁所说：“更关键的是这些瘦诗里有闪电，总是让你在慵懒和惺忪中惊异，脑子中浑噩的盲区被电光警醒。”这种新鲜的体制，奇绝的想象，既是他多年写作的一个自我突破和实践，也是给诗歌界有益的探索和补充。

“无数次 / 被语言的锋芒刺中要害 / 又无数次 / 用语言的野草敷伤”（《敷伤》）。这个日益肿胀肥胖的当下，我们急需用诗歌来瘦身，领受诗歌里的雷鸣和闪电，完成自我的反刍和修正。秋伟兄在人生不同阶段和时期写下的这些瘦诗，这些诗意的缤纷蝴蝶，这些思想的吉光片羽，会伴随沈秋伟一生，也必将伴随我们一生。☞



《走甜》

作者：黄咏梅
出版：出城出版社
定价：38.00 元



《黄蝴蝶》

作者：祁媛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定价：59.00 元



《风定鄱阳湖》

作者：符利群
出版：宁波出版社
定价：68.00 元



《南华录》

作者：赵柏田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128.00 元

回归之诗

——胡理勇《时间的抽屉》序

Article- 李郁葱 Li Yucong



《时间的抽屉》书影

对于某些人而言,文学是一种返回和召唤,它总会在恰当的时候,以某种不经意的方式改变个体的走向:他的生活似乎还是一如既往,但一些坚定的事物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枝头上,突然多了各色的鸟/好像在练习歌曲/歌声透亮,饱含深情/它们捕捉到了春的气息”(《春的气息》)。胡理勇的诗句,似乎意味着属于他的另一个春天的到来。

在这种意义上,胡理勇的这种返回(在文字中再次勇敢开始的征程),就是候鸟返回旧时的巢穴,在隐喻的意象之后,他重新厘清了自己的内心,但到底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一些客观和外在的元素之外,一定有发自内心的驱动,这种驱动或许是他写作行为的源泉。作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们

所认知的世界,更多的时候就是身边的有限的人:感知和生活。在这种小世界里,理勇有种固执的温暖,源于他的本性,但这种固执一旦进入诗中,可以让我们读到他对人世的一瞥,有温情,也有批判。

这册即将面世的诗集,分为四辑,如果按照分类学的标准,我们大体可以这样归纳:第一辑“甦醒”,以时间和节气为载体,描述着理勇个人所认同的世界;第二辑“出发”,是在历史和地域中的一种精神的历险;第三辑“呐喊”,则是在人物和自然的心声中折射出理勇个人的镜像;第四辑“憧憬”,是对个体返回的凝眸。

理勇的这种姿态,可以从他的诗《河边》中略见端倪:

河边安排了一块石头,让我坐下
河水披着长发,潇洒而去——
因寒冷,显得格外明净
漂浮物就像许多往事,不再被关注
对岸的水杉,伟岸挺拔。无数枝条
像无数双手,为我顶着低矮的天空
好几棵岸柳,像身披袈裟的高僧
双手合十。在为谁祈祷?

时间如河,在滔滔不绝中绵延,站在时间之侧端详,那些岸边的树和树都是符号和指认,像是我们所邂逅之人和事,在随后而来的诗行中,犹如生命的进程:“枫叶彻底地红了,红得恰是时候/我荒芜的岁月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把这当作是理勇在中年之后重新所开启的文学之门的象征,作为一个酷嗜哲学和历史读物的中年人,一个历尽生活沧桑而犹有余温的男人,理勇既有客观中的果敢,也带有欲说还休、更上层楼的犹豫,这在此后的诗行中,从斑驳之境回归到一种澄澈:

这些树,相互端详,十分美好
以各自的形态,注释着生命的不朽
它们在风中交头接耳。它们想什么
流水不知,我也不知
我沉思默想的样子,成了鸟的笑料

在这里,理勇有节制和自嘲,更多的是一种洒脱,这和他的生活理念有着一种契合。这首诗,让人想到大师沃尔科特被引用得非常频繁的《爱之后的爱》中的几句:“你会重新爱上这个曾经是你的陌生人。/给他酒喝,给他饭吃。把你的心/还给它自己,还给这个爱了你一生,/被你因别人而忽视/却一直用心记着你的陌生人”。

而这种节奏和内在的河水之流向,为整册诗集定下了基调:带着对美好的眷顾,把这些情愫体现在他对题材的把握上,整册诗集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火焰,犹如祈祷,一种秘密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喷涌而出,它们在有时直白有时晦暗中,积淀出诗的意蕴。推敲之间,我们可以读到,理勇羡慕于云之高蹈,又执着于石之坚韧,在字与字



之间、在词与词之中,在天籁般的旋律间,人生的细节被隐藏在文字之后,像是隐约的面庞,它所传递的一种精神张力:对于交流和沟通的需求,是轻和重有趣的对峙,是逃逸和留下之间的生活影像。

这种写作并不彻底,如同我们大多数的人生。人至中年,对于生命的领悟已逐渐通透,但能否破茧化蝶却要看个人的造化 and 修为。理勇对诗之热爱无疑是重的:他巨大的热情带来丰沛的创作量,尽管荣萎参差不齐,但巨大的创作量有时能够带来作品的斑驳,就像春日植物的葳蕤让绿色在这个季节游刃有余。

在这种用力之余,很多时候,当我们沉浸其间,却需要开始懂得“四两拨千斤”的技巧,那是语言中的轻,和之前的重能够闭合为诗的自足。理勇有这样的诗句,虽然显得漫不经心,但有时却让人欢喜,比如在《清芬》一诗中他近乎喃喃自语:“人喜欢群居。都是孤独的灵魂/万物皆然/那些花朵,你逗逗它们/便开得更艳,更开心/没酿造香的樱花,也吐清芬”。

与《清芬》类似的如《一朵花》等篇章中,这些情绪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些诗,是理勇诗歌中的一极:他生活化和世俗化的脸谱。这一个侧面是一种平衡,好在理勇也有类似这样的诗句:“喧嚣是种病。之后,需要宁静/繁忙,需要缩短距离/生命,需要准备第二通道/让



老的负责美丽,让新的努力工作/任何安排不会令所有人都满意”。

这些创作本身并不完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分析和完善的角度,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构成了诗人胡理勇在当下的一种真实:他的诗歌生命。

在高低起伏和抑扬顿挫中,诗成为一种偷渡的源头,诗成就了诗自身的丰富。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多半是在酒局进入尾声,在座的友人都已半酣之时,往往会有朋友要求朗诵,而理勇此时会自告奋勇要求朗诵,他认为自己温州腔的普通话非常标准。

此时,他会手舞足蹈,有时候,灯光让他的影子呈现出一种夸张的姿态,而诗句在他有距离的普通话中游刃,神奇地在我们的耳蜗间引起共鸣。有缺点的朗诵是真实的,就像有缺点的诗,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我们可以用热爱掩盖一些缺陷,像他从酒杯中所感悟到的,把酒杯换成诗同样是成立的,因为可以浇块垒:“最完整的酒杯,没有酒/不能称为真正的杯子/当然,杯子,不仅仅装酒/还装眼泪,装热血/杯里,乾坤有多大就有多大”。

一只白鹭背着暮春,在溪上飞
它要飞往夏天
它在溪畔歇着的时候,被一声断喝惊起
怕它留恋水中的倒影

依然是那个在岸边看云的人,但在《白鹭,在溪上飞》等为代表的诗中,理勇进入到了另外一种转换自如的境界,而这样的诗句,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经验和对生命的品味,更凸显出对个体自身的审视和平衡能力,“它背负着暮春,像背负希望/在它冲向天空的刹那,白色的身影/就像一道晃眼的白光/它身下的大地,一下子亮了许多”。

这种白鹭的明亮带来的是一种经验的返回:理勇作出了他的返回之诗。这白鹭也许一直沿着溪岸线飞,在它的飞掠过程中,溪边草木枯荣循环,这并不重要,白鹭也许是之前所见过无数次的那只白鹭,也许只是镜像之一,两边的青山依旧,但在看白鹭的人这里,青山走出了童年,走出童年的青山是什么?是一种存在和天赋中的歌唱之音,是以文字之轻盈对抗阴影之沉重。

在理勇的视野中,和白鹭相对的是《笼中鸟》,他对它带有悲悯之意:“一只鸟,在笼子里被养着,似囚徒/但它很满足目前的处境/不担心有饥饿之虞,有焦渴之忧……”但这首诗是一首失败的杰作,作为一个隐喻,它原本可以写得更为克制而隐忍,而理勇用他一惯的铿锵和对常识的独白,描摹了相对白鹭的另一种镜像,这种扭曲和矛盾在生活中也许比比皆是,但诗歌,要把这种表象捕捉到文字的深处,它会抵达人性的幽邃,在这种意义上,理勇的诗尚待完成。

当一首诗完成,无论它是否能成为被传诵的杰作,对于诗人而言,这首诗是一次有限的回归。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的远比一首完美之诗复杂和开阔得多,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让诗和自身合二为一。■

向内寻找一条深江

——《镜子，或时间之梦》序

Article- 但 及 Dan Ji



《镜子，或时间之梦》书影

那时候常喝些小酒，一帮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侃文学。

尤佑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端正，继而是低调、腼腆，说话轻声轻气。这大约是十年前的情形。

酒桌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但文学一直是主角，像女神一样供着。不知在哪一次，我跟尤佑说，评论是个空档，从事的人少，不妨可以在评论上发展。就这样，我无意间插下了一枝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就这样，一个评论者开始在泥里冬眠，春天破土，几个冬夏以后已长成树。尤佑由此走上了评论之路。

这便是喝酒带来的好处，也成就了一段小传奇。

文学有时是需要氛围的，一交流，一嘚瑟，就开始发力了。没有这氛围，那些文学的细胞可能还在沉睡，甚至在梦游。一激发，一竞争，另一个自己便诞生了。

这是热闹，是交际，是事物的一方面。其实，文学更多地需要寂寞。

你在写这个世界，其实世界也在写你，你必须走进世界的角角落落，走进繁华与荒芜，走进那片一个人的寂静之地。走进寂静了，才算真正走进文学。

人群中，不乏爱好文学的人，但大部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我是看着尤佑一点点发奋，一点点入迷，然后让自己彻底被文学俘虏与包围。这是需要勇气的，繁忙且花花绿绿的世界时不时会出手，把你拉回去。这

时候必须要有定力,更需要恒心。

尤佑写诗,写评论,一手感性,一手理性,在两者间穿梭。这里面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但他能化解。他的诗,呼应着自己,表达自身,是个性的张扬与流露。而评论,则是用他的眼去观察别人,用一把虚拟的尺,丈量别人与世界的种种关系。这是两种格局,一个内在,一个外在,当然外在里面也有内在。他用内在把两者统一。

我们时常交流,在我的办公驻地——高家洋房。对着这座百年老宅,桂花树丛中,两个人静静地聊。每次谈的都是与文学有关的事,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作家,还有那些浩瀚无边的作品,就在我们身边出没、漫游。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奢侈,因为身边的人都不谈文学了,人们关心房子、车子、股票、健康,还有那些好奇的八卦。从这个意义上说,尤佑是不合时宜的,我猜他已经找到了精神上的那份快乐与自在。

一转眼,尤佑也近四十了。

中年的他最近忧心,原因来自父亲,父亲生病以来,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同了。这便是生活,痛折腾我们,磨出了茧,也生出了百般感悟。这份生命的痛也回馈给了写作,就这样,一个单纯的青年开始步入成熟中年的写作。

生活里,人们说起文学,轻飘飘的,还有种诗意盎然。其实,哪是这般啊。写作是酸甜苦辣的大集聚,是生活碾压后的一种释放,有时更是一种化蝶般的涅槃。

我读他近期的诗与评论,发现思路更开阔,表达也更复杂了。

他有一首叫《另一种蓝》的诗,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我喜欢这首诗,这是他为何写作的一种悄然流露:

抵近,只能是一种表面的消瘦

在白天,黑夜发胖了以后,我闭了眼

想着沃尔科特的白鹭

它和栖息在唐诗里的鹤有何分别

然后,向内寻找一条深江

它有别于大海、蓝天,现实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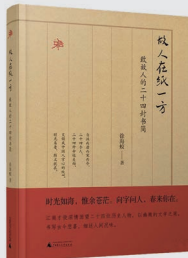


《爸爸的计划》

作者:张婴音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10.00元



《故人在纸一方》

作者:徐海蛟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9.80元



《生为赤子》

作者:曹凌云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定价:60.00元



《思念过往年华》

作者:吴刚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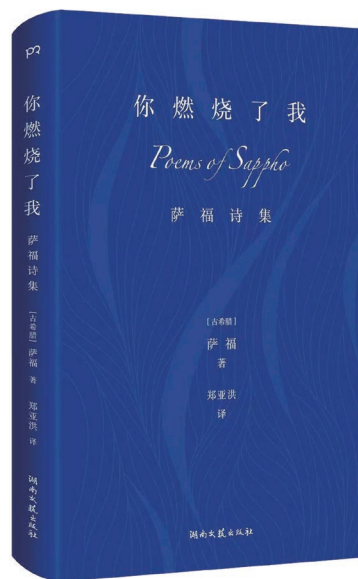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定价:68.00元

因为萨福，因为爱

——《你燃烧了我：萨福诗集》译序

Article- 郑亚洪 Zheng Yahong



《你燃烧了我：萨福诗集》书影

萨福只是芦纸残卷，她是写在黄金中的夕阳。没有人见过萨福写的原始芦纸，连萨福真实的面目都是想象出来的。她的诗，又那么真实，我们并不在意有谁见过萨福，我们读她的诗，尽管是残卷，尽管阅读残卷像侦探一样地去填补空白，我们总被萨福点燃，一遍又一遍，我们寻找萨福，呼唤萨福的名字，像萨福呼唤阿佛洛狄忒的名字。萨福也来把我们找寻。

萨福是音乐家。她的诗就是歌，由竖琴伴唱。萨福的形象，头戴花冠，手持竖琴，琴弦拨动，由她来演唱。这是最直接的萨福诗歌形象，古希腊的瓷瓶画家如此描绘萨福，于是有了抒情诗(lyric)的起源。萨福所有的音乐都散失了。

萨福是诗人。如果说荷马是史诗里的“英雄男高音”，那么萨福是抒情诗里的“美丽女低音”。她的声音穿透芦纸对我们说话，残损而坚定。柏拉图说“萨福是第十名缪斯”，有人说她是“不朽的诗人”。人们太喜欢萨福了，甚至虚构她头发的颜色：金色头发，可在一部传世的诗作里她的头发是白的。我们现在看见的所有萨福的画作或雕塑均为作者想象，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的中学时代历史教科书里，“萨福是第十名缪斯”被我记熟，我从没有读过她的一行诗。后来我读过不少伟大的希腊现代诗人：埃利蒂斯、塞菲里斯、卡瓦菲斯、扬·里索斯等，萨福还是没能进入阅读范围。她生活的年代太久远了，离我们两千六百多年，现



在读到的萨福遗诗不一定是萨福本人所写。萨福能否阅读还存有疑问，现今保存在雅典国家博物馆中的一幅五世纪中晚期红陶画，萨福在阅读芦纸文本，这是后人的想象。公元前5世纪末，她的歌诗被收集和书写下来，在长长的芦纸上，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没有标点，也无分行。有些诗是在后人的引文里才得以保存的。亚历山大学者们整理出九大卷遗诗，在第一卷里约1320行，仅有一首是完整的，其他的都是残诗。阅读这样的文本很困难，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请你来猜谜。”又好像一次阅读历险，你得开动阅读机器，残缺令我们兴奋，填充让我们激动，尽管你阅读的不过是翻译文本，你不是在一步步逼近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言“诗歌是翻译中所丢失的”吗？本诗集收录萨福诗200余首，有些仅仅是一个词，不忍心割离，让它呈现，因为萨福歌唱爱。

萨福，生于公元前630年，约公元前570年去世，生活在莱斯博斯岛（Lesbos）。这个岛名最早为我熟悉的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写的一首诗《莱斯博斯岛》，大约是她婚姻最糟糕的时候写的，她痛恨那人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看——“你的声音是我的耳环”“你盛满的是爱情”。为什么？因为爱。这个岛名现在成为女

同性恋（lesbian）的专用名词，萨福成为女同性恋鼻祖，萨福“女同”的说法被后来的学者所否定，因为这是现代人对情爱的理解，加之于古人当然不准确。有一个萨福，必然派生出无数个貌似萨福的声音。萨福的诗直接对她的女性陈述，没有遮掩，简单、直白，且华丽，这也是希腊语的特点。

萨福出生于莱斯博斯岛弥提利的一个贵族家庭，她和一位富商结婚，育有一女儿。她有三个兄弟，在海上做生活，被她写进诗里。青年时代她被逐出莱斯博斯岛，被流放至西西里岛。

萨福爱过一位渔夫叫法翁（Phaon），她苦苦追求而不得，最后从卢卡斯的一处悬崖上跳了下去，投海自尽。盛满爱的人，被爱所困，为爱而死。你燃烧了我——

唉，萨福，两千六百多年后我才读你

而你将从这块海岬上滑下去

一朵玫瑰拦住你，萨福，从此你不再歌唱

情人节早过了，莱斯博斯岛没有你的面影

大雨下在甘棠里，海水涌不进它的黑和白

萨福，你记得吗？你所有的萨福体一定

忘了，像情侣们经常互忘她们的名和姓

于是，我开始听相同的歌

如浪花拍击同一块岩石，每天昏天暗地

萨福，你终于忘了我

在飞扬的歌声中照亮梦想

——读《紫云英合唱团》

Article- 肖雯 Xiao Wen



《紫云英合唱团》书影

在长于书写乡土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吴洲星的作品以温婉诗性的语言和平静如水的叙事而显得别具一格。在新作《紫云英合唱团》中，吴洲星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于乡土的关注，将爱与美的注视投射到乡村音乐教育上来，创造出有一个有关梦想的美好故事。

长篇儿童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在《紫云英合唱团》中，作者对于叙事结构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故事并没有采用惯常的单一视点与线性叙事，而是汲取了合唱艺术中的多声部唱法，在叙事中进行时空跳接，充分调动起毛豆、小雨老师、陈大力、吉羊、黄小灵等一众主人公共同参与到故事的讲述中来。吴洲星充分调动文本的叙事活力，铺开了一幅描述乡土日常生活的画卷。

冲淡平和是吴洲星作品的底色，她的作品中很少见到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而是将叙事重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紫云英合唱团》中，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感受到作者倾注在儿童身上的爱与理解。故事中的孩子个性特征、家庭背景各有不同，但不论所占篇幅长短，作者都以极大的耐心为每个孩子设置了完整的成长线，带领读者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故事中的儿童大多有着不完整的家庭和晦暗的心事，比如在毛豆的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独立支撑起家庭生计与子女养育的重任；黄小灵因父母重男轻女，讨厌自己作为女孩的性别身份；吉羊“生活灰暗得看不到一丝光”……作者巧妙地借由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引出当下农村在城镇化、空心化的大背景

下,乡村中贫困加剧、留守儿童增多、重男轻女严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描写这些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磨难对少年们的精神冲击,而是通过师生之间的帮扶相助,让来自山川大地的音乐之声治愈着彼此受伤的心灵。在作者极为松弛的、生活化的叙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温情的时刻:一次充满信任的对话、一碗冒着香气的面条、一首在礼堂中唱给妈妈的歌,这些瞬间都见证着儿童的精神成长。读者也在情感力量的作用下感受着作者的用心,借由音乐,孩子们共同感知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收获战胜磨难的勇气,这也正是现代教育的意义所在。

正如吴洲星在后记中所言,程小雨这一串联全书的关键人物,不仅有真实的新闻人物作为参考,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乡村的教育工作者的缩影。面对同学卫娟的质疑,她选择坚守乡村,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教育艺术;她因材施教,看见并关怀着每一个孩子的困境,教会他们如何欣赏并赞美他人的优点。除此之外,在程小雨身上还寄托着作者对于乡村的深切之爱。起初,程小雨认为自己来到龙山小学是受到外婆的影响,但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龙山村淳朴美好的人情性和孩子们所回馈的爱才真正让程小雨寻找到内心深处的价值所在。作者用纯美的人情“重建”一个值得留下的乡村,也点明了乡村振兴需要先振人心的重大意义。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提倡逐渐成为主旋律,农村的孩子平等地享有美育的权利,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时代命题。因此阅读这本小说,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当故事的结尾,小雨老师教孩子们在乡野中自由地放声歌唱,让我不禁想到了中国古典美育史上的著名时刻:在《论语》中,孔子询问众弟子的志向,唯有曾皙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紫云英合唱团》并不能提供一种乡村美育应当如何的答案,但至少见证着一种“咏而归”的可能,小雨老师就像播下草籽的耕者,而四个小伙伴的背影像极了田野里在春风中摇曳的四朵紫云英,微小的植物们正在乘着音乐之声,在泥土之中破土而出、茁壮生长。☞



《稻子花园》

作者:毛芦芦

出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定价:25.00元



《无鹿岛之夜》

作者:池上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39.00元



《流光记》

作者:萧耳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59.80元



《龙拳少年》

作者:郑春霞

出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定价:28.00元

《三十三岁的决心》： 当“中国的金智英们”开始反抗

Article- 陈曼冬 Chen Mandong



《三十三岁的决心》书影

90 年的王慧敏：中国版“未婚未育金智英”

1990 年 4 月 1 日，她出生于安徽的一座小城。父亲是县城的普通公务员，母亲也是。在那个年代里，双职工的家庭里显然只能有一个孩子。被全家报以期待的她，以一个女孩的身份出世了。据妈妈回忆，“得知不是男孩，守候在产科外的爷爷奶奶径直调头就走。”刚刚来到人世、还在哇哇大哭的女婴无法想象，经历了生产阵痛的母亲，眼角流下的眼泪是何种滋味。一如她愈加无法想象的是，三十年之后，遭遇父亲背叛的母亲依然会在电话那头苦口婆心地劝自己“早点结婚，早点生娃”。

她叫王慧敏，是新锐作家宇澄的现实题材小说《三十三岁的决心》笔下的女性人物。小学五年级，月经初潮来临时，王慧敏对于在教室里当众拿出卫生巾十分羞耻，还被调皮的男同学抢走扔来扔去玩耍；初中时，王慧敏又在课间被痞子学长拦在走廊上，非得摸一把她的脸才让走；大学里，初恋男友不仅“剥削”着王慧敏给他写报告，还因为平安夜王慧敏不愿意在外留宿而被施以暴力；工作后，王慧敏又因不争不抢的性格被上司使唤、同事欺负，甚至被总监性骚扰……

初读小说时，在王慧敏穿插的童年回忆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女性熟悉的经历；也是在韩国引起热烈讨论的《82 年生的金智英》中引发东亚女性共鸣的遭遇。一个女孩，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因为自己的性别,步入了坎坷之路。一如全国人大代表、《半月传》作者蒋胜男在小说封面推荐语中所写:“从出生到求学,从薪资待遇到婚恋压力,90年的王慧敏所遭遇的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也是每个普通女性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正在经历的。”然而与金智英有所不同的是,三十三岁的王慧敏没有选择步入婚姻,她选择了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生活:无车、无房、无伴侣、无理想、无人际关系。

那么故事中的王慧敏,作为中国版“未婚未育的金智英”,会因为逃离了婚姻生活而更自由、更快乐了吗?

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天高强度的加班后,依靠在拥挤的地铁里筋疲力尽的王慧敏——

搭乘这趟末班地铁的还有一类人:他们和王慧敏一样,像是被抽光了气,耷拉着脑袋,要么在闭目养神,要么在两眼无光地呆望着车厢飞速驶过的黑暗地下道。打字、赔笑、说话、复印了整整一天的职场人,连手机都没有力气刷,淹没在了暖烘烘晃动着铁皮笼子里。

我们看到的,是隐忍着一切、努力保住饭碗的王慧敏在一次又一次的职场性骚扰中备受折磨——

“别着急啊。”几乎是在一瞬间,张畅站了起来,还拉了一下裤裆,当在那个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一步步向王慧敏走近时,王慧敏紧张得几乎要闭上眼睛。

到了几乎要贴身的距离,张畅停了下来,把头低下来几乎要触碰到她的脸,在耳边吹着热气:“你的乒乓球技术大家都看到了,不知道你这个宝藏女孩,还有什么技术是我不知道的。”

我们看到的,是早已不知梦想为何物的王慧敏——

而她已经三十三岁了。离三十五岁还有两年,这代曾经媒体笔下叛逆的90后已经步入中年,怂得不敢说不的的中年。像她这样没车没房没娃没贷款的尚且如此,那些背负着家庭重担的90后,还能有什么梦做呢?她连像雪子那样,和办公室性骚扰说不的勇气都没有。她和其他格子间里的苟活的甲虫同事们,还有什么不同?

王慧敏没有踏入婚姻的泥潭,却依然被卷入在名为生活的漩涡里。哪怕她已经拼尽了力气。从小,王慧敏就屏着一股气想要逃离小镇、逃离父权的家庭,不停地做题,不停地努力,终于抵达了北京,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这样名牌大学的门票,她似乎依然逃离不了那层枷锁。她普通而平庸,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被挤在地铁里,可符咒一般的枷锁却总能精准地发现面无血色和表情的她。王慧敏没有像金智英那样患上产后忧郁症,用不同的身份角色“发声”;她保持着清醒,却因此更为痛苦。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在忍耐与滚蛋之间：小甲虫选择反抗

三十三岁了,依然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北京这样只论英雄成败的都市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挤上前往五环外出租房的王慧敏就像一只面对生活败下阵来的狗熊。似乎留给自己喘息的时间,只有那三四平米的小客厅,以及只能蜷缩在沙发里闻着半包薯片的下班后时光。三十三岁以前,她的词典里,似乎只有忍耐。

面对父亲因为重男轻女出轨生了一个弟弟，王慧敏选择了忍耐。

面对被背叛的母亲时不时地电话催婚斥责她的自私，王慧敏选择了忍耐。

面对白富美同学的盛气凌人、百般刁难，王慧敏选择了忍耐。

面对公司总监的职场性骚扰，王慧敏选择了忍耐。

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小事忍一忍，大事也忍一忍。一睁眼，一闭眼，或许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王慧敏曾经也只会忍耐，在忍耐的煎熬中，她意识到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在骄傲之中，王慧敏开始了自己的异化，在她的想象里，自己成了一只被踩在脚下、无论如何努力都爬不上去的小甲虫——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加速缩小，周围的走廊和桌椅都越来越大，直到自己完全趴在了地毯上，眼角上方有两簇长长的蓄须，她闻到地毯里的汗酸味，几双鞋子匆匆在旁边走过，差点踩到她。她听到艾瑞克和其他同事说话的声音，她想叫唤他，告诉他张畅是多么混蛋，告诉他自己是多么地懦弱，可她只能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也只能靠身下的细肢在地毯上移动着。

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化成了一只甲虫。

在洗手间里，她一遍又一遍地用消毒洗手液洗着手，又用水拍着自己的脸。指缝里看到的镜面里，是一只浑身颤抖在哭泣的甲虫的脸。

和十九楼里其他人一样，王慧敏成了这个甲虫劳工世界中的一员。

与《变形记》里不同的是，王慧敏没有像雷戈尔一样真的变成甲虫，而是在她卑微的女性身体里，感受着自己灵魂的被践踏。

终于，经历了内心折磨，摸索着自己未来的她，鼓起了所有勇气。向职场性骚扰说了不，向这场系统性的性别剥削说了不，向懦弱不语的过去说不。

依然在挣扎的女性们：该怎么办？

90年的王慧敏之外，作者同时刻画了这个时代里不同的女性。遗憾的是，几乎在每个女性身上，我们都能读

到父权制阴影下女性的伤痕。

王慧敏的母亲，遭遇丈夫背叛后，第一反应竟然是埋怨自己的女儿：“你要是一个男孩就好了。”王慧敏的闺蜜汪梅，曾经是一个可以徒手帮助王慧敏对付顽皮男同学的“女侠”，却在步入社会后选择了最安稳的工作，言谈之间只有老公、婆婆、儿子。王慧敏的上司刘亚男，是那类在北京各个公司里常见的一心向上爬的女高管，可她一面在职场里驰骋，一到了老公面前却又不得不讨好逢迎，过起了“丧偶式育儿”的卑微生活。王慧敏从小最惧怕的白富美同学陈子薇，看似美艳嚣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实则把自己的未来都托付到了男性身上，还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每个女性都是鲜活的，也都是无奈的。

小说里，唯有一位尚未被父权制规训的女性，她是00后的实习生雪子。在王慧敏眼里，雪子的眼睛是清澈的，行为是勇猛的。她会因为男总监半夜给自己发骚扰短信还尾随自己，一怒之下把对方的车子刮花并公之于众。她会因为想体验生活去不同的便利店、奶茶店打工，也会在王慧敏孤立无援时鼎力相助。

或许是同为女性的身份，或许是曾经的媒体工作经历，作者宇澄敏锐捕捉到了当下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随着近年来“MeToo”运动而来的女性主义思潮，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分享自己因性别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她们在呐喊一个女性平等的世界。虽然微弱但只要发声就会有人听到，就像王慧敏一样，只要下定决心开始反抗，小甲虫也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但我们也深知，不是每位女性都拥有和王慧敏一样的勇气；女性的困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勇敢而得以一一解决。就像蒋胜男在推荐中所言：“小说描绘了尖锐的现实，指出了普遍的困境，也向所有人提问：该怎们办？”至少，勇气可贵、决心可贵。❏

AI 时代的乡村新抒写

——评吕煊诗集《乡村新物语》

Article- 赵 俊 Zhao Jun

最近,人工智能又突破了新的技术瓶颈。最近,OpenAI 对外发布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Sora 是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能根据文字说明创造出逼真而富有想象力的场景。它可以生成长达一分钟的视频,保证视觉质量,同时符合用户输入的指令。Sora 能够生成包含多个角色、特定运动类型、主体和背景准确、细节复杂的场景。该模型不仅能理解用户提出的指令,还能理解这些事物在物理世界中是如何存在的。简单来说,当你把想要的画面通过文字输入 Sora 后,它就可以还给你一段 1 分钟内的视频。OpenAI 给出了多个示范样例,其中以一段“时髦女性行走在东京街头”的视频传播最为广泛。

这个视频的出现,让很多人对以往的艺

术产生了一种新的疑问:这个年代,人类是否已经不再需要电影,甚至不再需要文学?作为文学中最先出现的诗歌,是不是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 AI 时代进行乡村写作,这是诗人吕煊的一种勇气。在这个走得飞快的时代里,吕煊用自己的慢,在进行某种负隅顽抗。这甚至让人想起堂吉诃德,他迎着风挑战风车。而吕煊,则是在用自己的笔触,让人觉得汉语还需要乡村,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还为“还乡”保留着一席之地。

他必须动用所有传统的力量,为乡村抒写注入一种古典的锋芒。他必须动用故乡的植株,让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地理学的标识意义。“诗歌是一些‘小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也可以存放在心灵之中。然而,路过

的旅行者的‘渺小’却能唤醒并改变他们周围山脉的‘广大’。”美国当代诗人简·赫斯菲尔德在她的诗学散文集《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中如此定义诗歌。吕煊对于故乡植株的描写，就是在通过这种“小”在向读者表明心迹。

他怀念的是家乡的陈皮：“那一年的冬天，跟往年一样地干燥/灰蒙的天空看不到春天到来的气息/藏在身体里的暗疾携带咳嗽/开始逃窜，像一个走失的人/时常被人记起/却始终没有音讯/陈皮是活在人间的一味中药/也曾是一只水果/也是时间隧道里剩下的木乃伊”。通过对陈皮的描写，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意象——“时间隧道里剩下的木乃伊”。“木乃伊”是个舶来词，它属于“中文”而非“汉语”。可以说，在这次意象的构建中，在他对家乡风物的凝望中，他完成了一种融合：古埃及和当代中国，有一种相互的观瞻，出现在陈皮的倒影中。

十几年前，在一个诗歌研讨会上，一帮诗人（包括大名鼎鼎的车前子、梁小斌）共同发布了一个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其中最后一条说：“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当然，这也是对罗伯特勃莱说的“写诗三大定律之一”的“热爱大自然”的具化。通过对故乡植物的描写，吕煊完成了一种真实的辨认。“我手上的核桃是硬的/像人类的脑的内部形状/它们来自核桃最硬的故乡/每一个褶皱/都是一个故事/也有人说/玩核桃人的身上/还装有其他两个核桃/它们有时候是硬的/有时候是软的”。这不禁让人想起香港的一个歌唱组合——软硬天师。因为他们是拍档，所以希望做一个对比，一软一硬，软的（葛民辉）给玩游戏的听众以提示，硬的（林海峰）则留难听众，他们因两人的本身性格而决定谁软谁硬。而软硬天师亦是由“软硬兼施”略改变音调而成，变成形容两个人——软天师及硬天师也。在这首诗歌里，核桃在吕煊的笔触完成了“软硬”的混音，达到了某种和谐。在这种和谐中，“认识植物”已经达成了，这不仅仅是与自然的和解，也是与家乡的和解。毕竟，核桃与人脑形成了一种互文。

当然，让吕煊抓住古典锋芒的，除了对植物的描摹，更有对古典诗人的重写。众所周知，“浙东唐诗之路”闻名遐迩，也让很多古今诗人心中向往。“浙东唐诗之路”，



以萧山—柯桥—越城—上虞—嵊州—新昌—天台—仙居（临海）为主体，历史遗存和人文典故众多，留下1500多首唐诗；是一条自钱塘江经绍兴，而后经浙东运河、曹娥江至剡溪再达新昌，直至台州天台及温州的诗意之路。“浙东唐诗之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专用名词，成为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在《乡村新物语》中，吕煊的笔触就缓缓地在“浙东唐诗之路”上铺展，这是一种重写，也是一种致敬。

在《渔浦渡》中，吕煊这样写道：“开阔的江面，在霞光里忽隐忽现/踏歌而来的修长的白衫/会在船头矗立吗？/我焦渴地等待，是李白手执白羽扇轻摇/还是杜甫弯腰从船舱里疲惫地跨出/船尾的炊烟洗去杜甫暮年的沧桑/那一首渔渡晚唱/弹的是词牌里的阳光曲。”在这首诗里他所倾注的是对钱塘江的爱，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他的重走也在这里开端。

在一个被AI技术包围的时代，诗人沿着“浙东唐诗之路”缓缓而下，在乡愁、历史语境和当代关照中进行一次精神的自我救赎。在天钟寺中，他遭遇着恬淡、出尘的日子：“寺庙的山门/随着钟声敞开/仙人等你入座后就开始上课”；在“书圣”故里，他和李白一样生出“万古愁”：“王羲之终于远离政治的江湖/在剡溪上游的一个岔口/金庭山向阳的一处山坡/他将日暮的江南化成心中的块垒/笔墨成了储备的粮仓/在撇捺中正的汉字里种下希望/九曲十觞，是棋谱/也是留给后世的人生秘籍”；最后，他在富阳“被一棵野菊挡住了去路”：“庚子年往黄公望

隐居的山野 / 放下身段其实也是一种幻想 / 几十年抄书的磨炼对于绘画 / 只是从这个门到那个门 / 挡道的是另一个活在虚空里的自己 / 黄公望决定归隐前的那个夜晚 / 眼前只有秋风, 明月还在等待穿破乌云 / 富春江的空旷如他的内心一样辽阔 / 五十岁后, 我也效仿黄大师 / 选一段心仪的山水, 画画自己的画像”。

至此, 吕焯在“浙东唐诗之路”上完成了一种“自我的画像”。1889年, 凡·高在巴黎画的最后一张自画像, 他将它称之为“死亡之脸”, 并在一封信中写道: “透过这张面对镜子画的自画像我得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概念: 桃灰色的脸上长着一双绿眼, 死灰的头发, 额前与嘴周围满是皱纹, 呆僵木讷, 非常红的胡子, 被忽略而且充满哀伤。”对于一个诗人而言, 自画像和画家一样, 在创作生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催眠”作用。他必须为古人画像, 也必须为今人画像, 最后, 为自己画像。甚至, 在某种层面上, 应该将这个词修正为“造像”。中年之后的吕焯经历了那么多“浙东唐诗之路”的旖旎, 他也想和黄公望一样, 寻找一段心仪山水, 给自己一张自画像。之所以称之为“造像”, 是因为吕焯会动用绘画、诗歌等各种元素, 让自己更加立体。

而在这个造像的过程中, 吕焯仍然需要面对乡村的各种困境。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有一些事件也让人对死亡产生了一些新的想象, 甚至突破了以往伦理学的窠臼。近日, 李泽厚晚年友人马群林在透露李泽厚的遗嘱——希望死后将大脑“冷冻”保存, 以供未来研究之用——“已得到了忠实执行”。2021年, 旅居美国的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辞世, 享年91岁。生前, 他留下这份独特的遗嘱。比他走得更远的是, 有部分人群已经选择将人体冷冻, 期待在未来某一天能够通过新的医疗技术复活。

对于乡村而言, 死亡等事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中国的诗歌语境, 也长期建立在这种对乡村事物的认知之中。冷冻技术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解构了死亡, 如果解构了死亡, 很多和死亡相关的事物都将被改写。这时候, 他就需要动用现代元素对诗歌进行一种重新的认定。

是的, 他并没有固步自封, 在农业抒情中不可自拔。吕焯必须回到现代, “饥饿在食物链的卡口上, 会

被扩大 / 随之搭售的恐惧, 也会反作用于物主”, 在《永康肉饼的禅意》一诗中, 开端的时候, 他就已经完成一种转身, 虽然脱胎于农业, 但这个叙事方式完全是现代关照。对于食物链的关注, 这是一个当代人对于文明秩序的一种反思。“即使工业气息嘈杂。每每有念想 / 肉饼的轮廓就是故乡, 就是圆圆的月亮 / 文友阿秋的特制肉饼, 又是另一种风味 / 故乡的肉饼, 在云端 / 也在城市普通的巷道口的小铺上”。在这里, 展现了一个都市人对故乡食谱的迷恋, 又突出地展现了一个在味蕾中业已失落的世界。在工业气息的渲染下, 人们在标准化的菜谱中寄生, 故乡的肉饼只能存活在云端, 而每次品尝都是一次自我的恩赐和警醒。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 物化的自我在颠沛流离, 这是一个异乡者用自己的诗句, 对现代文明的一种解读——既没有陈词滥调地进行大加鞭挞, 也没有欣喜若狂的全然接纳。成为一个当代文明人最重要的成熟标志在诗里展露无遗——“在拥抱城市生活的同时, 给乡村的愿景留一块自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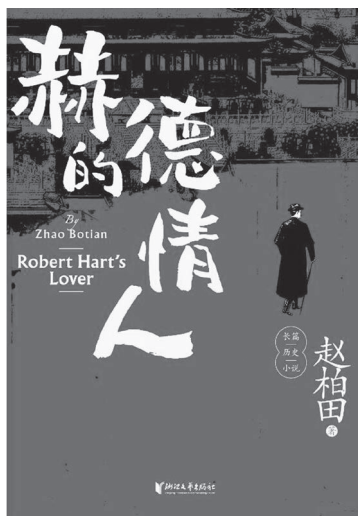
是的, 在大部分的场景下, 人们也必须拥抱城市生活。在农业场景的潮汐退去后, 在城市中, 吕焯也必须露出真身。他留下了这样的诗歌题目: “拼车的香水” “在故乡的大街上等车” “乘地铁外出喝酒” ……这些书写已经完全从乡村的物语中解脱出来, 用心去拥抱这个城市化的当代社会。幸好, 他的视角还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淳朴, 正是这种来自乡土的、未经雕琢的美, 将他留在了诗歌之中。

尤其是在《在地铁遇见怀抱向日葵的女子》这首诗里, 哪怕在高速行进的城市地下通道中, 他仍能从茫茫人海中, 寻找到那属于乡村的芬芳。毕竟, 向日葵以它倔强的生命力, 在暗淡的乡村生活中, 一直用他的暖色调抚慰人心。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 诗人敏锐的一瞥也点亮了整座车厢: “黄色的向日葵一共有三朵 / 它们被一个女子抱在怀里 / 在地铁我遇到了 / 这样一个女子和她的三朵向日葵 / 三朵大小不一的向日葵 / 它们的颜色很接近 / 有着一样的忧伤 / 白色花瓣透着淡淡的黄 / 车厢里的汗味被气流悬挂 / 那些掂着脚尖的人 / 他们无视着三朵向日葵 / 也无视有一个女人 / 抱着三朵向日葵 / 在午后乘地铁”。

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赫德

——赵柏田历史小说《赫德的情人》读后

Article- 风 荷 Feng He



《赫德的情人》书影

“你嬉戏已足 / 你吃饱喝足 / 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1908年4月13日上午七时，72岁的罗伯特·赫德，一个搅动中国政坛50年的英国人走了。清晨，海关大楼前草木向荣，空气里飘荡着他前不久在一次酒宴上念过的短诗，落寞而唏嘘。

没读手里的这本《赫德的情人》之前，我对赫德了解极少。读了之后，赫德这位来自英国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传奇人生，以及纷乱年代里朝野的众生相，一一展现在眼前。历史是斑驳的，也是清晰的。人物是模糊的，也是真实而完整的。这本历史小说的著者是当代作家、学者、非虚构写作代表作家赵柏田。作家对历史有极强的想象和还原能力。他从千头万绪、复杂多变的历史经纬里抽丝剥茧，而后在纸上铺展、照应。小说写得迂回

曲折，但其间的叙述脉络是清晰的，读来并不感觉堆砌、芜杂。

“破晓，惊险地逃过一场海难。”小说由赫德的儿子阿瑟读父亲三十多年前的日记写起。那一年，他的姐姐八岁、哥哥五岁，他三岁，父亲带他们坐慢船去英国。只是他们那时不可能知道，从他们在天津大沽码头被父亲带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抛弃了。他们成了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那种人。以至于后来因长年的隔膜，阿瑟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但到最后还是谅解了父亲。他们的母亲叫阿瑶，是一名船家女子，是父亲在宁波海关工作时认识的。夫妻共同生活了7年，生下了阿瑟和哥哥、姐姐3个孩子。但年轻的父亲赫德为了荣誉和金钱，为了娶门当户对的英国女人做妻子，甩



开了母亲阿瑶。1866年，父亲赫德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前往欧洲时，把3个孩子秘密送回了英国。小说开头写的便是这件事，而后以阿瑟讲述的方式，展开了赫德的一生。

“那是我们海上航行的第三天，一场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潮追上了我们搭乘的‘行如飞号’。大团大团的阴云在北中国海域上空急急飞驰，朔风怒号，如同要把船拍碎似的。”“‘行如飞号’像一只蜗牛一般在风口浪尖慢腾腾地爬行。船舷一侧，大海如同碎裂的花岗岩倾泻而下，我从姐姐安娜惊恐的眼里看到了海水飞溅的泡沫。一阵又一阵的颠簸中，我躺在姐姐的怀里睡着了。姐姐的碎花棉袄里有着母亲身上那种香甜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不再那么害怕。”“我梦见雪花像扯碎的棉絮一样大团大团落下来，盖满了大海，像一件温暖的外套。我还梦见一辆四轮马车在旷野上飞跑，车上坐着我们兄妹三个，赶车的把鞭子甩得啪啪响。我们的母亲在后面紧紧追赶，她的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作家不紧不慢地叙述，把“行如飞号”船行驶在海上的危险场景，以及孩子们的表情、心理刻画得生动逼真。语言既简洁又生动细腻，一下子就把我的目光紧紧吸引住了。

《赫德的情人》共六章，依次为“飞鱼的天空”“回到拉弗内特”“钉住的舌头”“骑在墙上的人”“黑暗中的一跃”“1900，北京”，外加开头的“本事”和结尾的“尾声”。

这里顺便提一下赫德有记日记的习惯，据说他这一生留下的日记有七十七卷之多，这为作家写好这个人物提供了原始的有力的佐证。作家在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家族档案、世间流传的见闻等真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加上自身想象和情感，在亦真亦幻之间，描述出了各色人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或时代紧密相连的故事，多重视角地来塑造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5年的赫德的传奇一生。小说与近代史、人物与时代融合一起，作家的这种宏大的叙事风格，也是一种创新。

读完整本书，你会感受到小说有传记的色彩。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赫德183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乡村，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酒坊和小杂货铺。可赫德并不希望自己日后要么接班经营，要么做个手工匠人之类的。叛逆的他自英国女王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考成为一名进驻中国的外交人员。由此，一位年轻人的别样的奋斗史拉开了序幕。赫德19岁来华，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主宰了晚清帝国的经济命脉近半个世纪，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各个重要阶段，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直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他都深深介入其中。掌权长达45年，直至1908年4月才返回英国，1911年于英国白金汉郡去世，一生的命运降下帷幕。

赫德知道，海关一直是近代国家的必争之地，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赫德也深知，帝国的倾覆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需要他活下去一直作为利益的容器，而帝国这艘大船的沉没没有一个人能阻止，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它下沉的速度。作为李鸿章的老朋友，赫德不仅仅把自己看作女王陛下下的一个臣民，而更看作是清朝政府工作的一个外国雇员。他就像一名出色的走钢丝的艺人，在两大帝国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他自己也说：“我两边都不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边都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他在位时提升海关关税，几年时间便帮助清政府还完了1600万两的英法赔款。此后更是打造出清廉海关每年创收3000万两白银。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他年仅30就被授予了从三品的衔职，戴上白色朝珠顶戴花翎。后来又被英国女王封为男爵，逐步达到权力的巅峰。他更是恭亲王眼前的大红人，同文馆的创建以

及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出访均是其在任时的功绩，所以说赫德掌握着大清命脉近半个世纪，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作家对近代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多视角地展现了赫德这位北爱尔兰人如何在时代的夹缝中生存，为大清和英国服务的事迹。虽然赫德也是那个混乱世界的投机分子，想要到遥远的东方有所作为。但不同的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头脑，他几乎成了那时帝国内权力最大的洋人。相比于他的前任海关总司、狂妄自大的李泰国，赫德努力工作、天性谦逊、多才多艺、性情平和内向、敬畏上帝、追寻帝国，是那种可靠的人。

小说的题目为《赫德的情人》，那么来说说他最初的情欲与教义的矛盾。小说用很多笔墨写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人来到异域之后的迷茫。特别是在宁波，他喜欢上他的中国情人阿瑶，那个初见时展现出美妙厨艺和独特身体的充满野性魅力的少女。后来回到家乡拉弗内特，小说中写道：“他似乎有些明白过来，他和她一起度过的七年，是一生中最销魂的时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的女子带给他同样多的快乐和痛楚，包括即将成为他妻子的赫斯特·简。他对女人的所有幻想和激情，都已在那个叫阿瑶的女人身上耗尽，在中国东海岸一座叫宁波的小城耗尽。她现在在哪里？她好吗？会有什么样的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呢？他偷偷带走了她身上掉下来的三个骨肉来到英国，她一旦得知，独自如何得活？他就像一条狂暴的河流裹挟着她走了一程，又毫不留情地把她抛上了河岸的浅滩，现在他知道，他抛弃了她，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也就枯死了，这枯死的部分再也不会回到他的身上。”读来无限惆怅和失落。

但他还是娶了英国波塔当小镇的赫斯特·简为妻。对英国妻子，分别时天天写信表达思念，但其实没过多久就同床异梦。他的热情早在与阿瑶的生活中耗尽了。晚年他在最孤独无助的时刻想起了他青年时期的中国情人阿瑶。小说中又这样写道：“这天晚上，赫德在公使馆里彻夜未眠。黑沉沉的天空中不时亮起炮弹的弧光。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生命的无常。奇怪的是，此刻他想的最多的不是远在英国的妻子，而是被他抛弃了的那个中国情人阿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她想到心



痛。他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再也不会离开她了。”女人至于男人，正如民国才女张爱玲说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年轻人要珍惜拥有过的这些经历，不要憎恨任何一个与你有过交往的女人；相反，你要感谢她们，你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他们塑造了你。”这是小说中赫德同年轻的下属所说的话，也是年老的赫德内心的悔恨和怀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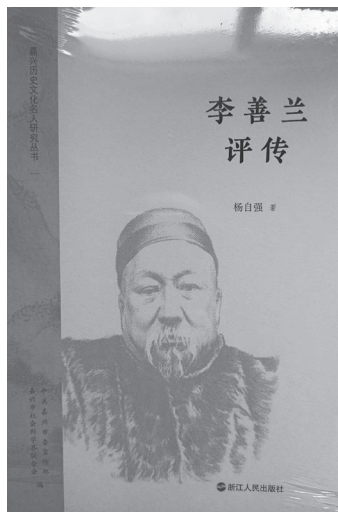
小说中赫德的形象有别于历史书中的赫德。青年学者、作家羽戈在读了本书之后说，赵柏田的《赫德的情人》还原了一个更真实、更生动、更完整的赫德。我深以为然，看来小说比历史未必不可信。尽管赫德的漫漫一生，犹如小说结尾写到的那场夜宴，“这一切就好像一场海市蜃楼的幻景”。

能在废墟中将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肯定性的写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写作。正如作家谢有顺在《书写内心的肯定与相信》里所说。只有作家的精神底色是明亮的，有更高的精神参照，那么这部作品是值得一读再读的。我读后，一个英国人的形象在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他就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名叫罗伯特·赫德。■

生命过程与科技求索的活动形态

——《李善兰评传》的叙事小析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李善兰评传》书影

杨自强先生在《李善兰传》出版后的17年，又出版了《李善兰评传》。这对于作者来说，是在他的学习与积累的时序中，把旧本和新稿做着相连的继续。而这份继续，并非略做字句与其他个别存在差错的修改，而是以重新回溯旧本创作的同时，以新学习、搜索到的史料做分析后的一次新叙述，是试图通过新叙述，把历史的李善兰，做出当下的评述。评是客观比较分析，述更是带着有着研究成分的一次梳理与深入的阐释。也就是说，作者在新发现的李善兰相关史料中，是研究着、做着个性化的理解，并期待把李善兰这位历史人物与业绩，更加符合历史本质和他那个时代的意义传递给读者。与此同时，当我们拿到这册新书时，也就会让我们享受到当下阅读的“李善兰意义”。

《李善兰评传》的第一大特点，在于作者注定“评传”，立足的是历史的大视野。如讲成长中的李善兰，作者于数学的回溯，专门叙述了杰出数学家李治的成名背景，以及对他的《测圆海镜》体例等的评析，和李善兰早年因已学天元术，所以能对《测圆海镜》更为深入的理解，并由此在李善兰坐镇同文馆时，能将此书列为教材的缘由。又如李善兰的《方圆阐幽》，作者从近年出版的《管庭芳日记》中，找到了相佐材料，确定了李善兰“尖锥术”发明的时间段，同时，描述李善兰研究素数、发明“中国定理”，与伟烈亚力、麦克格雷尔、詹美生(R.A.J)等外国数学学者的不同意见，从中见出李善兰研究中独到的占先一面。这无疑是以国际视野的比证，求出了李善兰“中国定理”的前沿意识与符合科学逻辑的一面。

对李善兰坚持儒家信仰的描述，作者亦做了深入的调研。从王韬日记里，更可见出魏晋风度的李善兰，狂笑醉饮之中“纵谈天下大计”中的拳拳爱国情怀。特别是当他面临一些朋友熟人几乎都认为他“信了基督教”时，作者就记述了他对丁韪良的发问：“你们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派传教士到贵国？”（引自《李善兰评传》下同）这位内心怀揣儒家精神不动摇，面对西方文化又大胆吸纳的李善兰，就以“这一个”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强国之道》这一节，自国际形势始，假王韬、冯桂芬之口言及利弊，一幅大视野的中国面临“欧风美雨”及鸦片战争后承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现状，便清晰简要地昭示于读者。而对上海这个最早通商口岸的叙述，作者更以“知识”为矢，放的于时势，历史又现实地把李善兰作为时势中人推出，让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传主的思想与内心情感。所以墨海书馆的叙述，相对而言是浓墨重彩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忧愤、勤奋和正义的李善兰。也让我们透过一些细节的刻画，看到了传记作者深入阐释传主的爱国情怀，已十分客观并历史地评析着人和它的历史。

往往一本好的传记作品，如1995年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等，往往总是在作者叙述的深度上，见出传记的学术性价值。这一点，同样在本书《符号代数与微积分》《经典力学》《近代天文学》和《西方植物学》这几节中得识堂奥。在《符号代数与微积分》中，我们知道了当时中国代数的“初级阶段”，读出了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代数学》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更明白了在译作过程中，李善兰创立新概念、新名词、新符号的划时代意义。而《代微积拾级》既让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本微积分教材，以及它的启发和培养精尖数学人才的潜在功能。尤其是传记作者的细致叙述，更让我们知道了这本书非但在中国掀起了知识的波澜，更涉及日本国，以至于有根立助七郎在日本天皇的钦定下，率51人使团前来中国访问学习。在《经典力学》里，作者详细阐释了“重”和“重学”，也知道李善兰因译此书而大胆结识了艾约瑟做朋友畅游西湖，以致引出了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影

的“轩然大波”。同时，让我们还看到了《重学》的出版史，这无疑于传记本身而言，着实是金贵的文献与史料合于其中。在《近代天文学》中，我们了解了李善兰作为《谈天》的译者，是如何不拘泥于就书而译的——他在翻译中，是如何目光远大地把“1851年后西方天文学的最新成果补入书中”。同时，对于“日心说”与中国的“天圆地方”传统观念，作者又做了颇为深入的引介剖析，从中见出李善兰的学术思想，是“领先于现代的杰出之处”的客观所在。在《西方植物学》中，我们了解了英格蘭人韦廉臣和他创办的“同文书会”。我还特别关注到作者引用“辑译”一词时所做的评论。由此也进一步理解了这部《植物学》真正意义上的“辑译”，实是多人学术成果和学术见解的“合译”。在这本译著里，李善兰让我们获得了至今仍为科技上在大量运用的“细胞”“胚”“胚乳”等意义深远的独创名词，而对于这些名词，传记作者亦做了简要、生动的叙述。要说“评传”比上一册“传”有何深化与学术性，我可以这样说，《西方植物学》一节的结尾一段，作者以李善兰照译“上帝”“造物主”“妙用”等提法，有些学人认为是李善兰学术思想的缺陷，甚或糟粕，予以了客观的评说与批判。作者坚持认为，对于这一“照译”，要将它放到



“欧洲近代科学发展中与自然神学紧密结合的文化背景”上去看，因为事实也正如此，作者在前引用美国史学家怀特的话——“现代科学是自然神学的外推”，已经予以了客观正面的回答。而最后作者又认为李善兰是人不是神，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他对科学的认识，自然是有限度的，这是客观的存在。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也是作者在这节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事实上，如果把李善兰序言中的‘上帝’理解为大自然，可能更符合的李善兰本意”。我想，《李善兰评传》的学术深度，或许可从中见出。

自然，我尤为赞许的，是传记作者慧眼所识李善兰翻译中的“本土化改写”。“李善兰译介西方，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国人的科学素养，从而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这是作者对李善兰本土化改写的精要小结。而在具体如何“改写”中，作者便就“内容”“原著选择”“方法”“译名”“年代”等均做了扼要的疏理。在内容上，“对原著进行了增加、删节、改编”；在“原著选择”上，以中国本土“传

播可能”为前提，“一是基本上是中国没有的学科，二是以普及为目的类似教科书的书籍”；在“译名”上，“李善兰译著中的术语、概念，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在“年代”的转译中，李善兰更是把西历直接推算后改译成中国的晚清时代通用的“皇帝号纪年”和“农历记月、日”。这一节虽然是作者演绎式的罗列陈说，但从中我们可以见出传记作者逻辑归纳的运用，更可明了作者重在“本土化”之“改写”文意上的学术见解，是“适者生存”的最好的传文本的意象注释。

综观《李善兰评传》的叙事描述，是作者站立于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的基点上，以史料的新发现及比证中的辨析，把通过对传主人生每个转折阶段赘述中的评析，把中国近代数学先驱的李善兰，以递进渐长的方式，较为完全地呈现给了读者。同时通过其知识积累中的个性化理解，让读者更大程度地受到了被叙述评析对象的身上和他的作为予以的意义的感染、启迪和价值的非一般通读性的认知。在其中，作者恰如其分地以叙事二分法的手法，一方面摆设出新发现的资料，以证人物的丰富性和可评析人物依据的充足性。另一方面又以个人学识素养的积累基础做着个性化的理解与评析，并在评析中辩证和充盈着人物情感世界与精神科技世界。尤其让我们可欣喜地看到，作者在叙事技巧上所运用的中国式的动态的、生命形态的写法，更是让读者的心灵充分感受到了传主的生命过程与探索科技的活动形态，让我们对这位中国数学、力学与天文学研究的科技先驱，有了更为心灵相依的审美感受。在本土化重写的一节里，还可让我们看到与别的传记的不同之处，而正是这不同的差异写作，让《李善兰评传》才更具可读性。■

形式特别、科幻人文与诗意超越

——评钟求是中篇小说《宇宙里的昆城》

Article- 谢修金 Xie Xiujing

如何在写作上实现突破，对于任何作家而言都至关重要。温籍作家钟求是不仅致力于在作品中书写普通人的非凡故事，也在写作上孜孜追求，表明了他对超越的向往。2022年8月25日，钟求是凭借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除了现实荣誉外，这更象征了新的阶段，钟求是曾说：“这个奖更像是一扇有难度的门，跨过之后，我以后的创作会更加自若，视野也会更加开阔，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往前行走。”这意味着，鲁迅文学奖成为钟求是发生改变的契机，他的文学创作将诞生出新的素质，进入新的境界。

《宇宙里的昆城》（刊于《收获》2023年第1期，以下简称《昆城》）是他获奖后的新作，《昆城》讲述了物理学家张午界追寻梦

想的一生，他从昆城出发，初学合肥，续读香港，继而前往美国深造，辗转漂泊于各个实验室。他的执着使他毕生都未停下脚步，最后不惜以人体冷冻的形式保存寿命，寄希望于未来。《昆城》延续了钟求是追求诗意超越的主题，但它独特的文本形式，以及对于科幻元素的运用，都显示出他确实以开阔的视野继续着他的创作，努力使自己步入新的阶段。

—

钟求是在《昆城》中采用了“元叙事”的策略，即作者将自己编制故事的过程直接呈现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



也呈现自己的构思过程。在《昆城》中，作者就一步一步讲述自己重逢故旧一产生兴趣一深入追问一挖掘故事的过程，这一过程即小说的发生与发展。钟求是从一开始就表明他在帮助同学进行房子交易时，捕捉到了“文学大料”，这块“大料”所涉及的复杂因素，令他感到激动，于是他开始和主人公进行“收集故事式”地联络，整篇小说由此而完成。“元叙事”的应用，使得钟求是是在《昆城》中同时拥有作家、叙述者以及人物三重身份。钟求是对作家身份的强调，固然会带来疏离感，但小说恰恰因此拥有了生长空间。正是因为他作为作家的敏感，使他生出了“时间让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改变”的问号，才有了小说的进展。在某些章节里，钟求是又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与徐从岚和张午界直接联系。整篇小说，就是在作家、叙述者和人物的相互交缠中完成叙事的。文学史上，“元叙事”的出场是为了击破传统现实主义的“似真幻觉”，可钟求是似乎又无意于冲击“似真幻觉”，反而强调此乃“真实故事”，并且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是非文学性的文本，如此一来小说获得了非虚构感，“元叙事”反而成为建构真实的手段。

重复叙事是《昆城》的又一大特点，张午界的美国经历、马拉松以及陶瓮等在小说中被重复提及。实际上，无

论古今中外，重复叙事在文学作品中都频频出场，其目的是彰显形式。张午界的美国经历在二、三、四和八节中重复提及，运用了三次的形式。在第二节采用传统叙述，第三节则是邮件问答，四、八两节为访谈录。同一段经历，在不同形式中以不同视点讲述，在每次叙述中，都会补充新的细节。张午界的美国经历逐渐清晰，演化为复杂的故事，其形象也变得立体。这也体现出重复叙事的强调作用。恰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不停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在小说中形成一股张力，强化了祥林嫂的悲剧意味。《昆城》中的重复叙事也具有相同作用，四次美国经历的叙述，重点各不相同。第一次突出张午界对M理论的痴迷，体现出他不忘初心的特质。这次叙述简单勾勒出张午界徐从岚的奋斗历程，没有过多的细节刻画。第二次则以徐从岚的视角，通过邮件问答，将二人的生活经历细化。徐从岚追忆了二人的艰辛，以及他们分别的过程，点明了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第三次是张午界的自述，由他讲述自己经历的痛苦、漂泊和孤独，进一步渲染了张午界的理想主义者气质。第四次又由徐从岚叙述张午界的背叛与自杀，道出张午界的倔强与坚忍。此外，小说中两次关于雷云距离的计算，一方面首尾呼应构成对称美，另一方面又增添了张午界的悲壮，他为理想做出巨大牺牲，在现实中却籍籍无名。而马拉松和陶瓮多次出现，无疑成为对张午界的人生隐喻，本文将在第三节展开论述，此处不赘述。

《昆城》还运用了多种文本类型，小说的第一、二、五、九节为传统叙述，第三、六节为信件，第四、八节是访谈录，第七节则是新闻报道。在一个中篇的体量内，运用了四种文本类型，显得纷繁复杂，而且非文学性文本，无疑会妨碍作品的文学表达。可是碎片拼贴的形式，将“似乎毫不相干的片段构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从而打破传统小说凝固的形式结构，给读者的审美习惯造成强烈的震撼，产生常规叙述方式无法达到的效果”。《昆城》的四种文本类型并不显得松散，反而凝结成整体。不同的文本类型意味着不同的叙述方式，显示了作者精巧的结构能力，同时读者在不同的文本中穿梭，也能获得奇异的阅读感受。这些都显示了钟求是对自己以往创作的突围，《昆城》无疑是他的一次实验创新。

二

《昆城》对科幻元素的运用,彰显出它的新颖。小说中的量子力学、M理论、粒子加速器、对撞机以及人体冷冻技术等,都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元素。在科幻小说中,尖端科技成为重要元素,虽说其中掺杂了作者的想象,但也并非完全虚妄。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中所讨论的机器人自主意识的问题,惊人地预言了当今人工智能发展的某些问题。大众往往无法亲身接触真正的尖端科技,科幻小说却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使我们能够一窥科技的奥妙,于是在科幻小说中,科技、理论本身就成为独立的欣赏对象。在《昆城》中,当张午界如痴如醉于M理论,心心念念于重现宇宙大爆炸的场景,不懈追求于粒子对撞实验的实现,甚至不惜借助人体冷冻技术,读者在为人物的行为、人格魅力所折服的同时,也受到这些科幻元素的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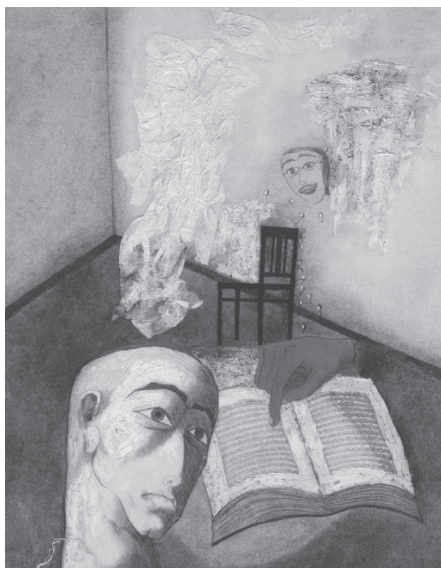
但是需要点明的是,科幻元素并非《昆城》的重点书写对象,因为《昆城》是钟求是“试图将科幻文学的创作元素和观念融入传统文学创作的新尝试”,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钟求是也不像刘慈欣那样,具有理工科的学科背景,他在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昆城》中的科幻元素是为人物形象服务的。小说中的M理论,作为“十大超越人类极限的未来前端技术之一”的人体冷冻技术等,都契合于张午界诗意超越的气质。若从文学是“人学”的视阈来考察,那么不管科幻作品中融入了何种理论与技术,其实都是在描写人、思考人和探索人。科幻作品同样需要植根于现实,以现实中的人为参照,才能书写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不同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思考人,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讨论的是,人类面对末日危机如何生存自救,而钟求是在《昆城》所追问的,则是理想主义者在世俗世界里何以栖居的问题。

对于科幻元素的借用,或许是钟求是的个人兴趣,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原因。自《三体》《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以来,我国的科幻文学步入世界水准,科幻文学越发受到学界的重视。另外,从两部《流浪地球》所吸引的关注,也不难看出大众对科幻作品的青睐。钟求是大

约体察到这样的趋势,所以才会尝试书写科幻题材。钟求是曾说过,面对生活的变化,“需要写作者对过去的传统逻辑进行调整,对新的生活常识和伦理秩序进行辨认,捕捉和熟悉新的公共认定与集体经验”。足见他充分具备对于生活的敏感,《昆城》发表于2023年1月,正值电影《流浪地球2》、电视剧版《三体》以及动画版《三体》上映,可谓恰逢其时。《昆城》是严肃文学与科幻文学融合而成的产物,显示了严肃文学作家对固有偏见的突破。钟求是的尝试,或许对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由于对苏联科幻文学理论的承袭和叶永烈科学文艺理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幻文学一直被纳入儿童文学的范畴。即便是以思想深刻性著称的《三体》,其系列第三部《三体3:死神永生》在国内竟获得了九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这暴露出我国对于科幻文学的认知还十分粗浅,尚不能将其视为严肃作品。这是我国科幻文学长期发展良莠不齐所导致的,而之所以科幻文学难以振兴,又是我国长期科技落后,难以为作家的想象提供支撑,但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环境具备了产出高质量科幻作品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势必要转变对于科幻文学的认知,使其不近囿于儿童文学的藩篱,或者成为科普读物,而要作为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为读者所接受。而钟求是的尝试,提供了非科幻文学作者进入科幻文学的路径,展现了我国科幻文学的更多可能。传统的严肃文学对于科幻领域一向极少涉及,这一片空白亟待更多的严肃文学作家去开疆拓土。

三

钟求是擅长在小说中勾勒“无垠向上的生命弧线”,张午界正是这一“弧线”的表征,他自言是生活脆弱者,但面对理想却展现出非凡的坚韧。张午界的人生轨迹可视为三次突围:第一次突围,走出昆城,求学中国科技大学,续读香港中文大学;第二次突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第三次突围,背叛导师,转向量子力学研究。每一次突围,都存在巨大困难,非有极大决心而不能完成,正是张午界



对宇宙大爆炸的向往赋予了他决心与动力。支撑他不断前行的是他的理想，他求学并不是为了学位，而是为了不断靠近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才会为此付出一切。张午界的理想缘起于儿时对于宇宙的着迷，彼时的他好奇着星星与地球间的距离，昆城在宇宙中的位置，多年来他未曾将其忘记，他身上一直“残留着少年的影子”，永远保持着“内心的干净和向外的好奇”。小说中，徐从岚强调“午界一直是中国人，也一直是咱们昆城人”，正是要点出张午界行走半生，却始终铭记初心。

前文之所以说马拉松是张午界的人生隐喻，是因为马拉松（或者长跑）在小说重复出现八次，而且有三次是把长跑和张午界的学术道路相类比，可见此乃关键元素。虽然张午界跑马拉松具有功利目的，但是马拉松作为一项高强度的耐力运动，缺乏艰苦的训练和强悍的意志，根本无法完成，这项运动彰显了人类的自我超越精神，正契合于张午界坚韧超拔的精神气质。张午界的奔跑距离由短而长，正与其学术上的突围如出一辙。因此马拉松既是张午界肉体的奔跑，也是他人生的奔跑。在小说中，张午界提到了长跑过程中的疲劳点，这又被称为“极点”，指的是人在剧烈运动中，身体达到极限的状态。“极点”是长跑中最艰难的时刻，跑者很有可能在此时选择放弃，功亏一篑，但若是咬牙坚持，撑过“极点”，身体会获得无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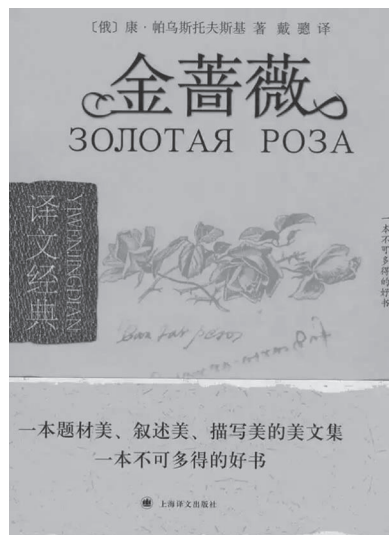
伦比的感受，跑步也会变得一帆风顺。“极点”还有另一个形象的名称，叫作“撞墙”。跑者遭遇“极点”时，就像一面墙挡在面前，令人举步维艰。这面墙同样竖立在人类探索宇宙终极的路途上，令张午界无法捕捉宇宙大爆炸的亮光，但他显然不打算就此放弃。

通过以上论述，张午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特点已然显明，而钟求是又把他与徐从岚的对比，进一步深化其特质。小说中，徐从岚在讽刺意味上把张午界比作堂吉诃德，但钟求是则认为不能将两者等同，他说：“支撑堂吉诃德行为的是幻想，而支撑午界行为的是好奇。”其实剥离掉讽刺意味，张午界和堂吉诃德本质相同。堂吉诃德看起来滑稽可笑，实际上却信念坚定，他是塞万提斯塑造的“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对待理想严肃认真。张午界和堂吉诃德一样，都是立定目标后，始终坚持不懈，不为任何人事所改变的人。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对比，张午界与徐从岚也同样如此。他们由于“生活态度的落差”，一个生活在平常的世俗里，另一个却飘在空中，注定要分道扬镳。徐从岚愿意做守着丈夫孩子的东方式的传统女人，满足于阖家欢乐的平淡生活。可是张午界专注于追逐宇宙大爆炸的亮光，给不了她想要的轻松。其实两人都没有错，却无法圆满，其中没有浓烈的冲突，却满是无奈。

当然，张午界未免过于理想，所以不得不承受失败的命运。也许正是体认到失败必然，张午界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虽然他最终放弃自杀，但是“一个人有过死的念头，生活会变得不一样”，张午界放弃了实际死亡，但是他仍然遭遇了精神上的死亡。他放弃死亡的举动，具有重生的意味，或许在决断的那一刻，张午界像西西弗斯一样，超越了绝望，所以他才会选择继续坚持。而对于超越了绝望的张午界来说，成功与否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地前进，不停地突围，使自己的生命始终处于行动之中。钟求是所塑造的张午界，对于现代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现代社会通过各种规训手段，抹杀了人的个性与独立追求，从而无法成为“完整的人”，面对这一困境，卡尔维诺给出的路径是“生活在树上一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而钟求是则用张午界的诗意超越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寻找《金蔷薇》

Article- 麦田 Mai Tian



《金蔷薇》书影

初次读到《金蔷薇》在大学时代，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是一位同学刚从图书馆借来，推荐给我阅读的。这是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部创作谈，讲述了作家应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构思作品、锤炼语言，想象的重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等等。

其实，大学时代我大量阅读的是欧洲古典名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对散文类不是特别有兴趣。然而，翻开第一篇《珍贵的尘土》，就被一个悲郁而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一口气读完了《金蔷薇》，陷入深深的沉思……

在这部“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里，谈及了十几位著名作家，虽然谈论的是文学家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探讨的是作家劳动的特征、规律、经验。然而细读可以发现，每一篇

都蕴含着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情感追求和审美理想。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以充满诗意的故事情节，清新隽永的语言风格，讴歌了善良、同情和博爱的人文精神，大自然和艺术的无与伦比的美，想象和奉献对于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为爱情、正义和理想而献身的崇高情怀。《金蔷薇》以纯粹的散文手法写就，散发着大自然的神秘气息，阅读它就如同亲历一次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又像是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的私语》钢琴曲中踩着金黄秋叶的漫步。而它的欧·亨利故事式的悲情结局，又是如此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村初中，开始了我漫长的教书生涯。那时的乡村业余生活非常贫乏，只有教师办公室的一台



黑白电视机，供我们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打发时光。好在那时教书的压力不大，我有足够的时间阅读自己订阅的小说、诗歌杂志。而在阅读或一个人在校园后面的小山坡上沐浴凉风的时候，常常会想起《金蔷薇》里悲郁而美丽的故事。周末，我除了回家帮父母干一些农活，经常背着黄挎包，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到县城逛街，逛新华书店。我便一次次隔着柜台玻璃，寻找《金蔷薇》，但都无功而返，失望而归。

后来，我托在杭州做旧书生意的弟弟到旧书市场，寻找《金蔷薇》，依旧杳无音讯。终于有一天，弟弟用包裹寄来了《金蔷薇》，这本标价仅仅为六毛二分的小册子。而那时，距我初读《金蔷薇》已经二十多年。

虽然，我已不再年轻，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但再读《金蔷薇》，我沉静的心，仍然被一次次强烈地撞击，特别是那几个悲伤而美丽的故事……

《珍贵的尘土》讲述了法国第二十七殖民军士兵约翰·沙梅的悲情经历：在墨西哥作战的沙梅因患热病没上一次阵地就被遣送回国，临行，即将上战场的团长将自己八岁的女儿苏珊娜托付给沙梅，带回里昂交给她姑妈。在漫长的海上航行途中，沙梅为了哄终日沉默寡言的小

姑娘开心，讲了一生经历的许多片断，还讲了一个凄美的关于一朵金蔷薇的故事，告诉她金蔷薇能给人带来好运。当时小姑娘问沙梅：“约翰，有没有人会给我一朵金蔷薇？”回国后，沙梅这名普通退伍大兵尝试过各种卑微的职业，最后成了巴黎的一名清洁工，过着贫困的日子。不过，他的军用背囊里一直珍藏着苏珊娜的一条有紫罗兰幽香的蓝色发带，沙梅总想要到里昂去看看苏珊娜，但每次都延期了。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命运女神眷顾，沙梅在塞纳河边突然遇见了他魂牵梦绕的苏珊娜。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她的父亲早已经负伤死在战场。苏珊娜当时刚遭遇失恋的挫折，见到沙梅便像见到亲人一样的亲切，尖叫一声扑到沙梅身上，在沙梅家里一住就是五天，最后沙梅出面使苏珊娜和恋人破镜重圆。就在苏珊娜与沙梅分手的时候，她情不自禁说了句“假如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那便一定会幸福的”。从此以后，沙梅不再将从首饰作坊扫出的尘土倒掉，而是带回家里，每天深夜从尘土中筛出被首饰匠挫掉的金屑。就这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沙梅已经变成了形容憔悴的老人，但积攒的金屑已足够打成一朵金蔷薇。可是正当金蔷薇终于做成，沙梅日夜盼望着与苏珊娜再次见面的时候，他才知道，苏珊娜早已从巴黎去了美国，而且一去永不再回来了，也没有留给他任何住址。沙梅的精神彻底垮了，不再去打扫作坊了，在自己的草房里躺了好几天。不久，他枕着金蔷薇悄然地逝去。

作家原想通过这个“沙里淘金”的故事，阐述文学工作者创作的艰辛，积累对于作家犹如“珍贵的尘土”。但我们却从生动的故事里，读到了作家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沙梅的一生是卑微的、孤独的，在无爱的生活中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但他用父亲和兄长般强烈的爱温暖了苏珊娜受伤的心。他的爱是默默的，是无人理解的，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还有像《夜行的驿车》《早已想就的一本书》等，都有一个令人扼腕的凄美故事，并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甚至再创作的空间。尤其是安徒生和叶琳娜·瑰乔莉短暂的偶遇、永远的离别，留给每一个读者太多的想象空间。安徒生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伟大童话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然而他却断然拒绝了生活中最美丽的爱情

童话。“走吧！解脱自己！让你的眼睛永远微笑。不要想我。如果将来你由于年老、贫困和疾病而感到痛苦的时候，您只要说一句话，我会徒步越过积雪的山岭，走过干燥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安慰你。”叶琳娜·瑰乔莉临别前对安徒生说的话，是多么让读者跌宕回肠，直抵心灵。

安徒生再次坐上“夜行的驿车”，继续他的寻找童话之旅，“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终生互相怀念着。”我们在为短暂的爱情遗憾扼腕之余，看到了一位献身文学的作家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正如安徒生临终前不久，对一位年轻作家说的话：“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莫泊桑在弥留之际，“觉得他的脑子整个被毒盐伤害着”，“想到在他这匆促而疲惫不堪的一生在他摒弃了多少真诚的感情。”而有一件事竟像“盐的尖利的小晶体在刺入脑子”……这是《早已想就的一本书》里的片段，还是与爱有关。巴黎一家工厂的一个年轻姑娘，天真美丽，读过许多莫泊桑的小说，生平只见过莫泊桑一面，就爱上了他，有了“一种把自己生命献给他、关怀他，做他的朋友、妻子、奴隶和婢女的疯狂想法”。她整整一年忍饥挨饿，把钱一个生丁一个生丁地积累起来，置办了一身优雅的衣服，去见莫泊桑，向他告白一切。莫泊桑当时住在郊外别墅，大清早给女工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好色之徒，他骗女工说莫泊桑和他的情妇出去了，好几天才能回来。她听后尖叫一声离开，没头没脑地哭着说要报仇，当天晚上，她故意和自己作对，故意叫莫泊桑生气，委身给这个荡子。一年之后，她成了巴黎一名年轻的名妓。让莫泊桑弥留之际还刺痛的是，他从朋友口里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只是冷笑了一下，觉得这个姑娘的故事蛮好玩，或许还是一篇不坏的小说题材。从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神奇力量，它能给人幸福，让人变得坚强，同样它也能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只有两百多页的《金蔷薇》里，涉及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安徒生、莫泊桑、雨果、契诃夫等十几位著名作家，从大自然美丽的赠予、作家的生活经历、著作的创作过程，通过那些发生在作家身边的凄美故事去解读写作技巧的特有密码，抒发了对文学事业、对



祖国、对人民、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爱，留给文学爱好者一笔珍贵的财富。

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我在寻找《金蔷薇》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找年轻时的梦，一个早已深埋在心底的想成为作家或诗人的梦。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梦里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是忽视了一生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珍贵的尘土”，还是沉浸于安享轻易得到的我们自认为的幸福？这也许正是《金蔷薇》想要告诉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那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

Article—郑润良 Zheng Runliang 陈 河 Chen He

靠海外经历写作是无法持久的

郑润良：我读您的小说时，第一个感觉是好看、抓人。这是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一个共同点吗？我觉得你们的作品往往都有自身戏剧性人生经历的折射。我知道，与其他海外作家相比，您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一点也不逊色。

陈 河：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海外作家的个人经历问题。海外作家的人生经历，相比起国内目前一些年轻的作家肯定是要多一些，因为毕竟在海外，要流连颠沛或者是艰苦创业啊，总是会吃一些苦头。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过去呢，因为海外作家这种经历，可能就是特殊的经历，比较重要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出国出得少嘛。比方说以前最早的那些如《北京人在纽约》，后来还有《曼哈顿的女人》，当时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现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了，大家都

可以出国，很容易——出国一张机票可能比到国内一些西北地方还便宜，这个情况是有变化。至于我被绑架的这个事情，当时好像是十年前，中央电视台拍过，在华人世界那个专栏里面，有两集吧，给了我一个专题节目，里面确实提到被绑架的作家。当时是在1998年，我已经离开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生活的第四年，马上要准备移民到加拿大了，但是有一次给绑架了，在地拉那，一群当地的年轻人把我绑架放在一个防空洞里面，那回很危险，差一点就死掉了，但是值得。我在防空洞里有一天居然会想到自己假如能够活着出来，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成文学作品。因为过去写作写过几年，出国之前一直想在《收获》上发表作品，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希望。后来就是在被绑架的时候，生命都快没有了，那个时候突然就想，假如说我能出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收获》应该会发表，因为这个题材很新奇，而且都是自身经

历。后来运气很好，给警察救了出来，后来又马上去了加拿大，开始做生意啊什么的，后来五六年以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写作的这个想法又有点回来了。好长时间有十来年没写了，就好像机器锈了一样，开不动了，想来想去，就想把自己那段被绑架的经历写出来，然后写了整个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重点放在那个绑架的事情上面。给朋友拿过去，结果在《当代》上发表了。《当代》一发表就在全中国引起关注，就有些人开始关注我，然后作品就在《收获》《人民文学》陆续发表了。所以说，这个被绑架的事情反而成就了我重新开始写作的一个契机。

郑润良：您20世纪80年代当兵回来后一方面在国企上班，一方面从事写作，虽然生活安稳，写作也小有成就，却感觉看不到生活与写作的真正前景。能否介绍一下您出国前的写作情况。您从事写作有受到周围亲友的影响吗？第一部正式发表的作品是什么？是什么勾起了您的创作冲动？发表过程顺利吗？有什么样的反响？

陈河：我是1976年底去当兵，然后1977年开始有高考，就把这个上大学的机会错过了，回来以后就没有再去上大学，自己在温州的师范学院在职修中文专业。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很喜欢写作，当时中国写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在街上拿个砖头，从哪个高楼上砸下来，砸到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作家。当时余华、苏童他们就是写出了一个作品，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我当时也是这百万大军里面的一个。但是说实话，我是从小就喜欢文学。家里边也没人影响我，我父母亲都是当时机关的一般干部。真正坚持下来写作的人是不多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好玩或者是为了一些什么利益，觉得没什么希望就撤了。我还在默默摸索，温州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想写出名确实也比较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那是一个黄金的时间，那段时间我确实写了一些东西，发表了一些东西，大概在浙江省也算是有一定影响。我记得在外边的杂志，比方说在云南的《滇池》，还有一些其他杂志，然后主要是在浙江的《江南》《东海》杂志上面发表了一些作品。我记得几个中篇，比方说《菲亚特》什么的，这几个中篇都已经写成了。当时我还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篇就叫《夜巡》，但是《夜巡》写好了以后，

就快要出国了。当时这个《夜巡》也寄过几个杂志，都退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夜巡》这个小说写得很好的。出国了，就放起来了，压到那个箱子底下。大概过了十多年以后，第二次写作的时候，一直到了2009年，我已经到了加拿大，重新开始写作了，在《收获》上已经发过一个，大家就应该注意到我了。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原来有个老的一个稿子，就是那个《夜巡》，终于把它从那个箱子里面找出来，那手写的稿子上的订书针全部锈了。我把它重新稍微修改了一下，发给了《人民文学》，可能刚好有一个篇幅吧，就把它塞进去了。发表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后来，这篇稿子还是有人看到。洪治纲看到了这个小说，认为这个小说非常好，本来他是要编进他的一个年选。但是已经过了时间，年选就编不进去。他不认识我，后来就托人转告我，说你这个小说是很好的小说，很可惜我没有把它编进去。后来他找了一个补救机会，他在《上海文学》主编一个短篇小说推荐专栏，然后他就为我这篇小说配了一个评论，发在专栏的第一期。后来这个小说还获得了一个奖，当时有一个“咖啡馆短篇小说奖”，是北京的一个诗人搞的，蛮有意思，全国包括写得最有名的几个中国短篇小说作家都进入名单，最后他选了我这个小说。

郑润良：您觉得您前期的创作主要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当时您最喜欢国内外哪些作家作品？在创作中会有意识地模仿这些作品吗？从哪一部作品开始，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基本已经达到作家的水准？又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写作面临瓶颈？

陈河：关于创作受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说实话，我小时候就开始读很多的书，那种古典的或者是中国以前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小说也都看了。那个时候也有国外的书，一些俄罗斯文学的书，还有巴尔扎克的这些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在我后来有意识地开始学、想写小说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可能是莫泊桑。我当时好像一直反复在看莫泊桑的小说，后来发现了海明威，我特别喜欢海明威，就把海明威那本小说集看看去。还有一本美国作家短篇小说集，基本上美国作家写得好的几个短篇小说都在上面，包括《伤心咖啡馆之歌》等，那一本书，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国内的作家我喜欢的不多，当然

也看过一些,比如汪曾祺的,感觉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不能学那个,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它像一种小品一样,靠白描,我希望写那种西方文学式的,能够深入很深的意识里面去。后来还喜欢卡尔维诺,包括那些拉美作家。在创作上,当然也会去做一些模仿,但是我觉得印象也不是很深,好像最早写小说的时候是模仿过,比如海明威那种风格,硬汉的、简洁的等等,然后慢慢就开始自己琢磨怎么写。完全模仿,好像我是没有模仿过。你说从哪部作品开始我觉得写得好了,这个从来没有想过,反正就一直一路写下来吧。我发现,写了一段时间短篇之后,我就开始写中篇,当时觉得短篇小说的容量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出国前写了三个中篇,也不算少了。后来出国以后大部分写的是中篇,短篇写得很少,中篇就写得比较顺手,一个3万至4万字。后来就开始有一些长篇。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除了个别的,总是要有长篇,把你自己的想法,对整个世界的想法表达出来,一个中篇还是不够容纳的。关于写作的瓶颈呢,基本上没什么瓶颈,一直觉得有东西可以写,不过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声音,说陈河只会写阿尔巴尼亚的东西。后来我就给自己提醒,你不能老是写自己那种海外的经历,就像当年那些知青作家一样,把自己知青生活写完以后他再也写不出新的东西了,所以必须要开拓写作的新领域。假如人们认为你是一个靠经历吃饭的小说家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想说的所谓的瓶颈问题。

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郑润良:您说在被绑架时想到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后来移民到加拿大,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重新开始创作。第一部作品《被绑架者说》在2006年的《当代》发出,后来一发不可收。作为您重新回归文坛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您能不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有哪些艺术与思想方面的思考?在这部作品中如何处理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

陈河:到了加拿大以后,慢慢开始稳定下来。在加拿大,毕竟有那么多华人,有一个语言环境,包括一些熟悉的人,他们也在搞写作,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有条件写作了。重新再写,刚开始也感觉很难,后来想了想,就想把被绑架的这段经历写出来。我当时想,写成一个非虚构,可以把整个在阿尔巴尼亚的事情都写出来,当时我定的题目叫作《走出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我对写阿尔巴尼亚那么有信心呢?因为阿尔巴尼亚当时跟中国有一段特别特殊的关系、特别友好的关系,就是说在我们那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对阿尔巴尼亚非常熟悉,而且看了很多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对阿尔巴尼亚都有一个集体记忆,有这么一个情结,说起阿尔巴尼亚的事情特别亲切,我借用了这个集体的记忆,觉得假如我把阿尔巴尼亚写好了就会有人看。就把我自己怎么从开始到阿尔巴尼亚,从阿尔巴尼亚开始怎么做生意的整个过程写下来。我有一个好处,虽然是写非虚构,但我是一个写过小说的人,而且读过那么多的西方小说,有过基础的小说训练,在非虚构的写实基础上,又用了一些小说的笔法。里面还讲到阿尔巴尼亚的动乱,应该说是非常好看的。当时写好以后呢,本来是想给《收获》,结果呢,给了《当代》。当时温州的几个作家,在写作上都已经成熟了,钟求是、王手、哲贵、东君,都很有名,包括吴玄,当时是在《当代》当编辑。特别是林斤澜,对温州作家有一种召唤作用。有一次林斤澜过生日,他们都跑到北京去给林斤澜做寿。因为我的稿子让程绍国帮我看一下,结果他一去北京碰到那个吴玄,把这个稿子就给了吴玄。吴玄看了感觉很好就给我发了,还帮我把小说改名为《被绑架者说》。结果出来以后,很多人喜欢,好像他们当年还把这个小说推荐参加鲁迅文学奖,这当然是不可能中奖的,不过也说明他们很喜欢这个稿子。还有一个事情,麦家也喜欢这个作品。2006年的时候,麦家名气还不是很大,电视剧还没出来,但是他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年轻作家,那本《解密》已经出来了。他特别喜欢这个作品,从《当代》那边要了我的邮箱,给我发了个邮件。他说我是麦家,可能你不知道我,不要紧,你这个稿子写得很好。反正表扬了我一通。后来我就写了第二个中篇《女孩和三文鱼》,想给《收获》,但是没有门路。我就问麦家能不

能帮帮忙,把我这个稿子给《收获》一下。他说,哎呀,这个有点为难,说自己在《收获》发表都要投好几次,很难呢!他说,让我试一下。后来他就把我这个稿子给了《收获》编辑王彪,他跟王彪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作者,写得不错。王彪一看说,什么新作者,他是老作家了。他说,我80年代的时候,在《东海》就编过他的稿子,当时在浙江还是有点小名气。王彪看了稿子觉得不错,给了主编李小林,李小林对这个稿子很喜欢,但她觉得这稿子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里面写到一些真实的事情。她给我出了很多主意,非常用心地,把我这个稿子修改好之后,再在《收获》发表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郑润良:十余年来,您基本做到每年出一部长篇或中短篇小说集,笔耕不辍,获奖无数。您记得您第一部获奖作品是什么吗?您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陈河:你说我这十来年,基本上每年出一本书,或者是一个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中断过,这个一点没错,我确实算非常勤奋的吧。有些人可能是一段时期勤奋,我基本上从2006年开始重新发表作品,几乎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面。因为本身就是从小就开始喜欢写作,当时在温州的时候是业余写作,条件也不好,出国后更是中断了很长一段时期,我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已经40多岁,所以说特别珍惜时间。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专业作家。国内有体制保障,专业作家有工资,我们就是靠自己养活自己。当然写作是一个非常苦的事情,如果把写作作为一种娱乐,一种很开心的那种写作,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写作真正写到最后,就让你觉得非常苦,那才是一个专业作家的状态。我看马尔克斯也说过,他说到年纪大了以后,越来越觉得写作是一种苦役。村上春树也经常倾诉说每天长跑跑得很辛苦,但是为了自己的写作,为了自己的身体,他必须去长跑。他觉得自己能作为一个专业的作家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人家那么辛苦去挣钱吃饭,你在家写小说就能挣钱,所以说要珍惜。至于你说的第一部获奖作品,第一个奖应该是“咖啡馆短篇小说奖”,但是真正让我觉得意义特别重大的应该是“郁达夫小说奖”,这个特别不容易。

评论家对海外作家会比较忽略一点

郑润良:您觉得自己的作品都得到应有的认可了吗?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您觉得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陈河:关于感觉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哪一部作品觉得没有得到太大的关注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因为现在我写的作品基本上都能够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这一类国家最前沿的几家刊物上,而且都有很多的转载,每本书都能够有出版社给出版,十月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啊,都是顶尖的出版社,所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荣幸。当然,国内的一些体制内或者一些评论家对我们这些海外人士会比较忽略一点,这也不奇怪吧。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已经有那么多刊物能够发表你的东西,有出版社能出版你的书,那些能去看《收获》《当代》的读者,基本上都是最认真的文学读者,你需要的一些读者已经在看你的作品,所以说,有没有人家给你什么宣传、给你什么奖,我觉得并不重要。说到哪一部作品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我就觉得我有一本书叫作《米罗山营地》被关注不够。这本书,说实话我花了不少心思,它写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游击队,当时日本侵略马来西亚的时候,英国军队全部跑掉了,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担起了抗日的这个重任。后来英国人回来了,他们和英国人合作抗日,而且提到里面一个当地的华人医生,参加抗日结果被日本人抓去,被打残废,最后死掉了,那个人是得到英国乔治勋章的,非常了不起。这本书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到马来西亚去找第一手的资料,是非虚构类,里边写的那些故事也非常好看,特别是它的历史意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去看的。当时那本书出来以后命运也不是很好,本来《人民文学》编好了,好像马上下厂了,突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我那个小说被撤了下来,最后是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然后书也出版了,是在天津出版。当年我也看到一些推荐,把这本书作为类似政治教材推荐。我觉得海外华人抗日那段经历确实国内的人不怎么知道,以前知道共产党抗日,后来知道国民党抗日,然后呢,知道有远征军这类的故事,但是他们不大知道在南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在抗日。我觉得非常

可惜,希望以后在图书馆里还能保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

郑润良:我感觉,迄今为止您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三类题材,一类是当代中国人的海外传奇经历,比如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在暗夜中欢笑》,中篇小说《黑白电影的城市》《去斯可比的路》《义乌之囚》等;另外一类是东南亚抗日题材小说,比如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短篇《怡保之夜》等。第三类是其他历史题材作品,比如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中篇小说《天空之镜》等。您认可我的这种划分吗?

陈河:你说的三类题材我是同意的,但是还有一个,也就是说,关于温州的故乡这种题材,我也是有一些作品,比方说《夜巡》,写的就是温州的一些往事。包括《布偶》,最早是一个短篇,后来变成一个长篇,实际上写的也是一些温州的事情。目前来看,我有可能接下来会写更多的一些有关温州的小说。最近刚刚写成一个中篇,写温州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可能还有长篇。毕竟这个故乡的记忆,在一个作家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分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写完,还可以写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

郑润良:发表于《收获》长篇专号 2007 秋冬卷的《致命的远行》应该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为什么想要创作这部作品呢?

陈河:在《收获》2007 年长篇专号发表的《致命的远行》,是我的第一个长篇作品。现在想想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 2006 年才发第一个中篇《被绑架者说》,2007 年就把这个小说写成发出来了,并且是 20 多万字,确实说明当时是非常拼命在写小说。为什么当时要写这个小说呢?因为我当时有一种职业精神,觉得我现在要写就要写好的,要写就写出一些大的作品,一些正儿八经的作品。写这个作品也是因为确实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邻居,我在温州时住在地委机关的一个院子里面,这里面有一些专员,相当于市长、市委书记,那时温州的一些大官都住在那里,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父亲就是“文革”时候自杀的,这个女孩居然也出国了。

当时一些温州人出国比较多,但作为他们那种“红二代”出国就蛮奇怪的,结果呢,出去以后不久又死了,就是自杀或者什么事故。有意思的是,她的一个前夫,已经离婚了,是温州本地的一个驾驶员,他后来去了法国帮她料理后事,因为她没有什么亲戚了。结果她前夫在法国留了下来,后来听说在那边混得还不错,赚了很多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风云人物。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在阿尔巴尼亚待了很长时间,有欧洲的经验,我还去过法国,可以把一些事情串起来,结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这个故事。当时我特别忙,还在做生意,居然把这个作品给写成了。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北京的一些朋友把我这部作品推荐给一个歌手,他的老婆是一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她是在企鹅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看了后觉得这本书好,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意大利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觉得这本书不错,后来就定下来买了这本书的全球版权。后来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语,2018 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出版。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意大利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后来他们给我看了很多意大利的主流的一些报纸,有很多的评论反响。他们还请我去了一次西西里,一个什么文化节参加活动,西西里市长还给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和证书。这本书,后来他们卖版权给法国巴黎一家非常有名的有百年历史的大的出版社,请了一位汉学家翻译好了,本来是去年就要出版的,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停下来了。出版的时候,他们说会邀请我去巴黎参加书的首发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王安忆推了我一把

郑润良:《黑白电影的城市》这部中篇被多个选刊转载,还获得 2010 年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地方?在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这部作品对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这个中篇,算是我第一个获大奖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是这样,当时在阿尔巴尼亚,我去了一个小城市,坐车要坐很长时间,那个城市我一去就感觉特别漂亮,它是一个石头城,当时给我的冲击

力非常大。那个城名字叫吉罗卡斯特，这个城市给我印象特别深。最有意思的是，中国有部电影叫《宁死不屈》，里面的故事就发生在吉罗卡斯特。电影里那个人物叫米拉，米拉非常漂亮，是我们少年时候的一个偶像。所以我是把那个集体的记忆，就是当年我们中国人对《宁死不屈》那个电影的记忆，加上我到阿尔巴尼亚的亲身经历，都写进了这个小说。像美国大片一样，它所有的元素都在里面，这个小说可能是我最好看的一个小说，当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后来得了“郁达夫小说奖”，这个真的不容易。要知道，我当时还没什么名气，我重新写作也就两三年时间，国内那么多的作家、那么多的手腕，而且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奖金是非常高的，中篇小说奖是10万元人民币，短篇小说奖是5万元人民币，结果没想到我获奖了。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当时评奖的时候，除了袁敏，也就是《江南》的主编喜欢这个作品，最难得的是王安忆，她也喜欢这个作品，她把我这个推上去了。王安忆推了我以后，后来慢慢地，票就集中到我身上去。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外作家，居然在这么一次当时非常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上拿到了一个大奖。我觉得现在都不太可能，在海外的而且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会拿到大奖，不再可能像我那个时候那么走运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也特别感激王安忆。这个奖对我意义还是很大的，而且当年和我一起拿奖的，短篇小说奖是给了铁凝，所以相当于把这个奖的分量就更加重了。有那个奖以后，发表作品就更容易些。

郑润良：2009年您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在《人民文学》发表，为什么想要创作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您对这个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有什么格外的思考？

陈河：写这个小说是因为受到一次电视节目的启发。加拿大每年年底都有一个国殇日，也就是老兵纪念日。有一次，我看电视时看到报道温哥华的一个老兵，是华裔，80多岁了，他说他年轻时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在二战时参加了英国军队到东南亚沙捞越那里抗日。这样回来以后就可以变成加拿大国籍。我觉得这故事很有意思，后来我就找了很多资料，最后写成了小说，里面有马来

西亚华人抗日，也有东南亚的异国风光，很有意思，我给了《人民文学》的李敬泽。李敬泽觉得这个小说不错，准备发。当时我把这个小说也给了好朋友须一瓜，她看了说，你这个作品写成中篇可惜了，完全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长篇。她这么一说，我就通了。我就和李敬泽说，你先不要发，给我一点时间，我再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写成一个长篇。李敬泽说那好吧，你试一下写写看，不要写得太长，十万字以内差不多。后来就写成长篇在《人民文学》发了，当时是和陈谦、张惠雯等一起作为海外华人专辑发出来的。这个作品是虚构的，当时我还没去过马来西亚。十多年后我才去了马来西亚，去了我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地方。我后来的一个作品《米罗山营地》，那个倒是完全非虚构的。

郑润良：中篇小说《去斯可比的路》情节曲折又意味深长，这部作品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陈河：对于《去斯可比的路》这个小说，我也有特别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小说感情非常真挚，很自然地写了一些故事。小说中的那个女孩子从罗马到阿尔巴尼亚，她老公把她关起来，她自己又跑出来，从窗户上跳下来。那些细节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现在是很难写出来的。小说里还写到那个小孙，本来是去避难，结果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孩子，就变成一夜情。但是我写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把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优美，很有人性。这个小说发表在《十月》上，很奇怪，我发表在《十月》的几个作品都觉得特别满意。我出的第二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用《去斯可比的路》作为小说集的名字。

我小说中的故事大部分是真实的

郑润良：长篇小说《布偶》发表于2010年的《人民文学》，被《当代长篇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0年长篇小说排行榜。但关于这部作品的相关评论好像不是很多。这部作品，您个人满意吗？

陈河：《布偶》这个小说，我大概20世纪80年代已经写过一篇短篇。那是个很不错的短篇，后来有一回，好像是2008年，那次去北京，我去看林斤澜先生最后一面，

他居然还记得《布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林斤澜先生怎么还记得我这个小说。这个小说后边的故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个教堂工厂我曾在里面当过工人。这些记忆浮上来,终于后来有一天开窍了,把它写成一个长篇,后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应该说一个长篇,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算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小说后来发表以后,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他们也说这本书出了以后好像觉得影响不太大,觉得没做好这本书。但是我感觉也没什么吧,因为说实话,国内那些评论家,和我的交集不多,所以评得少也正常。

郑润良:短篇小说《怡保之夜》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这部作品很有一种惊悚之美,带有哥特式风格。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基于历史史实塑造的吗?

陈河:就像你说的,这个作品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提名。当时是十进五,就是二选一吧,我当时以为这个肯定是有希望的,没想到最后居然是零票。小说中的事情大部分是真实的。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住在怡保,当地的那些人,也是我到了那边才认识。他们很好,知道我写了一个《沙捞越战事》,知道我来了解华人游击队的事情,那天晚上就带我去吃饭。那个地方吃饭很简单,就在小摊子吃牛肉汤,就像我小说里面写的那些老人开的店。但是那个故事跟这个小店是没有关系的。我在那边了解资料的时候,查到一个蒙面人的故事。当时日本人到那边,半夜三更把所有的华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叫一个蒙面人上来,指认抗日分子,有这么一个人在当时看到了那个蒙面人的真面目,等战后蒙面人从日本回来后,就把蒙面人抓住了。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当然我套用了一些小说手法,把它和牛肉店的那个事情链接起来。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偶然的機會产生的,因为当时我获得了“郁达夫小说奖”,《江南》杂志就要我给他们写个小说。但是我当时想来想去,写不出东西来。突然有一天,突然想通了,觉得这个可以写,很快两三天时间就写完了。这个小说我个人觉得挺满意的,因为它里面有个好故事,而且有一种特别的气氛在里边,你能够注意到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还有人欣赏这个小说,谢谢啊!

郑润良:2012年,你创作了长篇小说《米罗山营地》。

同为战争题材作品,《米罗山营地》与你之前创作的《沙捞越战事》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的追求吗?还是只是题材的转换?

陈河:《米罗山营地》这本书是有点被忽视的,因为它讲的是华人在外边抗日的历史,而且里面写到很多真实的抗日英雄,都是为我们中国抗日的这个大事情做出过贡献和牺牲,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对他们基本不知道,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所以说我写了这本书,我是想尽量让国内的人多知道一点。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还把这些题材写成比较短小一点的文章,在《北京日报》的一个专栏发了。当时中央电视台也看到了,想拍一个纪录片什么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拍成。《沙捞越战事》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作品,我可以把所有的一些民俗方面的东西写进去,但《米罗山营地》不一样,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我参考了大量的书,包括136部队怎么坐潜艇潜入马来西亚,完全是个非常精彩的谍战故事,非常有戏剧性。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作品,可以相互对照,一个是虚构的小说,另外一个是非虚构的调查。我觉得这两本书留下来应该是有意义的,作为海外华人抗日历史的记录有它的意义,马来西亚那边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

郑润良:2016年你的新长篇《甲骨时光》在《江南》发表。为什么会突然转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题材领域?

陈河:《甲骨时光》的诞生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機會,去了河南殷墟安阳,突然很有感触,后来就开始研究这个资料。这个书所花的时间是最多的,从那些大部头著作读起,陈梦家的书,还有一些日本专家的书,像长城砖那么厚的,一直看下来。有人说我为了写这本书,几乎是写一个博士论文的阅读量的。而且这个书,我确实觉得对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是以《我的名字叫红》《达芬奇密码》等作品为标杆的。《我的名字叫红》写的是细密画,是土耳其一个传统的東西,但是我要写的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甲骨文,文化底蕴更厚重一些。《达芬奇密码》是利用了宗教《圣经》的文化背景写成的,当然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我写的这个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里面,也挺好。这部作品在《江南》上发表,后来是在十月文艺出

版。十月文艺的韩敬群总编也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花了很多的资源来推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印刷设计做得都非常好。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说可以算是我的招牌一样的小说。虽然我刚才说了我最好的小说是《布偶》，但是《甲骨时光》这本书有它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把中国甲骨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这么高深的东西写成一个故事。而且，我这个故事写得完全是有历史依据的，不像以前那些瞎编的电视剧。这本书写好以后，当时编辑把它送到故宫博物院，去鉴定一下。因为写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東西，想尽量少出一些纰漏。结果故宫里面一位甲骨文专家看过以后，评价非常高，说书里面写的每一个甲片上面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有依据的。她说，这个太不容易，关于甲骨文的著作成千上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它写成一个小说。所以《甲骨时光》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但是我不因为这个历史题材以后就停留在这边，我进去以后又马上能出来，写另外一些东西。

这一代身上的“世界革命”情结

郑润良：中篇小说《义乌之囚》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小说中的查理和弟弟是属于同一类人吗？查理身上有一种“世界革命”情结，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共性吗？您个人如何看待这种情结？

陈河：《义乌之囚》确实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小说，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很多义乌的经验，没有像我这样对义乌那么熟悉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个小说我很早就想写了，之前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有一个温州的小伙子，原来在意大利，后来到阿尔巴尼亚做生意，但生意做得不成功，他弟弟在义乌给人家杀死了，这个事情都是真的。后来我到了加拿大以后，自己也经常去义乌了，确实碰到一个因为欠了钱给那边关起来的，一个面色苍白的男的。但是这个小说要写什么呢？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了查理这个人物，一个“世界革命”的幻想者。当时贺绍俊老师就那一年的中篇小说的点评，他就说，今年印象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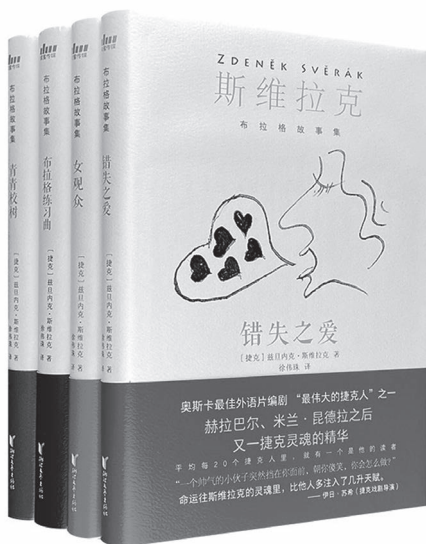
深的小说就是这个《义乌之囚》，后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很少有一些大牌的评论家来写我的评论，这好像就是唯一的一篇。说到我小说中的“世界革命”情结，确实是有，因为我们那一代人，还有更早的一批人，确实有一种“世界革命”情结。后来我写的《外苏河之战》，那几个小伙子跑到越南去学参战，后来给打死了，那也是真实的。还有很多人去了金三角，从云南那边过去。所以说当时人们的这种“世界革命”情结，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人确实比较单纯，比较容易头脑发热，但是他们身上那种理想主义精神我觉得很值得怀念。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好像完全没有这种情结，没有这种献身精神。我觉得一个民族还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精神。

郑润良：您的作品通常既有深刻的寓意，又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您觉得一篇小说好看重要吗？如何在追求小说好看的同时不损失它内在的严肃性？

陈河：关于作品深刻的寓意与阅读的快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小说写得好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小说有它的娱乐性，人家读者花钱买书买杂志总是要有一点享受，假如说那些故事写得很不好看，你就会觉得亏待人家。但是这个好看并不是说靠那种噱头，靠一种什么胡编乱造的戏剧性，它要有内在的一种好看，能够让读者读了以后觉得花时间花钱看这种书是物有所值的。这个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职业标准。假如说你写一个长篇，就得让你自己像个导游一样，带着一群人在走，即使有一段路可能会走得比较无聊、比较枯燥，但是到了一定高度以后，马上要有豁然开朗感，把景色展示开来，应该让读者觉得，哎呀，这个风景好看，我刚才跑了那段路是值得的。这是我的一个策略。小说好看与它的内涵并不是矛盾的，做得好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可以给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稍微一般一点的读者，他至少能够看看表面上，感觉这种故事也蛮好看；假如说更好一些、高级一点的读者，他能够看出小说里边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或者说哲学的意义。我尽量在作品中发掘一些人内心的意识，面对终极的一些问题，我尽量想做到这一点。■

短篇小说重塑固有世界

Article- 艾 伟 Ai Wei



《布拉格故事集》书影

在来秦皇岛的路上我带了一本书，是捷克作家斯维拉克的《布拉格故事集》，其中有一个短篇《伯利恒之光》，以前看过，印象特别深，所以路上又看了一遍。第一部分是这样的：下雪了，有一个男孩在工厂里看到雪像电视上的芭蕾舞演员一样，试图在天空当中停留。他对自己的观察很得意，觉得如果把这个观察告诉爸爸，爸爸一定会表扬他。这里其实在暗示，这个男孩心智不成熟，他作为一个工人，还在期待父亲表扬。接下来他看到爸爸戴着一顶帽子在厂外的雪中等他，接他回去。圣诞节快来了，男孩说：“我15岁之前相信有圣诞老人，15岁之后我知道没有圣诞老人，但爸爸说耶稣是存在的，圣诞老人不存在。”回

家的路上，孩子说想要一顶和爸爸一模一样的帽子，爸爸领着他去买帽子，帽子买了之后他又想买一只手机。父亲觉得儿子要手机没有用，儿子其实没人需要打电话。他们家生活已经十分窘迫，也掏不出这个钱买一部手机。父亲在糖果厂工作，糖果厂有可能面临倒闭。母亲原本在邮局上班，可邮局现在也已经倒闭了，母亲已经失业成了家庭主妇。

第二部分很有意思，圣诞节要到了，孩子下班回家，父亲不在。他记得父亲在他上班前说过，今天有大事要干。孩子前去洗澡。边洗澡边想，他爱父亲但他更爱妈妈，因为妈妈会给他洗澡，洗澡之前她会浴巾放在暖气片上，等他洗完澡妈妈就用浴巾把他的身体捂

住，很温暖。洗完澡后，儿子坐到客厅，发现客厅里面有一支点亮的蜡烛。他想起父亲以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凡是看到火，如果没人看护，一定要把它吹灭掉，否则要引起火灾。他就立即把蜡烛给吹灭了。母亲一看到这个场景吓坏了，让儿子赶快重新点上，反复叮嘱这件事千万不能跟父亲说。后来一家人吃饭，父亲说这蜡烛的光是从伯利恒来的，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童子军一站一站通过火车把伯利恒的火种接送过来，蜡烛上的火是父亲在火车站排了一天的队才接到的。

这时候男孩感到嗓子发痒，觉得自己要说出来了。他曾经犯错了把蜡烛吹灭过，他要努力遏制住说出来的冲动，他第一次终于把一句话咽了下去，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就是对“傻瓜”的描述之准确，傻瓜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小说第一部分父亲买了帽子后，带儿子去医院，医生给儿子开药时，儿子对医生说：“医生，你有口臭。”父亲很生气，训斥儿子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医生只是笑一笑，还回应道，也许他说的是事实。这之后父亲岔开了话题，说儿子现在不尿床了。这些细节都很好。前天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张清华说叶兆言小说中经常出现尿床的细节，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尿床的细节，他说这其实可以写成一篇文章，细致分析的。

这个世界似乎天然存在固定不变的秩序。我们对这个世界因此产生了一些固定不变的看法。比如审美。我们似乎天然知道谁是漂亮的，谁长得不好看。这种判断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千百年来都是固定的吗？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关于美的判断中我们已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并不能说不好。深究起来我们习以为常接受的那一套法则，那一套审美的观念，其实是带着西方的目光的。比如如果我们问上帝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头脑中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白人的形象？当然标准的答案是“上帝是无形的”，但是我们脑子里还是会有一个标准的形象。这个标准类型又来自于哪里呢？可能来自于米开朗基罗等人所塑造的形象。米开朗基罗时期的一大批雕塑，创造了一大批古希腊神像，众神的身材符合所谓的“黄金比例”——一种类似数学或几何学意义上的美，由此确定了人体的美的模板。又比如我们对外星人的想

象，基本都是比较丑陋的，这说明我们对外星人在内心深处是有敌意的。

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旧时代的三寸金莲被认为是美的，现在回头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图片上看三寸金莲皱巴巴的，没有美感，但在过去被中国男人认为是美的，性感的。所以美其实是可以塑造的，是一个观念，一直有变迁，这些变迁可能我们自己都没发现，当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一部分。

小说家喜欢写“傻瓜”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第一，“傻瓜”取消了观念；第二，“傻瓜”对世界可以重新命名。小说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发现、重新命名。在《伯利恒之光》这个短篇中，我们去看就能发现，有很多关于词语、关于器物的重新命名。比如他们家的沙发，男孩把家里的沙发说成是一个竖琴，因为坐下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这就是一个傻瓜对沙发的重新命名，也符合他的思维逻辑。卡尔维诺说，小说其实存在诸多原型，比如“弑父”原型，比如“爬灰”原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原型，就是《皇帝的新装》。在这个故事里，即便所有人发现皇帝赤身裸体不对劲，但如果没有那个孩子，久而久之所有人便会把这种不对劲视为习以为常，成为固定不变的存在，人们都觉得皇帝看似没穿衣服的状态是天然如此的。但因为有了那个孩子，才使得这一切变得荒谬。

卡尔维诺写过一篇极短的小说叫《闪灵》，写一个人走在街上，突然开始恍惚，他怀疑难道我们的政府大楼、美术馆、交通灯、海报这一切天然如此吗？我们的人间秩序天然如此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关于小说或者说短篇小说的一个天问。我们需要对那个日益固化的世界、生活、观念有穿透性的理解和叙述。通过小说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发现和命名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另类知识。我想这至少是短篇小说的责任之一。█

来自太平洋深处的迷人气息

Article— 雷 默 Lei Mou

《水手》最早的章节写于2016年，但我不好意思说这部长篇耗费了七年时间。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写一阵、歇一阵，因为工作和生活，也没有大块的时间，主要原因还是懒。中间我开过一个作品讨论会，选了一些自己的中短篇供专家老师阅读，其中包含了《深蓝》和《安息日》，这两篇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许，有的老师认为这是一组姊妹篇，并从我那些中短篇里概括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死亡主题，一个是海洋主题。我暗自欢喜，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要写的是部长篇。这期间，则臣跟我说海洋是个好题材，值得好好写。毫无疑问，他作为同行，有敏锐的创作嗅觉。

直到2021年，我才有了把《水手》写完的决心。2021年元旦到来的前一天，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去了老主编家，陪他过个生日。老主编的生日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我到杂志社工作也快十年，年年如此，这逐渐成了单位的惯例，也是一个小单位迎接新年的独特方式。像某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给老主编过完生日，新年就快来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有种莫名的喜悦。

大概十多年前，老主编突发中风，一直行动不便，这些年，虽然阿姨照顾得耐心有加，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主编的衰老是能看出来的。记得八十岁的那个生日，老主编兴致高昂，他乐呵呵地跟我们说，即使现在过世，他也可以说享年八十了。说这话应该是在前一年，而2021年元旦前一天，他刚从康复医院出院，阿姨说住了好长时间，最近才有些好转。那天我们去看望他，他很开心，还拄着拐杖，走了几步给我们看看。相比于上一次看到他，这次他的听力衰退得厉害，几乎听不到我们在讲什么，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我们在一旁热烈地聊着天，他却并不清楚我们在聊什么，他想到一出，就突然问我们一句。我记得他问我：雷默，你觉得李老师能活几岁？之后，他忽然又问我们：现在某某人（以前是老主编的同事，之前已经过世）的股票怎么样了？我们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不由感慨，疾病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想想老主编突然中风，虽然恢复了一些，但已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恍惚间，有了一种强烈的生命危机感。我想这也是中年危机的一

种，会意识到生命和命运的不可捉摸，有那种“有今天没明天”的危机意识。而那次我们看望了老主编后，晚上，他就走了。

而在那一年的五月，我眼睛动了一次手术，手术结果并不太成功。因为我的眼睛有家族性遗传，在一次偶然的检查中，B超医生告诉我，得好好检查一下眼底，可能有渗出的危险。她给我打了个比方，说我的视网膜有一处缺口，类似于一件衣服的线口脱开了。于是我去做了眼底造影，发现自己的视神经确实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正常的视神经都呈树根状分布，我的视神经像柳枝，都是直的。那眼底照片像黑夜中的闪电，看得人心惊肉跳。于是仓促间下了决心做手术，那是一次至今难忘的手术，激光打完后，我来到走廊上，看到外面的颜色全部失真了，树冠是紫色的，迎面而来的人是黄色的，而所有见到的东西都镶了一层金边，看上去每个人都熠熠发光。

我父母、姐姐从小就喊我“木坨”，那是我老家那一带人比较普遍的绰号，形容人有傻气，也有胆魄。之后我又顺带做了个矫正手术，那次手术疼得我龇牙咧嘴，像孙悟空被戴上了紧箍咒，每一次拉扯，都让脑袋疼得撕心裂肺。从手术台上下来，主刀医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擦汗，因为手术服全部被汗水浸透了。连续两次手术，我体重掉了十多斤，关键是出院后，我发现自己的视力下降得厉害，第一天回到单位，打开一本书，发现那上面都是模糊不清的蚂蚁，我摘下眼镜，把书凑到近前，也没能看清那些字。我在心里暗暗叫苦，这下完蛋了！以后要成瞎子了。之后，我跑了两趟上海，去了两家眼科比较好的医院，找了当时的眼科专家，他们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激光还是要打的，不然以后视网膜脱落就真的成瞎子了，但激光打了以后，造成了黄斑前膜内卷，相当于我看东西对焦发生了偏移。两位眼科专家都很耐心，一位专家告诉我，可以再动一次手术，把黄斑前膜剥了，那就恢复正常了，但手术有风险，可能剥前膜的时候，把视网膜也带下来。如果不动手术，再恢复三个月看看，应该能恢复一些，虽然视力不如从前，但手术的风险可以避免，等于牺牲一些视力。另一位专家告诉我，让我耐心再等等，过三五个月如果还是老样子，再去找他。之后，我发现确实如他们所说，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到后来，我竟然又

能看到字了。

也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又因为一次失误，患上了爆发性心肌炎，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每天体温都冲破四十摄氏度。出院后，很多人告诉我，你真是万幸，能捡回一条命。我这才去查了心肌炎的资料，发现它的死亡率确实有点高，能从中全身而退，实属死里逃生。

那一年的下半年，我从一堆意外中缓过神来，想想有空是得写点东西了，而碰巧那段时间，马兵兄问我有没有长篇在写。我说有一个，但没写完。马兵兄说能不能初稿出来了，到时候给他先看看，于是爽快地约定了时间，我开始霍霍磨刀。

说实话，经历了身体的一系列变故，那段时间写作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我铁了心要把这部长篇写出来，于是一边找状态，一边继续书写，好在禁足，哪儿也去不了，就坐板凳功夫。《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为了逃离家庭的管束，踏上了远洋渔轮的漫漫征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茫茫的太平洋深处，他目睹和经历了各种险象环生的恶劣海况，不平凡的海上生活使一个懵懂莽撞的少年蜕变为了一名合格的水手。这可能是一部少年的成长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自我蜕变的一次尝试。我确实很喜欢马尔克斯、海明威和康拉德的经典大海，而我也意识到我们对海洋的书写，不能说集体缺位，但至少是不够的。从一开始，我想到过，对于一个写惯了中短篇的人，写长篇肯定是一种挑战，我曾试图用不同的颜色来结构这部长篇，而来自太平洋深处的迷人气息确实一直萦绕在我周围，这是一种神秘莫测又令人心驰神往的氛围。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不少时刻，我和那个少年是心意相通的，我心疼他，我能感受到他要命的疲惫，也能感受到他如释重负后的欢欣。

写完之后，我确实意识到长篇有更难的东西，不光是结构，还得有充沛的元气，不仅需要有好故事，还得有复杂而错综的人物关系。我把小说投给了《当代》，两位责编阅读之后，和我多次探讨，小说又进行了多轮修改。我很庆幸遇上了他们，一个是有长篇创作经验的作家，一个是经验丰富的编辑家，他们给我的意见都弥足珍贵，让这部长篇最终以相对完善的形式呈现。这既是阶段性的创作总结，也为以后的尝试摸清了一点方向。█

长夜将至

Article— 章雨恬 Zhang Yutian

去年一月，我回老家完成毕业论文。那时候疫情刚刚放开，为了降低感染的概率，我很少出门，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很小的空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论文，饿了就去厨房里煮点饺子吃。活动范围缩小、表达机会减少、生活内容单调，说实话，日子过得有些乏味。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我把手机里卸载许久的“狼人杀”软件重新下载回来，试图从中获取乐趣和慰藉。

这个决定做得非常正确，玩“狼人杀”满足了我喋喋不休的表达欲望，又可以带领我短暂地逃离逼仄的现实。我和我笔下的人物一样，很快就投入其中，游戏入夜前的那句“长夜将至”一响起，我便感觉到一阵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激动。某天，一场游戏结束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为何不就此写一篇小说呢？顺着深想了一下，我脑海中很快就浮现出一座被迷雾笼罩的城堡，外部看起来古老而又神秘，内部却极尽奢华。我以幽灵的身份潜入城堡，看到一群身着华服、佩戴假面的人，游戏里，他们相互厮杀，通过发言辨析谎言与真相，拼尽全力让自己所在

的阵营获取胜利；游戏外，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他们该走向何方？这种欲说还休的朦胧感令我着迷，我决定抓住这一丝写作的可能，于是城堡有了现代性的实体，幽灵幻化成了游戏的外来者于颖。

我在小说中构筑了三重世界——游戏世界、现实世界和导演伯格曼的世界。前两个世界是“与生俱来”的，这篇小说在我脑海里生发之际，这两个世界就自然而然诞生了。游戏世界里，需要编排大量贴合“狼人杀”游戏的台词，但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技术性难度。我从高中开始痴迷“狼人杀”，有数千把网杀对局经验，写作时，我把一些常见的发言套路记录下来，尽可能地讲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除了常规的“狼人杀”，我在小说中还提到了两个游戏：其中一个“故事杀（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由其他人举手判决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这种游戏是否已经存在，但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之所以想到设置这个游戏，是因为我喜欢听故事，有时候听到一些语焉不详的部分，会忍不住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另一个游

戏是“关牌版狼人杀”，灵感源自我小时候玩的扑克牌，只有两个人玩的时候，我们就会保留一部分牌不发，增加互相猜牌的难度，从而提高游戏的不确定性。在真实的“狼人杀”游戏卡牌中，隐狼的牌面和我描述得并不一致，仅只是一个具有狼人身影的村民形象，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镜子这一元素的有无。博尔赫斯在《镜子与面具》中提到了镜子、面具和匕首这三种意象。镜子的存在是为了剥离技巧与矫饰，面具像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伪装，好像只有勘破一切之后，才需要匕首来战胜人生永恒的虚无。

小说中的现实世界，我怀着一种混沌感来写作。在撰写小说的开头时，我只确定了女主角名为于颖，身份是一个在杭工作、毕业于北京高校的女研究生。胡嘉阳、黄雁南和文野的形象都很模糊，许青、许白和卡朋连名字都没有定下来。我通过于颖的目光，一步步地熟悉这些人物，了解他们各自的故事，看着他们自由生长成他们本应长成的模样。写到卡朋杀害了父亲，于颖和文野双双出轨等情节，我自己也被震惊了一下——原来这些人背后还隐藏着这些事！但仔细想想，这和玩“狼人杀”有点像。游戏中没有绝对的高配和低配，相互欺骗、被对方所骗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生活本身如此，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导演伯格曼的世界，是我最后完成的部分。在此之前，我搜索了很多关于“狼人杀”历史的资料，可惜的是，寻找到的内容有限，很难形成一个故事主体。那时候，我已经将第一声部的内容梳理完毕，独立来看，那几乎称得上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总觉得离我最初的构想还有差距，所以一直没有放弃第二声部的写作。大概是在去年四月份，我偶然间读到了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魔灯：英格玛·伯格曼自传》，立刻就被他提到的诸多童年回忆吸引。我决定删除已经写好的内容，围绕伯格曼的人生经历写作第二声部。在文学领域，多声部写法并不罕见，但我是第一次尝试，刚开始写还有些拘谨，担心被现成的材料束缚了手脚，写到后面自如了许多。

编辑老师问我，最喜欢玩的“狼人杀”角色是什么？我当时的答复是都可以。事实上，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通话结束后，我想了很久，我玩狼人角色的胜率是最高的，我也很享受狼人之间团结作战的感觉，但我心里最希望拿到的角色牌

其实是守卫。不同于开局就打明牌的预言家，不同于可以自证身份的骑士和愚者，也不同于女巫、猎人之类的强神，守卫是弱神，但承担的责任重大。在白天，守卫既不能暴露出过多的夜间信息引起狼队关注，又要通过巧妙的发言躲过抗推；在夜晚，守卫则需要准确判断场上局势，守护狼人最有可能刀死的玩家。一局游戏当中，如果守卫守护出两个及以上的平安夜，就会获得系统授予的称号“奇迹之盾”。在我第一次获得这个称号后，我的游戏角色就一直佩戴着它，从未更换过。我很喜欢守卫和狼人夜间的心理博弈，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有猜测别人想法的时刻，写小说时，作者也需要尽可能地揣摩人物的心理。

写作过程中，我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碰到有趣的灵感、有意思的词句，就会努力将它们延展开来，形成一篇完整的小说，但在投稿的时候，我往往无所适从。我极少将稿子交给朋友点评，也没有参与过改稿会，除了我以外，编辑就是第一读者，所以每一次投稿都是惊心动魄的“被检阅”过程。如果投出去的是我熟悉的题材，我会有更多的把握；如果我在作品中糅合了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元素，或是叙述内容大大超出我的生活经验，我会变得异常焦虑，就像带一个从没出过门的孩子参加集会，我尽可能地将她装扮得好看，如若受到批评，我会感受到做母亲的无力和失败。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好几篇小说都处于封存状态，里头的人物只能同我一个人交流。有时候我看这些小说，会感到抱歉，它们都代表了不同阶段的我，但因为我的怯懦，它们必须忍受孤独。

写完《最后的夜晚》，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把它投到何处。打心底里，我喜欢这篇小说，但我又担心它会因结构、题材等问题不被刊物所接纳，犹犹豫豫到八月底，我才怀揣忐忑之心将它投给《西湖》。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这次投稿失败的话，我就把这篇小说“藏”起来，再也不投稿了，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送审和过审的消息，特别感谢《西湖》杂志。

最难挨的漫漫长夜过去了，内心的斗争和坚守都已结束，小说终于在温暖的黎明曙光中安稳着陆。作为作者，我长吁一口气，感觉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下一个夜晚到来之前，我会有一段积蓄能量的时间，待我准备充足，我会闭上眼睛，翻开那张神秘而古老的卡牌。█

陈祖芬和《现代童话：杭州》

Article- 杨新元 Yang Xinyuan

那是新千年开始吧，我从《浙江日报》记者部调到《钱塘周末》部，分管报纸副刊。

2002年，我们对《钱塘江》副刊进行改版，增加了一个《名家特稿》栏目。

我知道，作为一家省级报纸，要约到全国著名的作家为你撰稿，确实不易。于是，我就主动出击，带了编辑到北京、上海等名家众多的城市上门约稿。我与祖芬也是在那一年认识的。

那时，祖芬还住在北京团结湖。

我一直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相连的。

没有缘分的人，即使常年在同一个办公室待着，也如同陌生人。

而有的人一见面，双方就好似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无话不说，相见恨晚。我与祖芬就是这样，就从那一年开始，祖芬就经常给我们

《浙江日报》副刊供稿。记得我出版散文集《网眼里的目光》（与杨罡合作）时，给祖芬也寄了一本。祖芬不仅认真看了，还一连写了两篇读后感。一篇是《拥有两个天堂的人——读杨新元散文》，刊登在《解放日报》的副刊上。一篇是《多童几年——读杨罡的青春散文》，刊登在《文学报》上。

去年2月17日，我在《钱江晚报》“晚潮”上发过一篇《杭州人陈祖芬》；2月18日，《当代文艺》也发了这篇稿子。

文章内写道：

看到这个标题，有人可能会说，你搞错了。陈祖芬不是杭州人，是上海人。其实，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说陈祖芬是杭州人，是因为她与

杭州的关系太特殊了。

在当代的著名作家里，陈祖芬是一个最亲近杭州、最了解杭州、最喜欢杭州的作家。此话怎讲？

在《现代童话：杭州》一书中，陈祖芬写道：“在杭五个月，回过一次北京。北京人觉得我怎么变了——说话时不看人老看着树。实在是，我在杭州，我的眼睛就爱与树亲密接触，我的相机就爱与树从不同角度对话。不过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照的相片像个绿世界。也得万紫千红吧？于是常常蹲在街上，等，等候一辆红色轿车的出现，也让我那绿天绿地里驰出一派红。”

于是，当西子湖畔浓绿一片，杭州酷暑渐消时节，我收到了陈祖芬寄来的一本厚重的写杭州的书《西湖树语》。

在这本书里，这个以文字优美、思想见长的作家，让我们看到了她那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和摄影功底。“湖，因为树，这样地令人动容；树，因为湖，这样地情意浓浓。杭州比树比花还丰富的，是诗文。如果想把写杭州的诗文数一数，那么不如去数西湖边那花、那草、那树。”

多年前，陈祖芬为写《现代童话：杭州》一书，在杭州一待就是五个月，其间只回过一次北京。

正是在那次历时五个月的采访，陈祖芬跑遍了杭州城区和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

七县区，“我本来是晚睡晚起的。但是在杭州，多晚睡，也常常有一个声音在催我快起：今天有没有太阳？我6点钟一起床就走到窗前，看看这天能不能一早去照几张景？完全不影响上午的采访。我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太阳，我变得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陈祖芬对杭州的爱，这种爱，让她“对于杭城的夏热，经历全过程，感受百分百。令我足资吹牛的是，三十八九度，又是正中午，手握照相机，漫步湖滨路。人人说酷暑，本人不在乎。这个镜头好，美哉西子湖。”陈祖芬说：“爱，可以使人变得很傻，比如喜欢猫在汽车呼呼的街上。”

如果说，陈祖芬的《现代童话：杭州》是一本杭州人文历史书，写杭州的古人、巨人、现代人，名人、仙人、寻常人；那么，《西湖树语》就是一幅幅画西湖美景的画，有国画、油画、水彩画，版画、素描和浮雕，让人感到“没有来过杭州是一种遗憾”。“杭州那国画一样的山水，美得让人心醉让人心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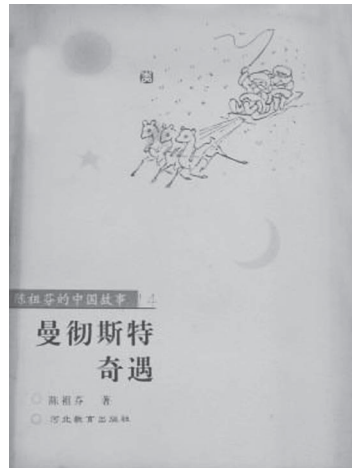
在陈祖芬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杭州一年四季千姿百态的美，有春的旖旎，有夏的炽烈，有秋的韵味，有冬的纯洁，让人真正觉得，“走到西湖边的人便是当了一回神仙”。“从花港漫步踏上杨公堤，一路水光山色，虫声鸣鸣，烟柳翠竹，古道疏影。”“杭州的南山路，搬上画布就是油画。”“人在湖边，与那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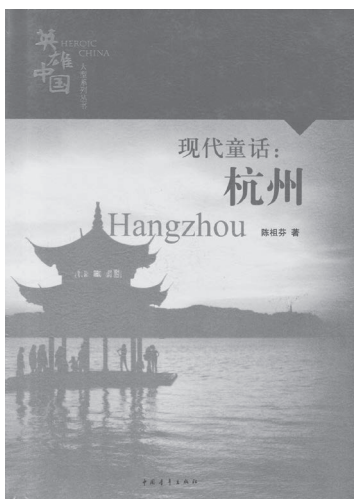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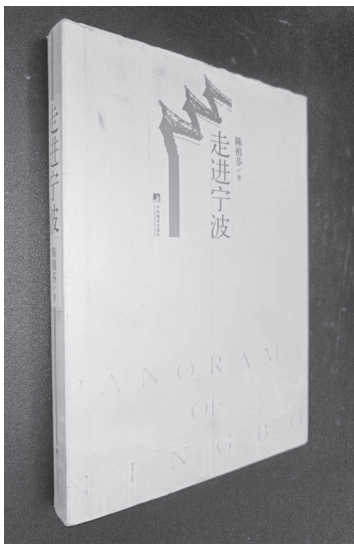
《妈祖文化小故事》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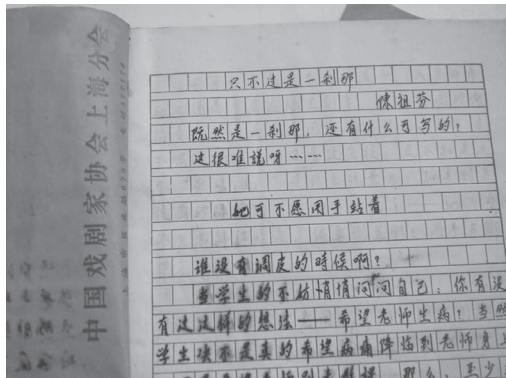
《曼彻斯特奇遇》书影



《现代童话：杭州》书影



《走进宁波》书影



陈祖芬《只不过是一刹那》手稿

那树对话,享受到的,是一种无障碍的视觉语言。”“用眼睛闻一闻,都觉得吸进了多少自然之气。”“杭州,一回头一美景。”

虽然我在杭州已生活了近五十年,但是,仍然被陈祖芬镜头中的西湖美景震撼。因为,许多美景虽然以前看到过,却没有图片传递给我的那种美感和韵味;许多美景是第一次看到,很有新鲜感。

《西湖树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新杭州,一个人间仙境般的新西湖。正如陈祖芬所说:“杭州,山也和谐,水也和谐。山在城里,水在山里,树在水里,城在树里。”“杭州的历史文化只有杭州的自然风景配得上,杭州的自然风景也只有杭州的历史文化配得上。”

陈祖芬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为了写《现代童话：杭州》一书,她在炎炎夏日,奔波在杭州和七县区,采访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杭州的过去、现在、将来做了全面了解。每天白天采访,晚上回到宾馆就整理采访笔记到深夜,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记得,那年最热的几天,我打电话给陈祖芬。电话里,她告诉我正在淳安采访。望望窗外骄阳似火,我想象她在烈日下奔波的情形,要她一定要注意身体,回杭后给我打电话。后来,几次通电话,她不是在下面县里采访,就是临时有事不在杭州。后来,就回到北京了。然后,就向全国的读者捧出了近20万字的《现代童话：杭州》一书。而在写书的时候,陈祖芬一定对再出一本《杭州树语》有了打算,所以,每天拍照不止。这本305页的《杭州树语》图文并茂,中文、英语一体,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杭州、西湖那惊人的美。

陈祖芬说:“苏东坡曾曰‘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从今往后有更多更多的人,中国人,外国人,从此想做杭州人。”我想,这些想做杭州人的中国人、外国人中,一定也包括了陈祖芬本人。

这就是陈祖芬,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才华的作家。像她这样真性情的人,在当今世界上还真找不到几个。■



在美发厅

Article- 李志铭 Li Zhiming

春暖花开美发厅坐落在大虎街上东西方向的拐角处。那天下午，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的老妇，她紧紧地拉着中年男子的手。身着紫色短上衣的迎宾小姐见此迎了上去。

此时，理发厅内的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烫发的，有剪发的，有焗油的，有吹发的，高分贝的摇滚音乐此起彼伏，涂着一幅巨大向日葵的墙上挂着一幅幅男男女女的发型秀照。面对眼前的一切，老人真好像是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乖乖，城里的理发店是这个样子。

老人第一次来到江州。刚才，她在霓虹灯闪烁的店门口迟疑了好一阵子，里面白花的灯光晃得她头晕目眩，她的脚好像陷在

了水田的烂泥里迈不开腿。

那天，儿子说要带她去理发店，她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何必还要去花费那钱呢？儿子苦口婆心，她终于明白了，这城里比不得农村，不能像老家那样可以不顾及自己的邋遢样儿。

小姐把老人引到理发椅前坐下，问老人想喝什么茶，有大麦茶、绿茶、红茶、菊花茶。老人听不清楚，姑娘贴近她耳边大声说，放心，喝茶不要钱。老人紧张的神情开始舒缓了下来。儿子说，就来杯红茶吧。

一会儿，儿子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他对店里嘱咐了几句，来到母亲跟前说，单位有些事要去处理下，去去就回。

好，好，别耽误公家的事。老人连连摆手，催促儿子快去。



落地镜子映照着老人的面孔。老人凑近镜子，仔仔细细地瞅着自己。眼前的老脸饱经风霜，一道道如同稻草般褶皱的沟痕，还有不知什么时候爬上头上的那些杂乱不堪的斑斑白发，哪里还有一点人的模样。老头走得早，辛辛苦苦把一对儿女拉扯成人。除了田地，还养鸡养猪养羊，一天只睡几小时。虽然苦，但心里甜——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女儿初中毕业去了广州打工，儿子争气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来到省城，吃上了公家饭。这不，快要过年了，把老妈接到了身边。老了有福啊！

想到此，老人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洗头小姑娘见老人泪眼婆娑便悄悄地去找了人。当老人睁开眼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张脸，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上身着一件雪纺白色衬衫配着黑色齐膝的皮短裙，尤其是她微微上扬的嘴角，显得特亲切。而就在两人目光相视的那一刻，女人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乖乖隆地咚！年轻真美啊，老人感叹道。

长发女子盯着老人，你不认得我啦？

我不认得。

大妈，我是旦旦啊。

老人睁大眼睛疑惑道：旦旦？是我那个小活闹鬼的同学。

对啊。

老人想起来了，她是同村老袁家的大闺女，也是儿子的小学同学。原本两家走得挺近，农忙时小女娃也经常抽空来帮忙。她以为这小女娃日后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妇呢，没想到，那年儿子考上了县城的重高，而小女娃却辍学了。以后儿子上了大学，慢慢地两人就疏远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相遇。

旦旦后来与朋友去了扬州，转辗多地后，她觉得南方的发展更有活力，于是十多年前来到江州并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

这天下午老人十分激动，旦旦也十分动情，讲话间两只手始终紧紧地握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她们过去还曾有过这样一层关系。

旦旦站起来说，大妈，今天要是您信得过，我亲自为您剪一回。老人激动地点点头。

话音未落，旦旦已从助手手中拿起剪刀和梳子，轻轻捋了一下乱发，于是那些杂乱无章的枯发，在咔嚓咔嚓的声音中如漫天飞舞的雪花扬扬洒洒。看着镜中的自己，老人只觉得剪刀在咔嚓咔嚓地飞转，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洒脱的感觉从心里一点一点地发酵出来，慢慢地蔓延到了全身，让她无比地温暖和舒坦。

就在老人的遐想中，旦旦放下了剪刀，她轻轻拍了下老人的肩膀，老人睁开眼看到了镜中的自己，蒙了。头发剪短了，干净了，发型也变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好像整个人脱胎换骨了似的，原来老了也可以这样啊，乖乖隆地咚！

这时，她抬头看见那朵巨大的向日葵正在乐哈哈地朝她笑着。大厅里响起了女高音的歌声：“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故乡在左，异乡在右

Article- 麦 秸 Mai Jie



故乡是渗入骨髓的记忆，是流经身子里的骨血，是剪不断脐带的血地。每一个人自打娘胎出生，故乡就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生在秦地的我，是一个特别恋家的人。

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故乡。直到十六岁，故乡停留在我记忆中的轮廓仍是：最南端的丈八塬，最北端的曹村，最东边的北耕，最西边的土坡，方圆不过十余里。我多少次在想，外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有着怎样的缤纷？

童年的我，除了与小伙伴们游戏之外，就是随父母下地，父母在麦田忙碌，我则放羊拔草。奶羊一边在地头啃草，一边扭着头对着我咩咩地叫，而我则在弯腰拔草的同时，又时不时仰头凝望天上浮动的云。临近日头落山，羊

肚子吃得滚圆滚圆的，奶包鼓涨涨的，我一手挎着满满一笼青草，一手攥着羊的缰绳回家。

天刚蒙蒙亮，公鸡开始叫鸣了，母亲总是早早起床，去羊圈里挤完羊奶，然后拎到村东头的收奶站换来零花钱。祖母常讲：油盐酱醋全在这几只羊奶头里。我知道，这是一家人的生活用度。

在信息闭塞的乡下，犹记得村子十字路口小卖部有一台 12 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几乎每天下午，我就早早地搬来板凳，提前占据一个好的位置，等着 86 版《西游记》的播放。

祖母那时总说，把我早早送到“书坊”（学校）去。现在我才想起，那是多么高雅的词语。当然，除了“书坊”，还有乡亲们经常光顾的“磨坊”“油坊”“糖坊”等，这一个个带着

年代符号的名称,便成了乡间社会的组成。

上学了,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书,家里除了压箱底的半部《创业史》,就是大舅家的《说岳全传》,再就是姨夫从王石凹煤矿上带回来的《一千零一夜》。总之,眼前能看到的书被我翻了个遍,然后就是和同学们互相换书看。

那时的我内向、好静、不多事,整个家族对我的期望值很高,经常挂在嘴里的是:“这娃娃是读书的好苗苗。”而我从小学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升到五里外的初中之后,竟开始了浑浑噩噩的时光,荒废了三年学业,辜负了父母的期盼。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买单,踏上社会吃了没有学历的亏,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挣扎在饭店和工地、车间以及南方的流水线。

1995年春,冷风在前方吹拂着,田间的麦子还没有返青。我揖别了家人,告别了刚栽下不久的柿子树,告别了屋顶的炊烟,迎头走出村口。贫瘠的土地养不活孩子,我成了村里的剩余劳力,兜兜转转地一路向南。

走出山门天地宽。我终于走出了最南端的丈八塬,穿华朱,过富平,到三原,去铜川,到西安,上北京,再到广东东莞,最后落脚浙江绍兴的八字桥边。

行囊、车票、铁轨、远方以及行走中的一串串交集的地名和人事,与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三千里之外,我远离故乡,被无边的乡愁侵袭,工余的阅读让我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于是,我握起了笔,开始了一种别样的生活。

当赶路累了,停下脚步歇息时,才发现村庄已经离我渐行渐远,我心中也开始惶恐不安,亦如刚刚断奶的孩子被寄养别处。但我深知,我呱呱坠地时那一声啼哭,是在故乡的土屋响起,我来到人世的第一口美食是母亲的乳汁。

我一直觉得离开村庄,就是我的诗和远方,但似乎又不是,因为除了诗和远方,我的心底还藏着故乡。每当夜静,我不由就会凝望北方,想象着曾经躬耕的土地,我把对故乡的点点记忆,倾注进手中的笔,笔下的文字,堆起的一本本书里。如同我和父亲一起扛锄下地,用另一种劳作,试图在文字里构筑我那村庄的轮廓。

连续几年,我有幸为家乡的柿子文化节创作开场诗歌,诞生了《在火红的日子喊着远方的你》《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作品,并在朋友圈为家乡的柿饼大声吆喝,如果

你了解我在乡间的经历之后,也就明白我对故乡的情结所在。

“那哒哒的马蹄声,向山会平原奔去,我心中默念了千遍万遍的,一串串震古烁今的名姓,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页面里。策马而立,向着温润的江南喊去……”(《绍兴,浸泡在文学中的城》),这首作为2018年绍兴文学周特刊封面的诗,后来也编入多省语文中考试卷,对水乡绍兴我心存感恩,让一个懵懂的进城务工者慢慢向文学的殿堂靠拢,并以此为生。

我曾说过,除了富平,绍兴是我人生路上停靠最长的地方。在此引用《绍兴晚报》的一篇报道《在他乡,忆故乡,两乡皆情切》:“从富平到绍兴,两地的轮转,让一个富平人成为一个‘新绍兴人’,富平是他的故乡,绍兴却是他生活转变、职业重生的地方。”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停地选择:去与留,左还是右,守或者变,每个人的字里行间,都在打捞记忆里的碎片。在外游子时常梦中轻触故乡的门环,隔着远方的天空,对着村庄在喊,喊出亲人的呼唤,喊出屋顶上飘起的炊烟,身子却越走越远,最终发现,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

关上电脑,闭上眼睛,双手交叉至脑后,眼前便浮现出故乡的模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故乡在左,异乡在右。我却在想,我们一直找寻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有人说,故乡这个词,是属于离开故乡的人;也有人能,能让灵魂扎根的地方,就是故乡。或许,在这里,你能找寻得出想要的答案! 



海里有灵

Article- 赵悠燕 Zhao Youyan

最有骨气的鱼

他听说带鱼是海域里最有骨气的鱼，被捕后绝不会活着离开自己的领地，宁愿自绝而亡。

他想见到一条活的带鱼。他从视频上看到过，用鱼钩钓上来的带鱼叫钓带，这时候的带鱼，是以活着的姿态跟人类面对面。

那天，他跟着一艘船离开码头，他们称这趟出行为船钓。船长说这些带鱼生活在离岸边比较近的海域。他来自陆地城市，海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眼前，蓝色的海面，海水轻轻荡漾着，船在浪间起伏。阳光照在海面上，崭新的波光仿佛是被揉碎的白纸片，那些白色的泡沫是大海吐出的唾沫，它们追着船，一刻也不停歇。

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船到达一个辽阔的陌生海域，有人把绳钓放入海中，那根绳钓的主绳上系着许多鱼钩，他想象着带鱼被钩子脱离水面的景象，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抽烟、聊天，他看辽阔的大海伸向

望不到边的天际，想象着如果自己是一条鱼在大海里遨游的感觉。这时候，有人穿上蓝色的防水渔衣、渔裤，倚在船舷，半个身子探出船外，把抛在海面的浮标拉上船，然后把绳子缠在盘绳机上。他紧盯着绳子和海面的交接点，只见银光闪烁间，一条闪亮的带鱼破水而出，好似一个出浴的少年，帅气、美貌，周身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如一面镜子，照出他充满惊奇和羡慕的眼睛。他对崭新的概念刹那间有了新的认识，这才是一条又崭新又新的带鱼啊。它全身银光铮亮，如一柄用不锈钢打造的软剑，在海风中兀自挥舞。在海风吹拂间，他耳边似乎响起金属硬朗的铮铮声，高贵，充满傲气。这是一条在乎自己颜值的鱼，在被钓起的刹那，依然保持了它的冷静和尊严。

以前，他一直以为，由于压力的缘故，带鱼不能活着出水。这次，他亲见一条活着出水的带鱼。这条钓鱼在盛它的盆里扭动，却看不到末路挣扎的那种无望。好像是在跳一种属于它的舞蹈，扭动、伸直。再扭动、伸



直。被裁剪过一般的修长身子几乎看不到瑕疵，纤细的尾巴如一枚叶子，轻盈得几乎能飞起来。

他蹲在盆前观察，看到它脸部的瞬间，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果真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一幅画的败笔，剩下的唯有惋惜。凶狠凌厉的眼神，满口尖锐的獠牙，给它的长相增添了令人不忍直视的恐惧。和它几乎完美的体形风格完全不相同，仿佛一不留神被安错了地方。听说，它是会咬人的。或许，它就是以这种直面的长相宣告了它的不可侵犯，尖锐的牙齿布满它对被捕的愤怒和耻辱感。

在属于它们的世界里，带鱼笔直游泳的姿势像一个个钢铁侠。这是一条鱼第一次给他有金属感。它不是一个游泳高手，在幽暗的海里，它们静垂于汤汤水域，以一种信徒般的静默虔诚的姿态仰望着，仿佛在朝拜属于它们的一种规则，或者说信仰。晚上，偌大的海充满了神秘，四周危机四伏，很多鱼潜伏在它自以为看不到的角落里。幽暗的大海，大带鱼在水间无声游动，如一部黑白恐怖片，它的身后藏着无法预料的情节和杀戮。夺取或被夺取，生命就在一刹那的博弈间，只有那些比较小的带鱼，才会喜欢白天出来活动。

钓上来的这几条带鱼，个头都不大，鲜活的生命令人欢喜。他们继续放下绳钩，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看着他观察带鱼的神情、忙碌拍照的样子而发笑。他们聊着在他看来有些距离的话题，他插不上嘴，只能蹲着继续看那些带鱼。它们仿佛看懂了他的心思，兀自游动，却不显露他想象中那种水花四溅的挣扎，如此冷静让他感觉这些鱼似乎在蓄积发力。忽然想起书上看到过：一条鳗鱼跃上

来，突然咬住捕鱼人脖颈的传说。只有蓄满仇恨的力量才会突发制人，那是怎样地疼痛啊，他心中一凛，不由站了起来。

这时候，又有一条带鱼上钩了，它宽大的身子让钓者眉开眼笑。接着，仿佛约好了似的，一条又一条的带鱼不断出水，挂在他们手里握着的钩上。他们把收上来的带鱼，小心翼翼地放入冰桶。闪光的白鳞是它们最好的品相，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

船长告诉他，还有一种鱼网捕捞的带鱼叫网带，这种方法省事，却破坏了鱼的品相。偌大的绿色网袋从海面上缓缓起升，网内的鱼互相摩擦挤压，它们被成群倒在船舱上，那些挤在一起的网带不是花皮就是被挤破内脏，看起来就像被腌制过的咸带鱼，掉价。但是，鲜度依然。好鱼在肉不在皮嘛。当然，你说它有骨气也好，在它们出水的瞬间，的确很少有活着到甲板上的带鱼。

耳边突然响起一片喝彩声，原来有人钓上了一条大带鱼，声音之大盖过了机器的噪音。他兴奋起来，挤过人堆，手里握住这条带鱼的脖颈，让人用手机拍下视频。透过蓝色的海面，带鱼的背景是一汪汤汤海水，它的头昂扬着，瞪着眼圈奇大的眼睛，倔强的嘴巴朝天半开着，似乎在诉说。他垂下了拍摄的手，有点沮丧。谁说那不是一条充满灵性的带鱼呢？他不能想象它的生命从鲜活到被杀戮，被烧煮，被端上菜桌，被人类大快朵颐。

万物平等，我和你，就不能各自安好，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吗？突然间，他似乎读懂了那条鱼所说的话。

拜江的海豚

他的家乡是位于东海边的一座岛屿，曾经最壮观也最令他难忘的，是海豚拜江。

当年，他还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那天正逢落潮，从家附近的海滩上可以一直走到对岸，他兴奋得一个人跑过来跑过去，玩得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天已黄昏，等想起回家，走到海沟前，潮水已经上涨，海水漫了两边来去的道路。他站在那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时，远处游来一群动物，它们在海里时沉时浮，好

像耍杂技似的跃水腾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扬身再入海水之中。他几乎看呆了，忘了害怕。它们都长得胖乎乎、灰溜溜的，全身皮肤光滑无毛，灰黑色的背在水里一拱一拱的，仿佛做着拜江姿势，像极了家里养的猪。他突然想起爸妈说过，陆地上有的动物大海里也有，比如海豚，又叫拜江猪，它们就是海里的猪啊。

这群海豚游到他身边，宽大的嘴唇露出上扬的一道弧线，圆圆的眼睛透露出温和善意，慈祥的脸仿佛在向他微笑。其中一只海豚向他发出响亮的叫声，他看懂了，趟水过去，趴在海豚的身上，紧紧搂住它。他被一群海豚护卫着，它们在他周围发出欢快的叫声，就这样被驮着送到了岸边。

上学认识很多字后，他就找有关海豚的书来看。原来海豚通常生活在浅水区，以鱼类和软体动物为食。他当年被救的港口属浅海，饵料丰富，有多种海生动物繁衍生息，所以成群海豚进港啄食，成了一道让人喜欢的观赏风景。后来，他又多次看见海豚出现。

有一年，海滩上聚集了很多，他跟随伙伴跑向海边，原来是一条已经死去的海豚。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这条海豚是因为追逐小鱼儿不小心进了退潮时的港口，结果出不去，搁浅在海滩上，丢了性命。他知道它肯定无望地挣扎过，如果那时候自己在该多么好呀，他一定会救它，就像当年它们救自己一样。可现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抱来一堆柴禾，生起火，上面架着一只大铁锅。他们把海豚的肉刮下来，放在大铁锅里，说熬出来的油是治疗烫伤和跌打损伤的良药，还可治皮肤瘙痒、疥疮之类。有户人家的媳妇生下小孩奶水不足，她家里人听说用海豚肉煮食可治，欢天喜地地割了肉回去。那只死去的海豚肉被熬了油后，全村人都有份，他们家也分到了一小瓶。他的伙伴们吃着熬出油后的海豚肉渣，跟他说味道鲜美极了。他一扭头就跑了，对着寒风呼啸的大海，哇哇大哭，愤怒而又无奈。

后来，那只海豚骨架被人埋在了山坡上，迎着海风，他常常会去那里，坐在那个隆起的坟茔旁边，喃喃自语。他觉得海豚能够听懂，在这个远离它生长环境的陌生地方，有他的陪伴，或许就不会孤单和害怕。

那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村民食用油供应实行城镇

凭票定量，农村凭证限量，他们家每人每月只能分到 2 两。油不够吃，有人就想到用海豚油取代。那次，他母亲拿出那只小瓶，棕黄色的油，倒进锅里立刻泛起难闻的气味。那顿饭，他把饭碗端到了屋外。

他父亲是一名木匠，那次在家里，父亲修被猪拱坏的大门，不小心伤到了手，顿时血流如注。母亲立刻用棉花蘸了海豚油，轻擦在父亲的伤口上。第二天，父亲又如常出去干活，说已经好了，这拜江猪油真是灵验。父亲知道他对海豚的感情，说，虽然它死了，可它还对人类还有这么多用处。有人竟然管长得又丑又胖的人叫拜江猪，真是侮辱了它。你喜欢它，是不是因为它们很可爱啊。

他点点头，想起那年被救的情景。成年海豚的智商相当于小孩的六七岁，当时，这个海豚肯定察觉到了他的害怕和恐惧，才会勇敢地救他于困境之中。他觉得，海豚是大海里最聪明可爱、最善解人意的动物。它们是一群多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动物啊。

很多年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建设新区，他们家搬到了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每年夏秋季节，他都会来到码头边。这儿建起了一个很大的观海平台，有很多人在这儿散步、观海、放风筝、跳舞，其中一些人来自外地，到这儿仅仅是体验海岛的风景和海鲜美食。他们肯定不知道这儿曾经有过的海豚拜江，那是怎样地壮观啊。好多年了，这样的情景再也没有出现。

他站在观海平台前，瞭望着远处的小长涂山，在和这条竹屿港之间，曾经，数百条海豚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它们的游泳距离间隔相等，此起彼伏，如孩童一般在水里扑腾、嬉戏、翻滚、跳跃，还有几只小海豚不时跳出海面，犹如追逐打闹的孩子。看着这样的情景，他脸上随之会出现快乐的笑容，久久地，直到海豚消失不见。

夏秋之际，在大小竹屿与岱山岛之间的水域中，他又看到数百条海豚结伴游弋，宛如一支支水中舞蹈队。它们时而从海面跃出，时而在水下穿梭，形态犹如拜谒大海一般，它们在海上演绎着最美的“海豚拜江”。这时，一艘游船自远处驶来，这些海豚游过去，跟随船尾迎风逐浪嬉闹，发出的叫声欢快嘹亮。他发觉自己骑在一只海豚背上，嘴里发出的叫声和它们一模一样。他知道自己是在梦里，却不愿醒来，泪水不知不觉从眼角滑落。 

黄昏下的村庄

Article- 郭小祥 Guo Xiaoxiang

要去的地方叫沙岗，正值傍晚，微风习习，这南方的深秋似凉未凉，夕阳的余晖如一支水彩笔，随意地在乡村广袤的田野、起伏的山峦间涂涂抹抹，我与先生行走在乡村一条小道上，漫无目的地逛着，四处风光随人心，很自然地我们也进入了这幅画卷。我们无意惊扰静谧的村庄。

一

无意惊扰田间的黄蜀葵花。它细瘦高挑，迎着晚风，鹅黄的花儿明媚地欢笑，于青青的田间做一个遗世而立的美人。每一季的绽放，不为迎来路人惊羡的目光，只为农人那虔诚的双手。盛开是生命予它的盛宴，凋谢是它予世人最好的佳肴，可入菜，可做药，沐雨饮露，从不辜负每一日的朝阳与晚霞。有细细碎碎的落葵薯花，卵形或心形的白色透明花瓣沿着茎蔓一串又一串，爬满了，到处开裂、随意搭建的木架子，它是风中的信使，是山岸旁最美的明信片，兜走了行路人游离的目光，不安定的心停下来，静静地陪我看蚂蚱蹦跶、小虫蠕动着在叶脉上，和风轻抚，花瓣摇曳，花藤轻舞。

忽然有一两条土狗窜过，或是蹲在民房前盯着你看，偶尔吐吐舌头，摇摇尾巴；路旁叽叽喳喳的草鸡泰然自若，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东啄啄西啄啄，一会儿跳到石头上，一会儿蹦到木桩上，哪儿哪儿都是它们的地盘。有村民扛着锄头、簸箕、箩筐等农具三三两两结伴而过，不时交谈几句。此刻你觉得有一句诗“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好契合此景。溪水潺潺，在村中悠然而过，水中石子、水生植物历历在目，水汪汪的溪水敏捷地接收了每一道光 and 影，恰如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描绘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他的浓密突起的眉毛”那样美妙，不过现在是湖水与溪水有了一样的美感。暮色四合，红彤彤的晚霞洒落村庄，弥漫着恬淡的烟火气。

二

广阔的田野沐浴在晚霞殷红色的纱幕下，稻田是金黄的，天空是浅蓝色的，大块大块白色云朵飘浮着，沿着村庄水泥路蜿蜒，蜿蜒着的是金黄色的缎子，金灿灿的谷

子颗颗饱满丰盈，一颗挨着一颗，密密麻麻，吸足了白日阳光的热量，你若轻轻一咬“咯嘣脆”，齿颊留香。一位大婶拿着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地铲谷子装袋，娴熟劳作的姿态，满足的笑意，是乡间最富有生机的画面。远处有隆隆的机器声，那是水稻收割机在收获秋日的馈赠。放眼望去，一大片成熟的稻田，沉甸甸的稻谷弯下了腰，清风徐来，稻浪起伏，迎着收割机钻入它的怀里，自然而轻松。就算是夜晚，它们在明亮的灯光下，依然等待着收割机来安心操作，然后随着收割机谷子落入农民撑开的麻袋里。暮色昏黄，收割机的照明灯光洒落稻田，与淡淡的落日余晖晕染在一起，温暖和谐。

回想起许多年前，当水稻成熟时，田野里都是挥着镰刀的劳作者不停歇地动作，偶尔抬起头也只是擦擦额头的汗，要么就是捶捶酸疼的腰，继续割稻，怕天气不好影响稻子收割，影响产量，一切靠天吃饭，抢时间抢收成，全部抢割完成才有一点点安心，又匆匆忙忙投入打谷。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一天又一天，割稻、打谷、晒谷，不间断地劳作，那种辛劳常常是晚上躺下床那就是骨头散了架的感觉。看到父辈的艰辛，对照如今全机械化的插秧、割稻，立马出谷子，高效率、轻强度地一气呵成，感慨时代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便利。现代农具的运用，逐步释放了农民的双手，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各种不一样的劳动、娱乐、休闲、看世界，农村逐渐成为现代化中的农村，多好！你看见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在历史的推进下一点点地发生突变，自然万物也在人类的进步中缓缓地呈现出更精致、更宏大、更有时代的质感。农村要想留住乡民，大抵也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给予农民更便捷的生活方式。

三

在乡野的小径上，在暮色与斜晖间，凝视光线一寸一寸越过田野、树丛、群山，溪水依然顺着那条古道的山涧顺流而下，不急不缓。沿途你看到一座新建的“城西古道”石牌坊，《平阳县志·建置志》有载，“西门干路：自西门外西南行，进冈岭、葛奥岭、枫树坛，经曹堡街、岛桥头，越鹤皋岭，过鹤溪街、詹家步、水头街，复越蒲岭，过交



溪桥，经潮岩、苔湖、顺溪市、石包源、戈场，至天井阳坳，一百十八里六分，为泰顺县界。”可见这条古道延伸之远，见证了历史的变迁。那时这条路也是四通八达的，也曾是经济往来的交通枢纽，连通着好几个乡镇，当下成了我们寻迹探秘的好地方。

你无法经历这三百年的时光，但却无处不与这久远时光相碰撞，一棵棵上百年的枫香树，受水的滋润，受阳光的普照，受风的横斜，一种古朴的神韵展现在路过者的眼里，在秋日成熟的季节特别地丰饶，随着岁月渐长，它们好像更年轻更挺拔、更枝繁叶茂了。路旁一座老掉牙的休息驿站二夕亭，已然翻新过，青瓦片，木柱子，木靠椅静候每一位过客。倘若你走累了，在此歇一歇，抬头可见亭子上方，树木虬枝盘绕，在这深秋时节，焦黄的枫叶燃在枝头，落在青灰色的瓦片上，凋落在山路上，浓浓的金黄色让你想把一个镜头偷换一个字：满山尽是黄金甲呀。倘若你觉得视觉疲劳的话，那就再抬头远眺，远处是墨绿色的，还有深红色的树叶，可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那又何妨，不错过美景才是你我此行的重心。

一路前行，流年的痕迹清清楚楚展现在世间万物上，昔日的故事，没有隐瞒，只是停留昔日的那个时间内，所有的昔日，现在都无始无终牵涉到了田野、山野甚至宇宙万象，是的，就如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所言：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而梦不过是另一条分岔的映像。❏

蘸运河之水墨书写宁波的片段

Article- 马倩倩 Ma Qianqian

一

在拥挤的竹筒上辗转
要流淌，要种植
要重塑每一个涉河而去之人的性命
用浪花柔化石头的坚硬，用漪波牵住晃动的橹桨
停驻的水鸟是诗人笔端的疼痛
铸金的羽翼，沉重诗人的抒情
船舷又落了一寸，纸端的墨痕又浸了三分
是谁在岸上
是谁在船上

二

从宁波三江口说起
或者从这起航
从上船之后，就开始说文言文，写格律诗
不再走陆路，终其一生水上漂泊
至于天空的航线，留给送信的鸿雁，几千年了

头顶的三尺依旧宽阔
而我在熙攘的人间，被春风吹得繁茂被秋风吹得萧瑟
身躬照水，沧桑加固皱纹的深壑
回头看，岁月掉头很难

三

余姚井山头不需要杜撰剧情
河姆渡遗址还保存着真实的历史物证
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位良医
搭上脉，就能为历史诊病
寄居在运河体内的暗疾涌动不安，流水在风雨中难

免慌乱

要镇住它，在天空中施雷放电
往水中扔石头，也把宝剑投入
于黄昏之时宁静
摇曳的灯火析出泪水的盐分，总有凝结的冥想疑似
漂萍
在河波上，荡漾歌女的乐声

四

在地图上，河流是抽象的
那些木桥、石桥、竹桥都被一粒粒黑点架空
空旷而无人
只有成群的鱼儿在虚拟的浪花里相濡以沫
你或许能听到冷冷的水声
被烛光照得昏暗
是的，还有很多难解之谜难以有效介入，我们不懂宁波
不懂运河
不懂古人为何郁郁而终，那些读起来十分拗口的文句
到底藏着多少生命的觉醒？



五

一生之漫长
抵不过运河的一节
我想到那些被放逐到岸上的鱼儿，一生再难以接近水
京城相见之时，恍如隔世
故人，宁波，运河
宁波汤圆、千层饼、南塘油赞子
南塘老街，天一阁，舟山港，东钱湖畔
我们无限靠近，再比照，再重新呈现，再延伸臆造
无数叠浪花，化为美丽的童话
梦中辽阔而稠密的星宇
恰如众神归位，用一微点的亮光，把今生的昏暗照彻

六

运河封底
宁波歌吟
拜托善泳的小子于河中打捞古人遗失的诗句
那些泛黄的纸张已经腐朽
但铁铸的汉字却还笔画清晰，将它们重新组构
一个隐约的世间重现

校正纸页上约定俗成的航线，多角度阐释可能的抵达
江面上的水雾，天空里的皓月
此刻融合成浪漫的迷幻
谁在其中走失
谁又在其中归来

七

浪波与浪波之间存在的罅隙证明了历史的不可弥合
那些能清楚还原的往事不在纸页上
而有一条隐线
一支秃笔
一个把自己的身份丢失在故里的诗人
从洇染的墨迹中移出倜傥的身姿，他挥笔摹写久违
的天地
他呼
他歌
他舞
奋发之力，推动着运河又流淌了一千年

在今人看来，整条运河是如此整肃，没有一朵多余的浪花

水泡、荇草、绿藻
往来运送的粮食、银锭、布匹，以及贬谪的文官
纷纷的意象和物象
映射着千年的跌宕和起伏

八

每一粒水滴都日夜兼程
携带着历史的内存
我知道其中的一些必然于途中蒸发，另外一些沦为把柄

刀刃上滚动的计谋和暗算
故事的框架被拆卸
剩下的木料被用来搭建下一个王城
当我们举目望去，每一处废墟都是无辜的
包括每一只临时歇息的飞鸟
它们落日般地隐于暮色
仿佛完成了救赎，而能够永远安眠
运河的流淌未曾停止，试图走出中年困境的诗人去

而又返

此夜的凉露与微霜把人间覆盖
疲惫的双脚停了下来

九

谁是阿赫玛托娃
谁又是张继
谁告诉了远方的消息
谁引领我去读他们的诗。滚滚不息的运河水
为我挑开了书页
又为我点着了豆火

十

宁波，与水比邻的城
除了运河
还有甬江
除了春风绘制的时间壁画
还有承托诺言的光阴马蹄
年代如此久远，谁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前朝的自我
谁还记得自己在哪个渡口登船
哪个渡口登岸
我们又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陌生人，他们曾是过去的知己
而所有的仇敌都放下了锋利的匕首
还有多少梦要做
多长路要走
此生踏上过无数条歧途
最终我必然会选择运河这条水路，允许自己一生无定地漂泊
如我所愿
前方有一处临时的灯塔，向人间传达着模糊的说辞
我承认我的渺小
浩瀚运河的一粒水滴

离开春天的日子（组诗）

Article- 叶巨龙 Ye Julong

不用刻意去铺陈，一场梦
就能替我还原春天的现场

无非是冰霜
无非是冷
无非是在一阵比一阵猛烈的咳嗽中
陷入更深的寂静
连风也停止了呼吸

这个季节的沉默离春天更近
所有的伤口都裸露着
期待一场雨水将至
洗却内心的清苦

离开春天的日子
不辜负每一片落叶
循着陡峭的记忆
在冷冽的脚步中

撩开经年的暗疾
——无非是疼痛

我们试着开始谈论春天

所有的冰雪都在流泪
大地沉默不语

远山赶在日暮之前矮下身子
草木集体出走
并在一场冬雨之后
陷入旷日的岑寂

故乡的河流依旧隐忍
裹着寒湿的乡音
在瘦弱的风声中
舔舐内心的芜杂



沉寂在无边的旷野
那些经年流转的风霜
凝结起冷冽的况味
陷入最后的僵持——
其时，我们试着开始谈论春天

雨

总要有场雨水来打破沉默
打开冰冻的心扉
让洁白的雨花消融内心的荒芜
作别冬天的苦涩

总会有一场雨水敲开沉睡的窗棂
缠绵在潮湿的午夜
像一个人离家久了
醉倒在故乡的梦里
从一场大雨的淋漓中
湿漉漉地醒来

总有一场雨水打开柔软的期待
靠在春天的屋檐下
注视一场细密的雨水
落入人间的酣畅淋漓

也落在
时光的虚处

雪花开着开着就开出了春天

大寒过后
我确信春天已离我不远
万物俱寂的日子里
那些被大雪覆盖的事物
从雪地里悄悄地隐现
仿佛春天在向我朦胧地靠近

迎春花还没有捎来信息
故乡的庭院里
一簇簇傲放的蜡梅
在寒风料峭中
暗香浮动

站在冬天的尽头
在一枚落单的雪花里
翻开蓬松的记忆
那些明亮的画面便不断
从时间深处赶来

“就这样安静地站着
不说话也很美好”
雪花开着开着就开出了春天 ❷